民國叢書

第四編

·83·



民國叢書

第四編

歷史·地理類

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學說

白韜著

陶行知先生紀念集

陶行知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

上海書店

悼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代序）

我今天代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來追悼陶行知先生。中共中央，對於陶行知先生之死，異常悲痛，認爲這是中國獨立和平民主運動的重大損失，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重大損失。因爲陶先生一生致力於救國事業，民主事業與教育事業，他在教育方面對人民的貢獻尤爲巨大與不可磨滅，陶先生之死，對於中國民主運動與新教育運動是不可補償的損失。

我們追悼的陶行知先生，是人民的教育家。在人民中進行教育，可以有兩種不同的目的：一種是蒙蔽人民，要人民甘心做反動派的奴隸，做帝國主義的順民，服從命運或英雄的擺佈。抱着這樣目的的教育，不管它叫什麼名字，決不是爲人民的教育，而只能是奴隸的教育。這種教育是決計沒有前途的，因爲如果中國人民不從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教育事業就沒有發展的前途，只有衰落的前途。

陶行知先生的理論與教育實踐，是有另外一種目的，這個目的，就是喚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他把人民看作人，而不是看作奴隸與順民，他主張人民的解放。他又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所以，他相信人民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在教育事業上，他同樣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的

智慧。這種思想，充滿在他的著作之中。他主張人民自己爲自己辦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他爲了這個主張，孜孜不倦，幹了一生。誰見過陶先生的，就被他的艱苦卓絕的精神所感動，陶先生的這種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思想，正是爲人民服務的教育思想。以喚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爲目的的教育，是有極其寬廣的發展前途的。這種教育，在國民黨統治之下，受盡了壓迫，受盡了災難，不能得到寬廣的發展。這是因爲，在國民黨統治之下的中國，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乃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着的中國，陶先生和他的事業在那裏受到磨難，這種磨難乃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所受到的苦難的縮影。但是，這種磨難將是暫時的。在人民已經得到解放的中國解放區，陶先生的思想得到廣大的歡迎，他的理想被實現，被發揚光大。在將來的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也一定如此。所以，這種喚起人民自己辦的教育，才是爲人民服務的教育，才是人民自己的教育，才有光明的寬廣的發展前途。

要爲中國人民的教育事業服務，教育家是不能不問政治的，而且不能不在政治上堅決站在人民的方面，作堅強的奮鬥。這是因爲，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這兩座大山，重重的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爲人民的教育事業，也被這些反動勢力壓得不能發展。陶先生從九一八後參加救國會起，他的政治立場就很鮮明了。在政治上，他與中國共產黨成爲民主運動中的親密戰友。陶先生所以如此並不是偶然的，他是從他的多年實際經驗中，深切了解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中堅，

了解了共產黨的大公無私，共產黨的主張正確，共產黨在爲人民和民族的利益奮鬥時堅强不屈，所以不怕一切誣衊壓迫，與共產黨携手奮鬥。陶行知先生，在他的政治生活中，他的主張，他的行動，他的作風，他的與人民的密切聯系，他的刻苦耐勞，堅强不屈，視死如歸，都是人民的模範，不僅僅別人應該把它們當作模範來學習，我們二百萬中國共產黨黨員們也可把他當作模範來學習，陶先生所走的道路，是正確的。這正是偉大的民主主義者像魯迅先生，鄒韜奮先生等所走的同樣的道路。

現在，陶先生不幸死了。他的死，是在爲獨立，爲和平，爲民主的奮鬥中勞苦過度而死。死的以前，國民黨特務暗殺 李公樸、聞一多等先生，並且準備了黑名單要暗殺上海許多民主人士，國民黨特務曾到陶先生寓所打聽陶先生的行蹤，顯然是想加害於他，陶先生自知身處險境，一夜整理詩稿十萬字，以便可以無所牽掛與敵人戰鬥，這裏表現了陶先生爲了人民解放視死如歸的偉大精神。可是，因爲過份勞苦，次日即突患腦溢血逝世。

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和解放區的教育界，要繼承陶先生的遺志奮鬥，我們要在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之下，團結得緊緊的，來爭取獨立和平民主，爭取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的實現。我們解放區的教育界，要研究毛澤東同志和陶行知先生的新民主主義的教育原理，並把它實現，喚起解放區的人民，更加積極的參加解放區的建設工作和自衛戰爭。

陶行知先生精神不死！

隨定一

目次

二　寫他在國難時期

三　寫他在抗日和民主鬪爭時期

二 寫他在曉莊時代

一 初見

我一想起陶行知先生，腦海裡就浮起二十多年以前的情景：那時正值五卅運動前後，英美、日等帝國主義，瘋狂的剝削和屠殺中國人民，他們的血手從南方的廣東，一直伸展到北方，從東方的上海一直深入到西部內地。帝國主義像一隻全身武裝了的惡獸，在中國大陸上爬行着，吞噬着善良的老百姓。在這一羣惡獸前面，耀武揚威的奔逐着大批走狗——那些大小軍閥，成年的互相厮殺。

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軍閥內戰的不斷擴大，各省苛捐雜稅，層出不窮，兵差拉夫，人爲荒災，以及地租和高利貸的加重，使得農民進一步破產，流離失所，於是農民運動用各種 態興起起來了，南方開始了農民協會，北方農民則用原始的鬥爭形式——紅槍會，更發展了。產業工人在殘酷的壓迫剝削之下，生活更惡化，但有了新的覺悟。

就在這情形之下，爆發了五卅慘案，反帝浪潮首先由上海日本紗廠的工人用血來展開了，

這個浪潮很快就席捲了全國，帝國主義的大砲和賣國軍閥的槍刺，抵擋不住中國人民的怒吼，全國各大都市的商人都罷了市，學生都罷了課。

我們那時候組織了學生自治會，檢查日貨，募捐救濟工人，乘着不買票的火車，到鄉村和工廠去宣傳。有一天，惲代英到我們校裏來演說反帝運動，在他的鼓動教育之下，人人都想投奔革命。軍閥們的逮捕屠殺，並不能遏止青年人的革命熱情。

孫中山先生死後在全國舉行追悼會，更激發了革命情緒。我們打聽到廣東革命軍，仍在積極準備北伐。但南去的道路很遠，沒有去成。忽然有一天，有一位同學拿了一份鄉教叢訊月刊來，說起陶知行先生想辦鄉村教育，來改造中國。他過去熱心改造中國教育，後來又辦過平民教育促進會，最着重貧苦人民的教育。現在想辦試驗鄉村師範，培養新教師，來建立一百萬所鄉村小學，改造一百萬個鄉村，達到改造中國，使中國富強的目的。我聽了很高興。

大約是一九二六年的十二月，我懷着一顆景慕的心去會這位革命的教育家，在南京和平門外燕子磯一所鄉村小學裏，我們見面了。他說，好極了，你來參加，我們竭誠歡迎，我們試辦這所學校，是要來試試改造中國的道路。說話笑嘻嘻的，穿着藍色綢長袍，黑馬褂，圍着皮圍脖，頭上戴一頂呢禮帽，手裏提一根文明棍，那一副金邊眼鏡，格外顯出他的尊貴。雖不是西裝革履，仍不脫大學教授派頭，他和我們一同吃了飯，就乘着人力車回城去了。

心裏想，這位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回來的紳士派教授，居然能放下架子，到鄉下來辦學校改造鄉村麼？可是，對他的理想和試驗精神，對他那種自由的很和藹的態度，感到一種愉快！覺得這種試驗是有光明前途的。他似乎有一種力量能吸引住青年人的心，彷彿有一個奇跡，在他領導下，就要在我們眼前出現了。

二　奇怪的考試

春天的陽光照耀着蘇府山下一溜煙的樹木，發出青灰色的光彩，空氣顯得特別新鮮，雖然是三月天氣，曉風依然刺人肌膚，我們的隊伍一共不過十來人，大家脫下長衫大袍，穿上草鞋，踏着薄冰向勞山下的曉莊進發，今天開始下鄉過農人的生活了。

我們到達曉莊時，只見那個村落不過三五家茅棚，是一座荒漠的鄉村。陶行知先生早已在那兒等候了。他也穿上草鞋，滿面笑容的迎着我們說，你們諸位下鄉了，以後要和農民做朋友，為中國三萬萬四千萬農民服務，要改造中國鄉村，替中華民國創造一個新生命，今天就要舉行一個特別考試，看看是否能吃得起苦。

從農民那裏每人借到了一把鐵鍬，又劃了一方荒地。就這樣，我們開始在勞山開起荒來。起先，我們把草鞋當套鞋兒穿在鞋子外面，免得把腳括破，但在剛鬆了的潮軟的初翻泥上，草鞋和

鞋子都陷落下去，拔不起來，有人開始索性把掉鞋襪赤脚。也有人，脚上和手上都起了泡。個個人都滿身大汗，累得氣吁吁的。陶先生不住的在地上走動着。

「嘻嘻，嘻嘻，」他張開嘴笑着說，「今天的考試，是破天荒第一次，你們的成績，足足够一百分！」他說着也拿起那笨重得不聽使喚的鐵鍬來，在地上翻動泥塊。

三　奇怪的開學典禮

一九二七年的三月十五日，在勞山脚下一座墳塋地上，放上一張八仙桌兒，幾條長櫈，這些都是臨時從附近村民那裏借來的。太陽從勞山後面升起，照着對面的紫金山射出紫藍色的光芒，充滿生意的嫩草發散出一陣陣清香，村民們三三五五成羣的向山麓走來，其中有拖鼻涕的小孩，有梳小髮結的老太婆，有柱拐杖的老頭，有結實的面龐紅勃勃的農村青年男女，他們是來看熱鬧的，也有的是被邀請來參加的。城裏的來賓不多，只有陳鶴琴，江恒源，姚文采等先生。這一簇人擁在山村的曠野裏，正在舉行着曉莊師範開學典禮。主席是校長陶知行先生，他在光天華日的露天大禮堂上，致生動而有力的開會辭，他說：

「今天是我們試驗鄉村師範開學的日子，我們沒有教室，沒有禮堂。但我們的學校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我們要以宇宙爲學校，奉萬物作宗師。藍色的天是我們的屋頂，燦爛的大地是我們的

屋基。我們在這偉大的學校裏，可以得着豐富的教育。……

他說話時的語調帶着很重的徽州土音，語氣是非常肯定的，好像并不是誇大而是要實行的，大家靜靜的聽着，心裏在想這位校長的氣魄很大，他全身似乎都充沛着創造的精力，不由的不使人感到新奇。接着，他又說了：

「今天到會的農友很多，他們是我們的朋友，以後我們要他們幫助的地方很多，我們需要和大家做親密的朋友，向他們好好的學習。你們不要以爲鄉下人無知識，一般大學生唸過不少自然科學的書，到了鄉下便不認識麥子，說韮菜何其多也！嘻嘻，你們看，鄉下人不比我們認得的東西多麼？……」

從這一天起，中國的鄉村教育運動便在這偏僻的山村裏誕生了。陶先生以十分愉快的心情，走到一家農民家裏，就在牛欄旁邊放下幾張八仙桌兒宴請來賓，吃的是青菜豆腐，但大家心裏十分愉快。

四　和牛大哥同睡

這時候，陶先生把全付精力都放在籌劃學校上，他把教授辭了，安徽中學的校長也辭了，搬到鄉下來住，他又號召大家自己動手建築校舍，他寫了一首自立歌勉勵大家：

「滴自己的汗，
吃自己的飯，
自己的事，
自己幹；
靠人，靠天，靠祖上，
不算是好漢！」

在校舍沒有建築起來以前，大家住帳蓬露營，陶先生自己也露過營，借住過老百姓的家。他住在一位陸老頭兒家裏，三間草房，東首住主人，中間放農具雜物兼會客吃飯，西首拴着一頭大水牛，遍地堆積着牛糞。陶先生就借住在西首牛大哥旁邊，有一星期左右，他見了人便笑盈盈的說：和牛大哥同睡，只聞牛糞香。後來，這位人民教育家又是人民詩人，曾有「一聞牛糞詩百篇，風花雪月都變節」之句，敘述要做大衆詩人，寫大衆的疾苦甘樂，就得和老百姓共同生活。

他不僅是理論家或事情的發起人，常常喜歡用自己的行動來指引別人幹。他在曉莊，提倡「師生共生活，共甘苦，是最好的教育。」他也毫不例外的和大家一起穿草鞋、挑糞、種田、種菜、養魚，他請唐家莊一位出色的莊稼人唐老頭教大家耕種的方法，他自己也做了唐老頭的學生。他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行行都有我們的老師。那時候，大家都自己掃地、抹桌、

燒飯……所有生活上的事不用聽差、伙伕，陶先生也親與其事。有一次輪到他燒飯，他在燒火，就研究燒火的科學道理，如何節省柴草，如何使火功恰到好處，不致於把飯菜燒壞。他寫了一首詩，諷刺不會燒飯的人道：

「書獃子燒飯，

一鍋燒四樣：

生、焦、硬、爛。」

有些所謂學者教授，批評他是許行主義者，有的說他是苦行僧。只有他和他的同志知道，他們是在幹一件大事，就是發下宏願，要改造中國教育，使消費的教育一變而爲生利的教育，使亡國的教育一變而爲救國的教育。用陶先生的話來說，「他要教農民自立、自治、自衞。他要叫鄉村變爲西天樂國，村民都變爲快樂的活神仙。」「一心一德的來爲中國一百萬個鄉村創造一個新生命，叫中國一個個的鄉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來造成中華民國的新生命。」

五　向農民學習

他和他的同志，不僅下了決心要替中國三萬萬四千萬農民服務，爲他們一心一德創造幸福，不避艱苦的在各方面苦心鍛煉自己，而且爲了接近羣衆，了解羣衆的實際痛苦，以便和他們共同

奮鬥，一起創造新的社會，很虛心的向羣衆學習，除掉請農民來校傳授經驗，共同舉行娛樂會，平時互相親密的交友之外，當時，又提出：「會朋友去」這一個活動，不論師生都要到附近村莊上去幫助村民解決困難，而且每一個人都要找一兩位最要好的農民做親密的朋友，便于更進一步了解他，接近他，更好的和農民打成一片。他也是這個活動中的積極份子。

平時，這種活動每星期只有一次，化一整天或一個下午，到了夜晚師生團團坐起來，圍着燈，像家庭似的漫談各人的種種活動情況和總結心得。陶先生經常出席這個會議，報告他的心得，提出許多建議。他有好幾個親密農友，以後找他的人多起來了，女人、老頭、青年小伙子，不斷的來找他解決疑難問題，他總是很耐心的用心聽鄉下佬嘮嘮絮絮的一些瑣碎小事，而且瞇着眼睛笑嘻嘻的給他們滿足的回答。他和農民眞是老朋友，替他們辦事總是那末認眞和熱情奔馳。附近幾十里的農友都認識他，老遠就互相打招呼。

二十年來，我始終看到他是一貫對人民低頭甘心爲牛不以爲苦，而以爲樂，不以羣衆爲骯髒無知，而是誠心誠意做他們的忠實朋友，虛心向他們學習的。

他對人民捨得化錢，而自奉非常菲薄，也不以爲苦，反以瀟灑出之，例如有一次，江寧師範請他去演講，他天不亮起來，徒步而去，走到鎮上饑腸轆轆，便買了油條在街上一面走一面吃，該校徐校長特爲派了學生到鎮頭去迎接，久候不至。迎接的人以爲陶先生一定舉止闊綽，并不注

意路上碰到身穿學生裝，一邊走一邊啃油條的人，回校一看，原在會客室裡的正是方才啃油條的人。他左右的師生也都艱苦樸素，除一小部份外，二十多年來也都堅持不移，他常說：「手中一文錢，百姓一身汗，將錢來比汗，化錢容易，流汗難。」所有這一些，後面我還要寫到。

六　革命軍攻入南京

在這裏，我必須敘述一下當時的情況，學校辦了不久，國民革命軍便打到武漢，沿江而下，勢如破竹。同時，上海工人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舉行起義，迎接另一路革命軍，滬寧路已成混亂現象，綽號狗腿將軍張宗昌的部下褚玉璞佔據南京，不敢應戰。那時，群衆都痛恨這批賣國軍閥，叫他們爲灰色動物，盼望國民革命軍能早點打來解救他們。果然，不到幾天，便聽到隱隱的大砲像春雷似的從幕府山後傳來。我們都驚喜異常，陶先生向我們建議組織戰地救護隊去迎接革命軍，他和錢君等到南門郊外去了。我和綽然同志（三〇年被國民黨所害）打着紅卍字會的旗子想到堯化門外滬寧路沿線去救護難民，不料走到堯化門鎮，沿途背着大刀的軍警，五步一崗，十步一哨，圍得密密不通，他們疑心我們是革命軍的暗探，幾乎被鎖綁了，幸而我們和堯化門小學的宋校長是熟人，他把我們引到校裏就和他們在戰地辦了一個難民收容所，從黎明到日暮，大砲停止了怒吼，只聽得機步槍達達的響聲越來越密越近了，老太婆嚇得跪在地下唸阿彌陀佛，青年婦

女在暗泣，小孩在啼哭，我們的門外站滿了崗哨，不准出去；那一黃昏就有不少婦女被姦污了，士兵們跟土匪一樣打開店門，把全街洗刧了。

黃昏時光，幾經交涉，我們才離開了那個被士兵蹧蹋得像地獄似的小鄉鎮，乘車向下關進發，沿途只見士無鬥志，人人都背了一個大包袱，他們從人民那裏搶刧了大量的財物，急匆匆的覓路逃生，於是沿途像線似的一長串的潰兵，牽來了人民的牛馬驢騾，步兵立刻成了騎兵。黃松林教授敍述國民黨中央軍，在河南抗日前線，遇敵即潰，在黃河兩岸大肆搶刧，個個背上了大包袱，騎上老百姓的牛驢，於是步兵成了騎兵的奇觀，我在大革命時眼見軍閥的軍隊就是這樣的。

我們到了下關找到紅卍字會，那晚下關和浦口大火，火光燒紅了整個西方，哭喊聲、口令聲、槍砲聲，慌亂得天昏地暗。軍閥褚玉璞的部隊已經向長江以北撤退了，他們照例在城內和下關來了一個洗刧。第二天，東方發魚肚白的清晨，革命軍便爬上城頭向江邊的退兵追擊。

我們立刻走上大街，歡迎革命軍，不久槍聲停止了，滿街都是子彈槍枝和軍裝，昨天在人民面前披着老虎皮么五喝六的那批傢伙，今天個個都俯首不敢見人了。工人組織成功的糾察隊，荷槍實彈，纏着臂章，在街上往來巡邏，一排排的年青革命軍，喜氣洋洋的開入下關。我們親見他們綑着幾個幫助軍閥內戰抵抗革命軍的洋人，因為沒來得及逃跑被捉住。一忽兒，停泊在下關江面的英帝國主義兵艦便隆隆的開起大砲來向城內轟擊，巨大的響聲把附近住屋的玻璃窗震壞了很

多，一直到第二天上午還繼續着。街上的革命軍若無其事的大踏步向前開拔，他們說，開大砲嚇我個吊！當時英帝國主義聲言準備開十萬大軍來消滅中國革命呢。

革命軍進入南京後，當時驍勇善戰的第六軍黨代表兼代江蘇省政府主席林祖涵的佈告，便到處張貼起來。學校也活躍起來了，我們參加了省學聯和全國學聯會，在鄉下我們到處發動農民組織農民協會，把和平門外的大小土劣和號稱五虎的劣紳，統統逮捕了，有些公審後槍決，有的監禁了，有的被戴上紙糊高帽，反縛着手，牽着在鄉裏遊行，敲着鑼鼓，喊着打倒土豪劣紳，減租減息和農民起來革命等口號，後面跟着大批農民，到處都有農民笑得裂開了嘴。

七　砲火打不散

在這期間，我們搬過幾次家，又搬回了曉莊。南京的情勢，像天氣似的雖然經過了暴風雨之後，但天氣仍然變化不定，最初是退到長江以北的孫傳芳又糾合了一部份軍隊，渡過長江，攻入龍潭，向幕府山進攻，直逼南京，大砲又在天空怒吼起來，南京的革命軍像潮水一樣擁往前線，曉莊已經成了第二道防綫。我們便遷入太平門金大農場去住，孫傳芳終被打退了。

但隔不了幾天，忽然有一天的破曉，太平門的城墻上機關槍密集的掃射起來，兩軍對陣，一方衝鋒，一方退却，我們在城下看得淸淸楚楚，原來第六軍程潛部隊的一部份在繳他另一部份的

械，據說這部份是紅軍。南京城內外，又顯出特別緊張和混亂。聽說，這是寧漢分裂的開始，上海「四一二」苦迭打，已擴展到軍事政治各部門。英帝國主義等沒有出兵直接來消滅中國革命，却在革命陣綫內部找到動搖妥協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來分化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綫了。

陶先生這時候被阻隔在北方，他寫信給我們說，我們鄉村教育同志決心為農民服務，別人恐嚇不了，炮火也打不散。

八 從野人生活出發

陶先生從北方回來之後，時局有個很短時間的沉寂，他開始發展他的理論，根據他的理想來建立學校，這個時期是他天才的發揮新教育理論的黃金時代。他的理論常常在每天太陽未出土前的寅會上發表，藉以打通師生的思想，好一致動手去幹。他的演講很短，不用提綱，用幽默的富於風趣的語調發出，但字字緊嚴，句句動聽，使人從不感到乏味，差不多隔三兩天，他就報告一次，由人紀錄下來，經他整理，後來集成一本教育論文集，題名「中國教育改造」。

我覺得陶先生那時候的思想，有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從實際出發。他的理想是要改造中國教育，創辦一百萬所鄉村學校來改造一百萬個鄉村，藉以改造社會，進入大同世界。我們不管他的想法如何迂濶，如何嚴重的帶着教育救國論的幻想，但他所擬定的辦法是眼睛向下脚踏實地的從

實際出發，動手幹，不徒托空言，不滿足於理論，講義之類。他一再對我們說，中國過去的老八股洋八股教育是條死路，前面是萬丈懸崖，同志們務須勒住馬，另找生路。

「生路是什麼？就是建設適合鄉村實際生活的活教育。我們要從鄉村實際生活產生活的中心學校；從活的中心學校產生活的鄉村師範；從活的鄉村師範產生活的教師；從活的教師產生活的學生，活的國民。」

他在寅會上對大家講了之後，又用大幅白布畫了一幅鄉村師範建設圖。圖中央有一個圓圈中寫活師範；周圍連接着不少小圓圈，中寫活中心學校；每一個活中心學校周圍又伸出許多觸角，上書實際生活。

陶先生不單這樣說，說了他就召集會議討論怎樣把圖樣變成事實，他好像是全校的總工程師，師生是工程師和工人。他常常喜歡說，校長是大家當的，大家一起動手來創造學校。在他擘劃之下，前後辦起了萬壽學院、吉祥庵學院、和平門學院……他自己兼任和平門學院院長。

怎樣從實際生活出發呢？光是調查研究和農民做朋友是不够的，必須和人民過一起的勞動生活，從這些實際生活中去體會和創造。他把大禮堂題做「犁宮」，犁宮的大門口他寫了一付對聯：

「和馬牛羊雞犬豕做朋友，
對稻粱菽麥黍稷下功夫。」

這付對聯是我們當時實際生活的寫照，我們自己動手做飯、養牛、養猪、自己挑糞下田幹活。人民的生活苦，我們這批初學勞動的外行，過得更苦。生活太苦了，有些人受不了，批評說，這簡直是過的原始的野蠻生活。這批初從學校和城市裏來的知識份子，發出這樣的怨言，提出要過現代生活。陶先生很肯定的對大家說，我們要：「從野人生活出發，向極樂世界探險。」他說，農民在封建制度下最不進步，但過了幾千年生活，天天過去好像毫無問題，我們要替農民謀幸福，就要施動把鄉村教育擺到野人生活上去，因爲野人生活上困難多，問題多，要求我們解決的問題，又急如星火，不容我們苟安。如果我們不過這種生活，發現不了問題，對於農民的生活雖然嘴裏講得頭頭是道，但其實是一知半解，心裏是覺不到的。其實，他所說的從野人生活出發，就是從實際生活出發，後來，他把那兩句名言又寫成一聯，掛在學習室裏當標語。

陶先生這種實事求是的實際精神，貫徹到每一件大小事情上去，他在曉莊爲了解決吃水問題，遍尋農民和築井工人在大小山坡和窪地覓取泉源，他教我們向當地農民學習做土磚砌房，向工友老高學習燒飯，向呂老師學習做物理儀器，向秉志老師學習養蛇捉蟲研究生物。鄉下土匪多，他就召集師生和當地農民討論治安辦法，組織了農民自衛隊。

他和那些從外國回來的博士、教授；或一般學校出來的唸書人，只憑理想或書本知識做事，或機械抄襲外國，不問實際情況，不屑于動手，是迥乎不同的。也和有些人單憑計劃，決議，機

械硬搬，或想當然的，浮在上面發號司令，不深入實際，不親自動手的人，也是有天淵之別的，陶先生把這一流人統統給他一個封號，叫做「書獃子」。

如果你把事情做錯了，陶先生從來　盛言怒色的斥罵人，他總是笑嘻嘻的說，「書獃子！」或者說，書獃子做事一定吃虧。

九　手腦雙揮

陶先生的思想特點除從實際出發而外，第二個特點就是動手幹。照現在流行的話說，就是實踐。他在曉莊時代，動不動就說：「幹呀！」他對任何艱苦困難都毫不畏縮，在他的幹字之下，似乎具有無限的勇氣和精力，他以此自勵，也鼓動大家。他日常也喜歡用幹字來代替其餘的字，他把寫文章叫動手幹，吃飯也叫做幹。他之所以如此，是有他的哲理的。他說，動手幹，創造一切；世界是勞動人民雙手幹起來的，高呼雙手萬能。他埋怨過去的書獃子教育，拚命把死知識往腦袋裏塞，結果變成了大頭鬼，兩隻手却被束縛得長成十指尖尖如葱，因此成了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廢人，這些人吃飯不種田，穿衣不織布，住屋不造房，還擺起老爺架子，吃着沒知識人的飯，還嫌不衛生，受人栽培還駡人愚笨，這種教育教人富的變窮，窮的變得更窮。他把這種教育叫做吃人教育，這種傳統教育是中國封建社會所謂勞心者食於人的士大夫階級（封建統治階級及

其幫兒）遺留下來的，他堅決反對少爺小姐，大聲疾呼的喊：「解放兒童的手！」他寫了一首兒歌，大意是：

「小朋友，
小朋友，
你有一對好寶貝：
身上摸摸有沒有？
找不着嗎？
你有，你有，
不會沒有。
告訴你吧，
就是你的一雙手。
拍皮球，做遊戲，送糖菓兒進嘴，說不盡的快樂，
踢毽子，
那一樣不靠牠？
卻是打倒帝國主義，

也要靠牠！」

陶先生自己動手創造了學校，自己動手學會了種菜、燒飯，他教所有的兒童、青年都要在動手幹的過程中去學習。學校裏買了一隻無綫電收音機，大家不會用，壞了不會修，他就派人到上海去學，學會了回來教大家拆裝修理，後來把新從法國回來的電氣工程師丁柱中先生請來，大家跟他安置發電機發電，建設了無綫電廣播台，所有這些都是由大家動手幹的。

不僅如此，爲了學會管理學校行政，大家還得分任會計、文書、保管、教導等，師生共同負責。所以，當你走進學校，分辨不出師生。

陶先生從辦曉莊一直到臨死爲止，二十年來，我差不多都和他在一起，起先是師生，後來是同事，也是戰友，我細心觀察他，從來沒有脫離實踐過，就是在他隱蔽在上海過地下生活時，也常親自去教小孩和工人，有時研究天文和化學，就親自到空地去觀察夜晚天空的星座，或是拿起試管來做試驗。他一生的成就，得力于實踐獨厚，我發現他的許多理論，都是幹了之後，才提出來的。

但他的幹，并不是盲幹、蠻幹；他教人要多用思考，多用腦子去想。他說，中國工農的頭腦幾千年來像個真空管，就害的不會思想的病；但知識份子只會想，不會動手幹。他曾戲對我們說：世界上有三種人，第一種人奉頭腦做總司令；第二種人奉肚皮做總司令；第三種人奉肚臍以

下三寸的地方做總司令。

當然，他并不是禁慾主義者，他說這話的意思是教人用頭腦去思考問題之後，再去解決問題。這和毛主席要大家開動機器去思考問題，有同樣道理。

陶先生把實踐和思考結合起來之後，他給他的這一概念叫做「手腦雙揮」。他本來喜歡給人家題「雙手萬能」四個字勉勵大家作爲學習的標準，後來改寫「手腦雙揮」了。他有一首小詩道：

「人生兩個寶，
雙手和大腦：
用手不用腦，
飯也吃不飽；
用腦不用手，
快要被打倒；
手腦都會用，
才算大好老。」

他說中國工農羣守成規之所以不進步，因爲他長個腦袋不會想；中國知識份子只會讀書做書蟲不會有發明，因爲他把雙手攏在袖裏不拿出來用。只有一手揮動斧頭幹，一面用腦袋想，手腦

聯盟去雙揮，才會有創造、有發明、才會日日新又日新。他看了我們的小木工廠，并以牠來舉例。

因此，他不祗一次的勸導青年人和兒童說，你們要做自然科學家就要鑽到大自然和實驗室裏去幹；要做社會科學家就得去幹革命，他諷刺那些專作書本研究的所謂理論家，實際上是書蠹蟲爲書獃子。他不但對全校師生，凡是到他學校裏來參觀的教育界人士，達官貴人，他都這樣勸導人家。那時候不叫教育部，叫做大中華民國大學院院長的蔡元培先生，曾不祗一次的來學校參觀，陶先生對他說，中國的大書獃子教小書獃子，這樣一號號下去，中國就變成書獃子國了。我們這裏提倡勞動，全校不用一個工友，所有一切日常事務，連掃地抹桌都得自己幹。我這個校長也得燒飯，掃地。眞的，他的辦公室日常由他自己灑掃，而且受全校清潔檢查委員會檢查。他說，人生了一雙手不會用，天天要人服侍，不成了廢料。他堅決提倡動手幹，後來又把牠發揮爲手腦雙揮來反抗當時死讀書的傳統教育，這就在他的新教育理論上奠下了又一塊基石。

一〇　陶氏的思想基礎

那時候，陶先生給我們最深刻的印象，不是他的聰明才氣，也不是他的誠懇樸實，而是他的親民和親物。這位下鄉的留學生，出身農村，所以在鄉下很快就和農民結成好朋友。他把農民捧得很高，自己甘願當他們的小學生，有事常去請敎他們。他是農民的知心朋友，對農民有無限的

忠誠。他在這時期不但廣泛的交結了許多農友，而且首先他就替農民做了許多事情，如建立農村小學，開辦農民夜校，建立農村醫院，和農民合作開民衆茶園，農村木工廠，農村合作社等等。他常常找農民談家常，細心的聽完了之後，他就在那些最平凡瑣屑的農民話語中，找出什麼是農民最感痛苦，最迫切需要解決的，他以此洞燭了農民內心的甘苦和情感。根據這些，他提出具體而有效的辦法，而且常是建議性質的去徵求農民們自己的意見，和他們討論。農友們常笑着說：「陶叟（陶先生之意，南京土語）說的對！」他就進一步和他們計劃實行，總是拿出最大的力量來幫助農民幹。他說，對農民可以有三種不同的辦法：一種人是陪着大家一起幹，一種人是包辦或包而不辦，一種人是出個命令叫大家照着幹。我們要採取第一種辦法，和農民共同來幹，農民的問題要靠他們自己起來解決，我們幾十個幾千百個人怎麼包辦得了，我們和他們一起幹，不但做個領頭人帶頭教他們做，而且我們自己也可以向他們學習。

他從和平門回來，那年（大約是一九二八年）夏秋大旱，住民沒水喝，學校開了一口井，但水少人多，大家爭前恐後，有時甚至用武力解決。他就以此爲例說，我們覺得這椿事與全村人的生活有關，要全村人來解決，於是就開了一個村民大會，到的人有老太婆，也有小孩，公推一位小學生當主席。他和許多師範生組織了一個顧問團，指導我們的主人開會。他插在羣衆中間和大家一樣，并不突出。他很尊重羣衆的意見，說老太婆說話最多，最扼要。事情解決得很好。事

後，他發表感想道：

「民衆運動，要以對于民衆有切身關係的問題爲中心。」「不要以爲老太婆小孩不可培養，只要有法子，只要能從他們迫切的問題着手。」「民衆沒有指導是不行的，和平門飲水問題，倘無相當指導，可以再過四五十年還沒有解決。」「做民衆運動是要陪着民衆幹，不是替民衆幹，要想培養中華國民，非如此不可。」

由此，我們可以了解陶先生不但深切的愛護羣衆，眞心誠意的爲羣衆服務，而且尊重羣衆，以羣衆爲主人，十分虛心的向他們學習，從相羣衆親密的共事中去體會一切，把牠提高到原則的高度來再去工作。從他發表的幾點感想來看，至今仍爲做羣衆工作的同志所應遵守的準則。

陶先生這種親近人民與人民爲友，向人民學習的精神和思想行爲，數十年來如一日，這就是爲什麼許多外國留學生，許多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知識份子，默默無聞的死去，而陶先生獨能有輝煌成就的主要原因，也就是產生中國人民教育大師思想的源泉。如果陶先生離開了人民，不和人民站在一條戰線上共生死、共甘苦，不代表人民說話，不處處爲人民謀幸福，他就不會有日後的成就。

但我在前面所說的親民，只是構成陶行知和陶行知思想學說的一個基本因素。他還有另一個優越的基因，那就是親物。親物的涵義就是和實際事物接觸。陶先生反對讀死書，換句現在流行

的話來說，就是反對教條主義。他同時反對只說不做的空談家和空頭理論家，他提出「親物」這一個主張來代替傳統的錯誤思想。我開始聽到他提出這個主張是在一九二七年的春天。他在寅會上發表他的學說，目的在打通當時全校師生迷戀書本的傳統想法。這件事，看來容易，但實行起來困難頗不少。他親自領導大家有計劃的去親近各種事物，如研究魚類，他就在校內的池塘裏養魚，訂出養魚教學做的計劃，請專人來指導；如研究園藝和農業，他就購買了幾百畝地，請農業專家邵德馨先生來教大家種地，而且訂出計劃；他又聘請了許多專家學者，師生共同訂出計劃建立了生物室、儀器製造室、曉莊中小學……等等來使大家能有計劃的深入的去親近事物，藉以瞭解事物，獲得知識。他對研究社會科學也謹嚴的循着這一道路。當時，他爲了大家能具體深入體會農民生活，了解中國農村，他教大家過農民生活，拜農民爲師，和農民去做朋友，並從金大約了幾位對農村調查有經驗的人來帶領大家幹。他不時愛說：知識是前人幹出來的經驗總結。在開學典禮時，他提出「以宇宙爲學校，拜萬物作宗師」，便是根據這一理論來的。他把校內圖書館題名爲「書呆子莫來館」，充分表現出他在教育上的唯物觀點。

記得有一個夏天的黃昏，樣榮在塘裏洗澡，幾乎淹死了。他第二天對大家說，就以學泅水而論，光讀游泳指導書不夠，必須到水裏游去，才識得水性，才逐漸學會控制水的能力。如果只是捧住書死讀一輩子，下了水仍不免被淹死。

他又說，你們都看到過農民栽過山芋苗，也看到祁先生栽過，彷彿很容易，但一到你們下手時，便摸不着門路，很多都枯死了。有人說，燒飯有什麼希奇，還值得我去學。但你去試試看，書獃子燒飯，包你又焦又爛。我們過去的老教育辦法，走錯路了。牠教人把眼睛都變成睜眼瞎子不去看世界，看萬物；牠教人把雙手都自動綁起來不去接觸事物。讀了植物學分辨不清稻粱菽麥黍稷，讀過電學的人電燈壞了要請工人修，還有什麼用？這都是吃的不去親自動手幹，不親近實際事物的虧。

親民與親物，從實際出發，動手幹，這就是陶先生初期的教育思想，雖然非常樸素，但這個思想是他的全部理論的基礎，也是促使他不斷進步的一個主要因素，日後，他和他的同志把牠大大的發展了。

二　教育上的大革命

陶先生具備了上面所說的思想，就形成了他在教育上的大革命。大約在一九二九年便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的學說。他從教育方法開始，逐漸發展成生活教育的理論體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從美國回來用杜威的一套到處碰了壁，到了山窮水盡，不得不另找出路。

原來五四運動以後，衰老的中國覺醒了，開始了新文化運動，一部份人看到俄國工人的革命

成功，和中國人民反帝運動所表現的偉大力量，因而追求根本改造中國的道路，如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等同志；一部份人則主張教育救國，在哲學上信奉杜威的實驗主義，陶先生便是其中一人。他回國後便組織中華教育改進社，鼓吹教育改造運動；後來又和晏陽初辦平民教育，自編平民千字課，親自到工廠作坊貧民窟裏進行動員組織。那時，他身體不好，他妹妹勸他注意休息和衛生，他回信說，他下決心爲貧民服務，抱「我佛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幹去，可見那時他把全身精力都貫注在這一事業上。他發現中國農民佔人口百分之八十，農村是中國改造的基本問題。一九二七年辭武昌高等師範（武漢大學前身）校長不就，携僅有的一千元和趙叔愚先生到南京郊外去辦試驗鄉村師範，這在他是一個嘗試；他企求摸出一條改造教育之路來改造中國。

他自己承認他從改革教育方法入手。先提出教學法去代替教授法，主張怎樣學就怎樣教，教的法子根據學的法子。所以五四運動以後，小學教師用的教科書教授法都改成教學法了。又過了一些時候，他主張學的法子應該根據做的法子。有一次，在南開大學演講，仍擬用「教學合一」這個題目，把這意思告訴南開校長張伯苓先生，張先生勸他改用「學做合一」這個題目，於是，他才豁然貫通，直稱爲教學做合一。這就產生了現代中國教育史上有名的教育學說：教學做合一的理論，引起了教育上的大革命。

可是，奇怪得很，他最初很少講過什麽叫做教學做合一，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底，教育界已經

相當流行，那時不但一般人誤解這一教育方法，就是曉莊師生也有些不大瞭然，把教學做分家，寫成教的方面，學的方面和做的方面。他立刻糾正說，這是一件事的三個方面，「事怎樣做，就怎樣學，怎樣學就怎樣教；教的法子根據學的法子，學的法子根據做的法子。」「一件事對己說是學，對人說是教，對事說是做。」不僅陶先生自己後來做了許多報告和文章，來闡明這一原理，他的許多師友也寫了不少關於這方面的書籍。

我們只要提出幾點來就可以捉住這一原理的精神和實質。在教學做合一中，最關重要的中心一點就是做。陶先生曾化費很多精力來闡明做的涵義。怎麼做法呢？

第一，他說，「在必有事焉上下工夫」，事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事，就是實事求是的意思。如果教學做合一不從這裏下手，那末，教師把用嘴巴教書，學生把用耳朵聽人家講書，也可以稱為做了。我們信奉教學做合一的人，就是要把實際生活上所碰到的事，拿來研究，得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才算真做。這種辦法和說法是和陶先生當時提出的從鄉村實際生活出發，產生活的學校這一主張相吻合的，假使沒有這一點，他的理想和理論就會落空。

第二，他說，「在勞力上勞心」的人，才是真做。胡思亂想不是做，盲動蠻幹也不是真做。陶先生分析世界上有四種人，一種是勞心的人，一種是勞力的人，一種是勞心兼勞力的人，一種是在勞力上勞心的人。只勞力不勞心的人不用腦子思想，不開動機器去考慮研究周圍事物，對一

切事物就不免囿於故常，不能創造發」；而且大多數人都淪於愚昧無知，被人欺壓，造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不平等現象。光勞心不勞力的人不免故弄玄虛，變成玄學鬼，對周圍世界并無改造力量。只有在勞力上勞心的人，即一面動手幹，一面思考的人，才能以人力勝天功，世界上的一切發明都是從這裏來的。他能改造世界，使世界變色。他又舉了一個中國古代研究科學的原理說，「大學」上有「致知在格物」一語，朱子解釋爲「在即物而窮其理」，本沒有毛病。但王陽明根據這句話去實行時，便誤入歧途，他先教錢友同格竹，格了三天，病了。於是他自告奮勇，親自出馬，面對竹子冥思默想，格了七天，格不出什麼道理來，也病了。他不怪自己不對，反說天下之物，沒甚可格，可格者，只有自己的心。假使他不走入歧途，而能在實際行動中去研究事物，也許中國科學的嫩芽，不致於因此枯萎。

陶先生對這一研究事物的方法的發現，表示了極大的興奮，他認爲在勞力上勞心是一切發明之母，是消除勞心勞力的階級社會進入大同社會的階梯。除掉陶先生不了解階級社會是私有財產之後才產生的東西，而廣泛勞動階級之所以流於愚昧無知，乃是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剝削壓迫的結果。勞動階級連生活都無法維持，他們那有機會進入知識寶殿去研究發明，要消滅階級進入大同社會，要消滅勞心者勞力者的分隔，只有在被剝削壓迫的工農勞動階級直接起來革命，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統制，才有可能。偉大的蘇聯革命，三十年來已經進入陶先生所說的大同世

界了，他們已經用陶先生所說的方法——在勞力上勞心，培養了大批新型知識份子，這個偉業，單靠教師或單靠教育方法的改革，是不行的。中國現時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正是要把我們引到陶先生所說的極樂世界去，引導到科學發明的世界去，一切知識份子都應該爲完成這一事業而努力。

撇開這些不講，我們單就陶先生的思想方法或教育方法來說，他是有非凡的貢獻的，他站在一元論的唯物主義的哲學基礎上，爲青年兒童，爲人類，打開了一條走入神秘世界去探求事物奧妙的通路。使我們人類可以在接觸和改變事物的行動中，逐漸了解外在事物的內部，這和傳統的教育觀念認爲知識是注入的，是別人打入腦子裏去的，即所謂傳授，無異是一個大革命。

不僅如此，「在勞力上勞心」還含有行動和革命的意義，我們在教導我們的後代，不單用行動去認識世界，而且要去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進一步認識世界。陶先生這個學說的價值，不在文字上研究的完美，而在事實上實行了之後發生了效力，陶氏自己和他的門人，二十多年來都信奉不渝，竭力以赴，他和那些坐在書齋或辦公室裏做文字遊戲的文人學者是大異其趣的。「在勞力上勞心」這一教育學說，在解放區，特別是將來的新中國一定會得到充分發展的。新的工農知識份子，將在這一原則下培養出來。

一二　改名行知的由來

陶氏旣發明教學做合一的教育方法，又把「做」規定為「在勞力上勞心」，這就很自然的相信「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了。這個發現是和王陽明有直接關係的，王陽明主張「知是行之始」，他教人「去人欲，存天理」，然後明心見性，才可以致良知，這本是宋儒以來的唯心派理學家的哲學，陶氏研究了之後，把牠翻了半個筋斗，變成行是知之始，行而後知，不行便不知，并强調衣食住行男女之間等人欲所構成的生活和社會，才是我們做學問下工夫處的基礎。

發現了這個眞理之後，便在黎宮裏發表了那有名的演說，「僞知識階級」，從天不亮講到中午，反復說明一切知識都是從做中得來的，知識不過是前人工作經驗的總結，而書籍不過是工作經驗的記載簿。他妙語橫生的擧發行鈔票爲例說，發行鈔票是要有準備金的，發表文字的準備金就是經驗。沒有準備金的鈔票不能兌現，就是僞鈔；沒有經驗發表空文字同樣不能兌現，就是僞知識。接着，他把三千多年來中國著作界的紊亂情形，做了一個淸算，擧出許多書籍都是僞造的。他大聲疾呼的反對販賣假知識，說過去封建皇帝收買老八股是別有用心的，唐太宗口快已經把這個秘密截穿，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現在，這種販賣僞知識的怪現象，竟仍然普遍存在，豈不誤人子弟，亡國滅種。他把中國近四十年來的「廢科學興學校」的新教育運動嘲笑爲換湯不換藥，「洋八股和老八股雖有新舊之不同，但同樣不是從經驗裡發生的眞知識。」他勸人從做中去學習眞知識，前人的著作，只能作我們做時的參考。他最後，勸大家下決心拒絕中外的僞

知識，努力探求真知識。

自從這次演講之後，我們便建議他改名行知，而且在他那本徵求意見簿上，和他開頑笑的寫道：「先生既相信行是知之始，爲何仍名知行？倒不如翻牠半個筋斗」，這以後（大約是一九三〇年）他就改了。後來，他寫了一首小詩發表在生活教育半月刊上：

「行動是老子，
知識是兒子，
創造是孫子。」

一三　兩位徽州人——陶行知與胡適

談到這裏，我想起徐特立同志的話來，一九三八年，徐老在重慶和我談起生活教育的理論，他竭力推崇陶氏的教育學說，說他繼承了中國哲學的優良之點，而且把牠發揚了，是譚嗣同以後中國第一個哲學家。可惜，當時陶氏不在重慶，以後我們也一直沒有談起這些問題過。陶氏死後，在上海出版了一本「陶行知先生紀念册」，有一位朋友寫了一篇紀念他的文章，大意是說陶氏對人民教育事業極有貢獻，但論起他的學術來，則不如他的同鄉胡適之云云，在同一本書上就有鄧初民先生反駁的文章說，陶行知主義就是陶行知主義，胡適是不能和他相比的。

這兩位徽州歙縣人，幼時同鄉同學，後來又同在拜金主義的美國學習過。不過陶氏家貧，靠了他的天資聰穎，得某傳教師之助，和他母親的辛勞，才享受到高等教育。胡適爲書香之家，他父親對於中國哲學就頗有研究，家學淵原。論起他們兩個人的造詣和貢獻來，胡適重考據，對前人的工作經驗做了一些判斷和註解，但不能和朱熹相比。陶氏平時是很反對人做朱熹的，他常對人說，你們少做些註解工作，多做些發明和創造工作。所以，陶氏本人在學術界也是發現多，他的確繼承了中國哲學優良的一面而把唯心的腐敗的一面除掉了，就完全變成他自己的新東西，他對外來的學說也是採取這個辦法，結果就完全創造出一個新教育哲學的理論體系，奠定了中國新教育的哲學基礎，這就是鄧先生所說的陶行知主義。這個東西，胡適是沒有的。

胡適之在五四運動時代提倡白話文，有過功勞。也寫過白話詩「嘗試集」，如果有創造的話，這就是他的創造。胡適之作白話詩十餘年，抗日前正當文化界倡導大眾化文化運動的時候，他乘飛機到兩廣去，空中寫了一首詩，自以爲是從此打開了新詩的門徑，可惜手頭無此詩，大意是說：「古人千修百煉，才能成仙升天，看我不修不煉，也能凌雲無碍，……」

陶氏看了，頗不以爲然，立刻和了一首，大意是：「天上一日戲，地下千萬滴，百姓流汗難，老爺遊戲場，自己不勞動，還要吹牛皮……」最後一句是三位小先生替他改的。

這兩位徽州人，從美國回來後，同樣信奉杜威的實驗主義，爲什麼有這樣的不同呢？因爲他

們走不同的道路：一位向新世界走，一生不避危難艱苦，堅決站在人民方面奮鬬，爲人民服務，擺脫拜金主義的那一套，這就是陶氏一生成就之所以偉大處。胡適完全是投倒在資本主義文化下的俘虜，曾提出所謂中國文化全盤歐化的論調，這和陶氏反洋化教育（意即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是完全站在相反的反民族立場上的。不特如此，九一八以後，正當全國人民感亡國之危殆，號召人民抗日，痛斥不抵抗主義的國民黨政府之際，在胡適所主編的「獨立評論」上，曾發表怪論爲漢奸尋找歷史根據，說什麼南宋時候，秦檜對金人主和妥協是對的，因爲南宋國力薄弱，根本抗不了金人，而岳飛抗金是錯誤的。這不是明明爲當時「抗日則三月即亡國」的國民黨漢奸理論張目麼？這位所謂「學者」、「哲學家」于日本投降，國民黨反動派正在美帝國主義唆使和扶植下，向解放區和全國人民民主勢力進攻時，忽然裝出悲天憫人的樣子，打了一個電報給毛主席勸解放軍放下武器，仿效英國工黨。要不是受國民黨反動派所授意，也不免天眞到胡塗了，但我想胡適不會胡塗到如此，這實在出於他的立場或出之於他的哲學上的認識吧。我以爲這樣的哲學或所謂學術，在中國還是越少越好。

一四　陶行知與杜威

陶氏是杜威的學生，二十多歲從美國帶了杜威的學說到中國來，這位門生很有一番抱負，希

望把他老師的一套搬到中國來。平心而論，在近代資產階級國家裏的教育學說，要算杜威的比較進步，他用資產階級的民主眼光把近代各種教育學說做了一個總結，也可以說是集大成者。陶氏於一九二〇年執教東南大學時，聯合北京大學，邀請杜威到中國來講學。杜威氏在上海、北平、南京等地宣揚他的「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在做上學習」等教育主張。因此，在民國十四五年左右，全國各地都風行着：「學校社會化，教育生活化」等時髦標語。陶先生也把杜威教給他的資產階級的那一套，在中國搬運了好幾年。後來，他說，到處碰壁，此路不通。爲什麼不通呢？原來，美國是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杜威的教育目的實際上是爲資產階級培養國民和人材，而在表面上則信奉自由主義，說什麼憑了給青年兒童以足够的近代社會所需要的職業知能，就可以自由向前發展。他在方法上，受自然科學和心理學影響主張實驗主義，提用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等。美國那時資本主義已經得到充分發展，而且轉入帝國主義階段向外侵略，連封建剝削和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影子也看不到，中國則剛剛相反。所以，杜威的教育主張，在那時的美國還勉強行得通，拿到中國來，當然要碰壁了。

陶氏不得不猛然轉過頭來，投入中國的實際社會，企求另找出路，但他手裏拿的那把工具仍然是杜老師給他的實驗主義，他在南京鄉下的曉莊，開辦了試驗鄉村師範。在這個時期，他推翻了杜威的學說，把「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翻了半個筋斗，改成：

「生活即教育，
社會即學校。」

這就是生活教育的萌芽。陶氏批評杜威的那一套是假的；他說「學校即社會」等於把社會搬進學校，只是一個縮影，沒血沒肉，好像小鳥關在鳥籠裏一樣，沒有生氣。實行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育即與整個社會和生活血脈相通，不必社會化，生活化了。陶氏開始在寅會上發表這個主張，解說得非常模糊，他說：生活即教育，是生活即是教育，不是生活便不是教育，是好生活即好教育，是壞生活即壞教育。他又根據當時訓練小學教師的五個目標說，是健康的生活即健康的教育，是勞動的生活即勞動的教育，是科學的生活即科學的教育，是改造社會的生活即改造社會的教育。是有計劃的生活即有計劃的教育。

他又給生活教育下了一個簡單的定義道：生活教育為生活所原有，所自營，所需要（Life education meansan education of life by life and for life）。這只是生活教育理論的誕生，很粗糙，缺點很多，拿來普遍應用，還有很多困難。然而，牠的產生是中國教育界破天荒的大事，關於這個學說，陶氏那時祇到此為止，以後我還要專門來談一次。

陶氏說，杜威在美國為什麼主張「教育即生活」呢？因為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只能做些零零碎碎的試驗，在蘇聯就不同，據說杜氏從蘇聯回國後思想改變了，如果來中國，他一定主張生

活即教育。其實，這並不是一個主要原因。杜威的學說，基本上就是爲資本家服務的。杜氏說，康德主張學校由私人辦，因爲由國家辦使被政府利用。杜威主張由政府辦是對的，但美國的政府是資產階級的政府，杜氏希望在個人自由發展與政府之間能够取得協調，充其量不過和資產階級妥協。

陶氏的「生活即教育和社會即學校」眞正價値在那裏呢？無疑的，就是教靑年兒童走入實際社會去鬪爭，去進行革命。革什麼命呢？革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命。這在陶氏雖只用反傳統反洋化教育這個口號，而實質上就是進行的這種革命，以後的事實就是很好的說明。所以，陶氏當時也料到要實行生活教育，就要在思想戰綫上和幾方面開仗，首先是本國的傳統教育，其次是從各帝國主義輸入的帶侵略性的洋化教育。

杜威能不能參加這個革命，是個疑問。一九三六年左右陶氏從美國來信說，在一個美國進步文化界座談會上，杜威和美共領袖同在一張桌上喝咖啡，不認識，還要他來爲他們介紹，覺得很奇怪。他這位老師，是一位十足的舊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美國中小學教師爲了保障自身利益計，組織教師聯合會，他也反對，連陶氏也頗表不滿，說他老了。

可是當這個信奉自由主義的老人，連僅有的資本家恩賜他的一小小自由也快被剝奪時，他也有些憤憤了，一九四五年給陶氏的信上說，世界上的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別國的民主受到損失

時，美國的民主能保持到幾時，也頗有疑問。現在，法西斯已在美國抬頭，思想檢查，壓迫逮捕進步人士已在美國盛行，杜威的自由主義思想，已經受到最後的打擊。

陶氏的學說，泰半來自於杜威，可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吸收了杜威的好的一面而且把牠發展了。

一五　美國派的自由主義者

這位從美國回來的教育革命家，充滿了熱情，帶着中國田園詩人的樸質與瀟洒，他在曉莊山麓造了一座茅廬，周圍是山林，田場，和自種的菜圃，風景非常美麗，幽雅，他在房子四周植了五株垂柳，名其住屋爲五柳村，很有柳宗元所說的五柳先生傳的風趣，這是陶氏唯一的私產，當他避難上海，學校經費困難時，曾幾次想把牠變賣掉，附近人民因愛戴先生，都不忍買，也買不起價。記得房屋落成時，北固鄉全體農民曾打鑼打鼓送了一副匾額給他，上書「衆望所歸」四個大字。

這位懷着雄心的田園詩人，很少住在家裏，經常僕僕風塵，奔走於京滬和城鄉之間，爲學校籌款，以後從師範、小學、幼稚園，一直辦到中學、大學，學校範圍達數十里，規模大了，便改稱曉莊學校，他的大門在和平門，後門在燕子磯，陶氏常說，我們以社會爲學校，學校沒有圍牆實際上也就沒有校門。這樣大規模的學校，經費是完全靠陶氏向社會募集的。

富有風趣和詩意的陶氏，實際上是美國派的自由主義者，什麼時候你和他在一起都不會感到拘束，任何事情，你愛幹就幹，他不會勉强你。那時候，他對組織和紀律的態度是可有可無，認爲最好不妨碍個人自由。

他對黨派的態度也是完全自由主義的，校裏有很多國民黨黨員，他們建立區分部，也有共産黨黨員，那些曾投奔孫傳芳聯師撓阻大革命的國家主義派（現更名青年黨），也在校中活動着，陶氏對這些黨派一視同仁，不偏不倚，有人諷刺他，封他爲五色陶知行。他笑笑說，只要是誠心來爲農民服務，我們應該寬宏大量，常以「無所不包」引以爲榮。

大約是一九二七年的冬天，美國名教育家克伯屈（也是杜威的得意門人）先生從蘇聯遊歷後轉來中國，他在曉莊獃了一天，拍了活動影片，把學生的種種活動都攝入鏡頭，帶走了，他很滿意陶氏的事業，並把蘇聯的種種情形告訴陶氏。克伯屈離校不久，陶氏曾對鄉村教育研究會的同志們說，這次克伯屈先生來告訴我，他在離莫斯科不遠的地方，看到一位夏弗斯基先生辦的一所學校，主張很有一些和我們曉莊相同，他問我們可通過信，我說沒有。我問他夏弗斯基是否共産黨員？他說，不是。我又問他，既不是共産黨員，又怎麼能在共産黨政府下辦教育呢？他說，因爲他要實驗一種新教育，所以蘇聯政府許可他試驗。我又對他說，這一點倒又和我相合，我在國民黨政府之下辦教育，而我也不是一個國民黨員。

一六　藝術家的生活

陶氏是一位很詼諧，樂觀，富有風趣的人，我們每星期六晚上都舉行一次同樂會，他常來參加，他說的故事時常把人引得大笑，後來，他領頭組織了曉莊劇社，編了一齣鋤頭舞，想發展農村戲劇運動，可惜當時受田漢所領導的南國社影響太大，陶氏本人也頗有些浪漫的克的色彩，成立不久便排演田漢的「南歸」，「蘇州夜話」及「生之意志」等劇，他在「蘇州夜話」中飾老畫家，「生之意志」中飾老父，均維妙維肖，飾女兒和兒子者爲秋芳及維棨，不但在校中公演而且到城里去公演，震動了當時的教育界。

陶氏在這方面的成就不大，以後也沒再繼續下去，當時有人問他：「什麼叫藝術？」他的回答是，「能自慰慰人的，就是藝術」，其實照現在的目光看來是不對的，這不過說明陶氏爲一自由主義者而已。

陶氏寫詩，別具風格，頗有些近於馮玉祥先生。這位大衆詩人，開始寫曉莊山歌，農民們在他的辦公室裏引吭高歌，他就把牠記錄下來，然後寫成自己的山歌，再唱給農民聽，并請農民改正，這就是後來有名的鋤頭歌和鐮刀舞歌。從這時候起，我才見到他陸續寫大衆詩，有了創作，他總喜歡唸給大家聽，有不順口的，當場就改，并問你的意見如何。

他高興時，也會做一二首詩和你開個頑笑，雖然滑稽有趣，但含有眞理，他有一次對一位摩登女士唱道：

「二刀毛（註）

二刀毛！

自己的孩子，

自己抱。

不抱孩子的媽媽沒人要。

我從邁皋橋，

唱到夫子廟，

人人都說括括叫。

因爲當時女子讀了書就做太太享福，自己一點不勞動，連生下來的孩子也要叫奶媽帶，陶氏對這種人非常不滿，所以他勸在校的女學生個個要勞動，個個人要能自立，陶氏一家，母親、妻子、妹妹都是勤勞自立的好榜樣。後來，我屢次發現他好用大衆詩來規勸人家。有一位女工叫朱賓如，當時陶氏提倡知識份子與工農結婚，她便和一位教師結婚了。婚後，態度大變，喜歡漂亮遊樂，輕視勞動，他寫了一首詩勸她，大意是：「已經上了岸，何必又下海……」

（註）二刀毛係南京人指摩登女子。

一七　見得與見不得

旣談到男女關係，順便提一下陶氏在這方面的見解。那時，他主張男女學生結了婚之後，能在鄉下辦夫妻學校，可以照顧到中國一半不識字的婦女，他寫了一首村魂歌道：

「男學生，
女學生，
結了婚，
做先生。
那兒做先生？
東村或西村。
東村魂，
西村魂，
一對夫妻，
一個魂。」

學校裏的男女學生，自由戀愛，也就免不了，每當月上柳梢或晨光微動中，常見愛侶情話。這在鄉下人是看不慣的，有人反映給他，他召集男女學生講了半天，說明「自由戀愛」是對的，但不能妨碍自己的學習和整個學校的工作，尤其要注意鄉下是個封建環境。

有人問他戀愛的標準如何，他說志同道合，互相愛悅。有人提出德行是唯一的標準。他反問道：好，現在有一個老太婆，品德高超，你愛她麼？我看你還是選擇年輕美貌的女郎。說完，哈哈笑個不止。

不曉得什麼時候，曉莊的戀愛故事，傳到國民黨政府的大官員耳朵裏。有一天，部長大人責問陶氏道：聽說你的學校裏，男女關係有些浪漫，我看到男學生和女學生合騎一匹驢兒，這倒有碍校譽。

陶氏一本正經答道：「對，兩人合騎一匹驢的確與校譽有碍。但他們騎在驢子背上，上見得天，下見得地，中間還可以見人。比那些大人先生坐在汽車裏，偷偷摸摸，上見不得天，下見不得地，中間見不得人，不好多麼。

一八　為農民除害

這時候，正值國民黨反動派向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投降，實行清黨以後，把全副精力都用去

討伐異己，忙於混戰，無暇把血腥的魔手抽出來殺戮這批秀才，所以陶氏的事業仍能苟延殘存下來，但情勢一天天對學校不利。他抱着一貫不問政治的自由主義態度，努力爲農民除害興利，懷着建立新鄉村和新中國的幻想。

那年大旱，蝗蟲像烏雲似的飛過江來，牠們所過之區，樹木光禿，禾苗消滅，連多年的茅合也啃個精光，像被火燒過似的。農民們懷着恐怖的心理，焚香膜拜，口中喃喃禱告，祈求上天保佑。此外，則到處鑼聲喧天，想拒止蝗蟲停落下來，但這個可怕的昆蟲終於像一陣黑煙似的落滿大地，農民到處發出悲苦無援的嘆聲。這時候，陶氏聯合附近幾鄉農民組織滅蝗隊，又成立滅蝗總部，他自己也參加田野撲滅工作，拉着農民在咕噥着治蝗的方法。

兵災天荒，土匪蠭起，在國民黨中央政府的城門外，一到太陽斜西，行人就絕跡，黃昏以後，處處是犬吠聲，亂槍聲，婦孺喊救聲，焚燒村屋的火光，不時從左邊或右邊起來，這是土匪縱的火，我們常手執木棍斧頭逃到勞山之巔去，聽到山下農民悽慘的號救聲，掠過黑暗的冬夜，心裏就有一陣難過。在這情形之下，陶氏發起組織了農民自衛隊，得到四鄉農民熱烈的擁護。

一九　馮蔣在曉莊

那時候馮系人物薛篤弼任國民黨政府內政部長，送了一百多桿破步槍給學校，學生便武裝起

來，馮玉祥氏又派了一位營長來担任教練，於是每天清晨學生便和農民一起練起武來。馮玉祥氏自己也來參觀過學校，教學生打過槍，陶氏和他是同鄉，馮又佩服陶之爲人和他的主張，所以相見之後，友情較好，陶親自陪他參觀，招待他吃飯，以後又領他到附近山林去遊玩，馮以後在陶氏住宅前面蓋了一座茅舍，取名爲馮村，日後就不時住到這裏來，這在蔣介石心裏是頗不順眼的，他嫌疑陶氏與馮陰謀反對他，其實，那有這回事。不過，讀者要知道馮玉祥炫赫一時，爲什麼現在有起閑情逸緻來呢？說來話長。

原來，自從寧漢分裂，國民黨反動派向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投了降，他一面向英美帝國主義投降，革命軍渡過浦口到了山東華北地區之後，和日本帝國主義衝突起來，日寇直接出兵佔領濟南，殺了蔡公時，當時全國人民憤怒，但蔣介石又終於向日本帝國主義投了降，以後國民黨反動派就墮落而爲藏垢納污的集團，萬惡的軍閥，卑鄙的政客，吸人民血膏的土豪劣紳，地痞流氓都滾進國民黨去了，在賣國獨裁的屠夫蔣介石領導之下，他便勾結帝國主義和封建反動勢力來向工農和全國人民開刀，一面把軍隊開到南方各省去剿殺毛澤東、朱德和葉挺、賀龍等同志所組織的工農紅軍，一面派出大批軍警逮捕殺戮工農及革命份子。此外，蔣介石爲了建立他個人的全國大獨裁，不時和地方的大小軍閥發生混戰。

大約是一九二八年左右，中國北方有過一次大混戰，那便是閻馮倒蔣戰爭，後來山東韓復榘

倒戈，閻馮失敗，馮便被蔣軟禁在南京。

革命的人民是不曾屈服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到處仍然有革命的行動，反動派內部也不穩，這時候，反革命的蔣介石成了血腥的屠夫，他唯一對人民的方法是殺，殺，殺，此外就是把國民黨內部的李仁潮，胡漢民……等軟禁於湯山。

這位屠夫，忽然有一天，不知懷着什麼鬼胎，陪着妖艷的老婆也到曉莊來參觀了。來時，氣勢赫赫威嚴，戴了白手套，佩劍帶槍的衛隊，從和平門一直密佈到觀音門（在燕子磯附近），如臨大敵似的。

他們夫妻一到，便走進那所曉莊小學的茅屋內，宋美齡嬌滴滴的不斷的喊：「甚好，甚好！」

陶氏那天事情很忙，學校里本來每天派定學生輪流擔任招待員，那天恰巧是劉世厚君，他便領他們參觀一遍，老蔣悻悻而去，認為陶氏不親自來恭候他，是看他不起。

事有湊巧，那天老蔣去遊燕子磯頭，又碰到栗戇山先生在那裏給學生上生物課，對蔣并不理睬，仍上他的課，這本是一般教授的工作態度。老蔣心眼窄，一打聽是曉莊教授在上課，心裏更懷不滿。這就種下了殺機。

二〇　封閉曉莊的內幕

一九二九年年底，無錫民衆教育學院的學校當局說我政治上有共黨嫌疑，把我辭退了，便離開該院仍回到曉莊，陶氏要我參加蟠龍學院（即群衆教育學院）的籌備工作。那時節，國民黨反動派雖已向帝國主義投降，但羣衆反帝的情緒仍然高漲。南京的反帝烽火終於由下關的英商和記洋行數千工人燃燒起來了，城市小市民，大中學學生也捲入了這個運動，成萬的人舉行遊行示威，英勇的喊出反對國民黨賣國政策，驅逐英美日帝國主義出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使帝國主義戰慄起來，當羣衆的示威行列走上街頭時，除國民黨反動派派出大批軍警鎮壓外，停泊在長江裏的英日兵艦，也發射大砲，直接干涉中國人民的愛國運動。從這裏，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英、美、日等帝國主義企圖直接干涉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人民的偉大革命不可能時，便變更花樣，在革命內線中找到動搖妥協、腐敗自私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自此以後，各帝國主義便聯合起來扶植這一個反動集團，來向中國人民進攻，意圖撲滅中國人民近百年來的民族解放運動，而國民黨反動派便變成中國歷史上最反動，最無恥的民族敗類和國民公敵了。

以賣國賊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政府，除東剿西征用兵大批大批的屠殺中國人民，進行內戰以外，這時候的刀鋒已開始指向文化界。而那時候的文化界也是五四以後，最活躍的階段，大批進

步書籍如馬克思的「資本論」，恩格斯的「貧困的哲學」之類的書已風行起來，文藝界正熱中於普羅文學的爭論。上海文化界已普遍進行組織，有文化界左翼聯盟，魯迅翁和郭沫若先生是主帥。寧漢分裂後，白色恐怖已漸漸籠罩到上海，而且日漸加濃，黑暗的日子終於來臨了，許多雜誌書籍被查封了，文化人也陸續失踪了，許多人被逮捕囚禁，嚴刑拷打，百般凌辱和殺頭活埋，於是在上海有人權自由保障大同盟的組織，魯迅翁領銜發表宣言，痛斥國民黨反動派的無恥屠殺和凌辱中國革命進步志士，號召大家組織起來保障人權自由。宣言傳到曉莊，立刻沸騰起來，一場劇烈的舌戰之後，便組織了分會。

就在這個前後，曉莊又爆發了一件事情：時值春季，草深花香，江南景色如畫，正是各校學生春日旅行修學之時，曉莊小學的學生發起到棲霞山去旅行，採集標本，師生計議已定，但口袋裏空空如也，往返要求路局免費不得許。小孩子反問道：「我們是工農子弟，我們的父母出錢流血汗好容易築成鐵路，讓闊佬寫意，不讓我們去旅行修學，這事合道理麽？我們要一起去說理！」

在這理直氣壯的一致要求下，師生結隊到和平門火車站上，經過與車站的人一場爭論，車站上也說不出什麼大道理，只好讓他們不打票上棲霞去了。陶氏對這件事是很贊成的，他在當時曉莊的大壁報上發表了一首詩來鼓勵大家，其中有：「生來不自由，生來要自由，誰是革命者，首推小朋友！」之句。

這事傳到國民黨反動派當局耳朵裏，那還了得，寫：「陶知行要造反了！」

於是啊，忙壞了國民黨一羣壞蛋，他們派遣了特務來偵察，這時候反動派的特務還幼稚，還沒有現在那末普遍和陰險毒辣，下流無恥，他們像一個失去靈魂的幽鬼，偷偷的站在陰森的角落裏，窺覷一切，偶而也有時站在路口上，但一經人們投以莊嚴的眼光，他就駭得躲起來了。有一天夜晚，我和緯棨到秋芳那兒去，碰到一位青年特務在誘惑她，我們一進門就指着罵不要臉的特務鬼呀，動手要飽以老拳，那特務嚇跑了，但後來有一位姓俞名仲篪的終被受買，當了內線的特務，受谷正倫指揮，谷是當時國民黨反動派政府的南京衛戍司令。

一九三〇年反動派的血手已伸到曉莊上空，但鄉村五月的空氣仍然是甜香而又靜美的。大家仍忙於工作和學習，陶氏一向在城裏爲經費奔走。一天的清晨，東方只發麻花亮，我們偶然聽到村上的狗叫聲越來越緊，像是出了什麼事；下床從農家的小窗洞裏向外一看，只見大隊的灰色士兵和穿黃制服的憲警約有五六百人，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槍，腰貫手榴彈和麻繩，正迎面而來，我們一看勢頭不妙，便連忙逃入附近麥田中。那大隊人馬，如臨大敵似的，離校本部一里許，那指揮者一聲口笛，便分爲左右兩隊，俯首直衝，向校部包圍上去。一個衝鋒到了校裏，犁宮被包圍了，但裏面鴉雀無聲，原來一個人也沒有。那時學校分得很散，師生都住在老百姓家裏，這個意外使得那個指揮者呆住了。他是受了上峯的命令，說曉莊聚衆千餘，有槍數百枝，準備用暴動顛

覆政府，務必包圍而殲滅之，如有反抗，格殺勿論云云。但好像開玩笑似的，那指揮者暴跳如雷的叫道：「槍，槍，槍，你們的人槍呢？我是奉命來繳械的！」

「什麼槍呀？你是說內政部送的破槍麼？」有一位同學說，「放心，你們要，我們奉還就是了，槍已修好不少，修理費也奉送！」

一會兒一百多枝鎗都堆在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的指揮者前面了，他似乎因爲沒有發生戰鬪，也未能殺人，不能邀功請賞，而感到不滿似的。

「封閉，封閉，封閉你們這個造反的學校，你們都是反革命份子，土匪！」他們咬牙切齒的罵着，大家聽到他出口汚辱人，都氣憤的走開了。

「封條貼在那兒呀？」有一位憲兵拿着衛戍司令部的朱筆大紙條，問那個指揮者。這又給他來了一個難題，曉莊周圍幾十里，無邊無門，眞是封條貼向何處？這一下又給他呆住了。然而，畢竟「英雄」不凡的指揮者是有辦法的，他立即罵那人道：

「混蛋，貼在這裏和那裏，不是都行！」他一手指着犁宮，又指指「書獃子莫來館」，因爲這兩處的茅屋比較濶氣。

他們在這里整整搦了一天，但一無所獲，傍晚把百多枝破槍拖走了。但第二天一早，又派了一個連包上來，反動者自以爲得計，可是仍舊撲了個空。他們開始驅逐學生，但師生均住在老百

姓家裏，又感到無處下手。這够國民黨一羣反動派傷腦筋的了，他們後來終於想得一計：派兵一連長期佔領曉莊。

學校被封後，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胡漢民在國民黨中常會上的報告，大意是說，陶知行辦的曉莊學校勾結「反動份子陰謀不軌， 本黨爲肅淸首都禍患於未然，特勒令封閉，陶行知本人事先未能防範，亦不能辭其罪」云云。後來（大約是一九三三年）通過馮玉祥先生啓封曉莊時，蔣介石對馮表示，封閉曉莊是胡漢民的主張，并不是他的主張，而其實種因於蔣去曉莊時，陶氏未親自招待，而對馮則比他好，這就是事情的內幕。所謂勾結反動份子大概是指馮了，眞是虧他想得出。

二一 陶氏被通緝逃亡

學校被封之後，我們發起護校運動，師生整隊到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去，責問他爲什麼封閉我們的學校，要部長負責說出正當理由來。部長推不在，不敢出來，改由次長朱經農出來答說，但他含胡其辭，說這是上峯的命令，要大家靜候解決云云。既不得要領，便分隊向南京各大中學校教育界及社會人士呼籲，陳說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後來，我們又印了大批護校的宣言傳單，在戲院、學校及公共場所散發，反動派便開始捉人了。許多同學已關進衞戍司令部，而且征騎四

出的追索着一批積極份子。那時，曉莊已不是我們的活動中心，因此遷入城里。

有一晚，我們正在中大附近的成賢街某朋友住處，談論着我們的活動和反動派的所謂緊急處置，發着紅光的昏暗電燈下，突然出現了陶氏，他依然那末從容而悠閑的笑着，他走進屋來，我們便都靜下來，朝他凝視着，似乎在等候他說出什麽喜訊或惡耗。果然，他變得很嚴肅的開口了，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吐出來的：

「我是來向你們告別的！」

大家驚疑的望着他，依然屏着聲氣，在聽候下文，他接着微笑說：

「他們下令通緝我了，這是蔣的密令，大約明天早晨就要執行，我得趁今晚十一點半的快車，趕到上海去！」

他吐完這些字，燈光變得更昏暗了！滿屋子的寂靜，沒有一個人願意先說話。還是陶氏開口了：

「你們，留在這兒，得當心呀，他們已經下決心來幹我們了，我建議你們下鄉。」

態度是那末慈愛而又嚴肅，他坐了一忽，又來回的在斗室中踱着，足足在那里逗留了一，二小時。最後，他默默的掏着口袋，留了一些錢給我們說：「必要時，你們得向上海跑，不要硬拚！」

他戀戀不捨的走了！他辛辛苦苦，朝出晚歸，不避烈日寒霜，不避艱苦困難，慘澹經營達四年之久的曉莊學校，曾博得中外人士敬仰，在國內起着推動作用的鄉村教育的發祥地——曉莊，竟被國民黨反動派用槍桿摧殘掉了！

以一個自由主義者，政治上不帶任何色彩，僅僅不過爲了捧出一顆純潔的赤心來，爲農民服務，爲民族求獨立富强，爲中國教育尋求新路，赤手空拳，純良樸實的吃苦耐勞的工作着，竟因此遭了反動派的嫌疑，而被迫害着。這在陶氏心裏不得不引起一個疑問，不得不使他研究「以後怎麽辦？」

陶氏是個倔强者，他是不會被反動派嚇倒的，正如他那晚和我們離別時說：「我們還要幹！」

二三　大屠殺

陶氏離開南京後，我們的活動仍很積極，那時的主要活動是在文化界、教育界和學生界，揭露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以掀起人民大衆繼續反帝反封建，特別是反蔣的革命運動。散傳單、集會宣傳是我們常用的辦法，在戒嚴情況下遊行示威已經不可能。有一次，在中大學生集會中進行了宣傳并散發了大批傳單，反動派立刻捉起了大批青年學生，我乘黃昏時光逃

到城外一座小鎭上。另外幾個人逃入紫金山南麓的孝陵衛。不到幾天，他們又潛入城內繼續宣傳反蔣，號召人民起來武裝起義，在夫子廟他們燃放爆竹，聚集了大批觀衆之後，立刻就進行了宣傳。這次，我們優秀的石俊被捉去了，以後被反動派投入監牢，嚴刑拷打之後在雨花台槍決了，同時被捉去的還有好幾個人。以後接連不斷的有人被捕，殘暴無恥的反動派連小孩也捉起來，投入牢獄施以野蠻的嚴刑，其中有一位姓袁的小孩不過十二三歲，原在曉莊小學讀書，反動派把他捕去，給他好的吃，好的穿，許他種種好處，甘言蜜語，企圖引誘他，收買他，要他供出什麼來。他們又在屠夫們設的軍事法庭的壁上開了一個小孔，每當曉莊被捕同志被審問時，他們就叫小袁來認，并要他說出這個被審問者的歷史和活動，但小袁給他們的答覆是：「你們這批野獸漢奸，反革命，多末無恥，混蛋，……」他罵他們，他大哭大鬧。沒有人性的國民黨老爺，便把他一併在雨花台槍斃了。還有一位女孩子，已經回到安徽和縣老家去，反動派的憲兵把她捉來，路上乘火輪，她在驚慌中跳入長江自殺，軍警用鐵篙把她身上戳了一個大窟窿，從江中鈎起來，投入南京衛戍司令部的監獄，打得皮塌肉開之後，也上了雨花台。就這樣，許多革命志士和無辜的老百姓受到了凌辱、暴刑并喪失了生命。在這裏，我還須提一下，一位廿多歲的詩人和童話作家葉剛，他和幾位青年被國民黨老爺活埋掉了。一九三〇年的春天，我們都離開曉莊在城里活動，他却默在曉莊和國民黨駐守的連裏士兵縱談着革命問題，勸他們拋棄反動派走到革命的人

民大衆方面來。他又向連長談起這些問題。連長告了密，說他是滬寧路的暴動總司令，當晚用汽車裝到城內衛戍司令部，老爺們聽說是暴動總司令，驚惶萬狀，不敢送到雨花台去執行槍決，當晚就在城裏活埋掉了。

六月的南風正吹着南京鄉村的杏子黃熟的時候，我從離城四五十里的一個小車站坐上夜車，逃到了上海。不久，牛頓同志來對陶氏說，衛戍司令部通緝十餘人，我和在座的幾位都在內，除一部份遇難外，幸而一部份已逃走了。至此，曉莊已星散。

反動的國民黨已完全投入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懷抱，猛烈的屠殺起人民大衆來，他們的口號是寧錯殺一千個，不放走一個共產黨。這時候，共產黨一面掩埋了淌在血泊裏的戰友，一面擦乾眼淚，繼續領導人民大衆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那位企圖向國民黨反動派妥協而達到革命目的，竟昏瞶到壓制羣衆運動，收繳工農槍械的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陳獨秀，早已被淸算出去了。但革命的正確道路還未找到，毛澤東同志還沒有出來領導全國人民。因此，在革命的道路上還有一段險惡的路程，誰也不會忘掉那時候的所謂立三路線的左傾機會主義。

二 寫他在國難時期

二三 苦悶中尋找出路

我到上海不久，便找到了陶氏，那時我們十幾個人住在法租界一家小旅館裏，只有一張小床，我們大家都睡在地板上，惱人的臭蟲常使人深夜不能入睡，陶氏常在半夜以後回來，情緒是那樣波動，他一心想念着他的事業，痛恨着暴君蔣介有，這時候，變得非常沉默，然而內心正燃燒着熱烈的火焰。「我們還要幹！」這是他常常拿來鼓勵大家，也是鼓勵自己的話。可是，當他一想到怎樣幹法的時候，他便有些惆悵了！他爲了逃避特務的迫害，後來不得不隱蔽在一位很富有的同鄉的家裏，夜晚才能出來，孤獨使他格外增添了苦悶。那時候，我住在打浦橋的日暉里，和田漢先生隣近，南國社裏一羣青年男女，大都是左翼的文藝工作者，陶氏時常去玩。但他常是半夜乘了同鄉的汽車去，一去就約我們到郊外去兜風。

八月的上海是那麼悶熱，弄堂裏的水門汀走道上睡滿了人，手裏不停的揮着扇兒，嘴裏仍不斷的喊熱，淸涼的海風幷不能驅散晝日的暑威，但使人們心裏最沉悶燠熱的是政治上的黑暗和人

民的遭難。有一天，我們已經睡熟了，大概已經過了午夜，他把汽車開來，在我們的住屋下面拚命的叫喊着，好容易把我們叫醒了。他提議到吳淞口去看海潮。車夫開足了馬力，車在原野上像飛似的掠過了田園，一股股清香的稻禾，不時撲上鼻來，我們都心曠神怡的談笑着，大家心裏都在想着，「我們又回到鄉村了！」但誰也沒有說出口來。

喇叭「都都」幾聲，喘着氣的汽車，突然停在海濱旅館門口。我們步行到了海邊，潮水已經在退了，沙灘裏的螃蟹特別多，我們一邊捉着玩，一邊談笑着。皓月當空，爽風從海心吹來，暢快異常。後來，又到海濱旅館吃了點心，直到破曉時分，才回到繁雜的上海。

那夜，我們談了些什麽，現在已記不清楚，但有一個印象仍清晰的記在心頭，那便是陶氏苦悶彷徨的情緒，他的確走上十字街頭，不是向左便是向右，中間的道路已經走不通，變了絕路了。

當他拋棄了杜威的那一套，正滿懷高興，大踏步走向農民羣衆，面向中國實際，企圖對民族和人民有所貢獻，對新教育事業有所作爲時，忽然晴天來了一個霹靂，始則封閉他的學校，繼則通緝了他。他原是一個無黨無派的中間人士，平時竭力表示只問教育，不問政治的超然態度，而且小心翼翼的遵守着反動派規定的教育法規。他原是以自己不是一個國民黨員而在國民黨政府下辦教育自許，認爲杜威在資本主義國家只能做一點一滴的小試驗，倘使杜氏到中國來也會贊成他

這樣大規模的以整個社會，整個實際生活爲教育的實驗的。可是，曾幾何時，這個自由主義者的美妙的好夢，被蔣介石一紙密命便完結了！

他滿懷好意走到農村，希望減輕農民們的壓迫，解除他們的痛苦，他又馨香盼禱的企求中國民族獨立富強，可以從軍閥和帝國主義的魔掌下擺脫出來。這位大慈大悲的仁人君子，其言，其行是可以告之神明而無愧的。給蔣介石但他的回答是：「不許動，讓我綁起你來，關你的禁閉！」

這條中間道路，已經碰了壁，幾乎把頭碰掉！而超然派的自由主義者也當不成了！我怎麼辦？我怎麼辦？我向左轉，參加眞正的革命隊伍，共產黨麼？想起這些，他茫然了，他還不能下決心，他留戀着過去的一切！這就是使陶氏跌入苦悶之淵的唯一原由。也是他快結束這種思想的時期了。

二四　法國公園之夜

我們從一家羅宋餐館（白俄開設的）出來，街上行人已逐漸稀少，夏末的夜晚仍舊是那末熱，我們在街頭漫遊着，經過法國公園時，已經到關門的時刻，守門的安南巡捕不許進去。陶氏手拿鵝毛長扇，悠然自在的像孔明似的和巡捕談笑着，以他的詼諧口齒，終於說服了巡捕，允許我們進去了。遊園的士女已不很多，但三三兩兩情話綿綿的時髦男女，不時可以在半暗不明的樹

叢中碰到。我們選擇了一叢森林後面的長靠背椅上落了座，那裏很隱蔽，遊人很少，我們可以毫無顧忌的漫談起來。

綽樂在田漢編導的卡門一劇中曾飾一濶少，出演成功，陶氏說他是勇武的美少年，以後又談到劇中的一位美貌的女郎，又談到戀愛之類，總之是苦悶中的一些瑣談。不知怎麼一來，話鋒一轉，直指向中國革命問題，從國民黨反動派圍勦江西紅軍，一直談到反動派對上海文化界的圍剿已經開始，特務活動已經加緊，左聯最近的活動如何如何等。陶氏交友廣濶，他對各方面的消息都能聽到，一件件從他慢騰騰的嘴裏說出來。他說明目前的革命鬪爭在上海隱蔽的進行着，而且非常劇烈。他痛罵國民黨反動派，說他們是一羣無恥的壞蛋，而蔣介石遲早是要失敗的。

「你願意加入到這鬪爭的隊伍里去麼？」不知是誰，突然這樣問起陶氏來。

「你是問我，願不願意加入共產黨麼？」

他這樣問那人，沒有作正面的答覆，只說，要我像青年學生工人那樣走到街上貼標語，散傳單，遊行示威，喊口號，我要考慮，我以為要做的鬪爭很多。

以後沒有再談下去，這說明陶氏除對當時李立三路線懷疑外，主要的是由于他仍在自由主義的圈子裏打滾，希望學校能够恢復，黃金的曉莊時代又會飛回來。因此，他仍在懷疑，猶豫，徬徨和苦悶之中。

二五　實驗主義者的幻滅

反動派在各地文教界進行了逮捕和屠殺，稍具愛國心和進步心的學生，教師，文化工作者以及稍對蔣介石統制微露不滿的各色人等，均以「共產黨」或「反革命份子」的罪狀，瘋狂的施以捕殺，於是逃到上海的人也多起來了。

大約是一九三〇年的夏天，陶氏在孟淵旅館召集曉莊師友，舉行了一次座談會，那次座談的性質完全是檢討過去四年的曉莊工作，但談論的範圍從鄉村教育，鄉村運動，一直到中國革命問題，參加那次會議的人，大都是從事實際鄉村改造運動的人，大多數都碰了壁，遭受到反動派的汚辱和迫害，貴州的老教育家黃齊生先生那時已參加中華職業教育社徐公橋的鄉村改造運動，也趕了來參加。

開始只泛泛的一般檢討了曉莊運動的成敗，但問題的關鍵在于中國革命問題，許多人都只單純的痛恨×××，喊出要打倒蔣介石，但如何打法呢？這不是個人的力量所能辦到的。于是有人提出只有靠革命的工農大衆，團結起來，在革命的政黨共產黨領導之下堅決的對封建勢力及帝國主義鬪爭，才能求得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新的教育事業，才可能順利發展。這時候，有一位年老的鄉村運動者，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他說，曉莊之所以遭受打擊，完全是由于採取了過火的行

動，犯了左傾幼稚病，惹起了政府的注意，假使我們只對農民進行教育，改良農作物，一面提高他們的文化政治水平，一面改善他們的生活，如此不也可以達到鄉民自治自衛，自給自足，進而至於國富民强嗎？說這話的，正是一九四六年春因奔走國內和平民主而殉國的黃齊生老先生，二十年後，黃老先生因身受的經驗教訓太多也投到人民的眞正救星共產黨隊伍裏來了。不過，當時黃先生還是一位農村改良主義者。在座有一位青年批評他是溫情的改良主義者，說他受蔣介石的教訓還不够多，說他還在做美妙的夢，說他的理想建築在沙灘上，簡直是幻想，反動派封閉曉莊不是給我們這批革命的幻想家一記響亮的耳光麼？

辯論是很劇烈的，有人漲紅了臉，說話的聲音有些發抖，有人猛力的抽着煙捲，有人來回在房間里踱着。陶氏始終沉默的坐在那里，沒有疑義這些爭論引起他內心的更沉重的苦悶。忽然又有一位青年說，曉莊學校是信奉生活教育的，他不但標榜反傳統反洋化教育，而且在腳踏實地的從中國社會人民的實際生活出發，來反對傳統的洋化的一套，在這個鬥爭中以求建立新的一套，創造出人民的極樂世界。沒有問題，這是一個革命，而且這個革命實際上是反封建（中國傳統的老教育老文化）反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侵略的洋文化洋教育）的偉大革命，不過用教育的形式出現罷了。既然要實行這種革命的新教育，又要和中國的實際革命離開，不是很可笑麼？這一席話射中了陶氏的心臟。他再也不能沉默了。他說：「這話對呀，我們是實際的革命者，我們已

經打了一回仗，但還沒有來得及回敬人家一拳，就潰敗下來了。我們今後不能再靜坐在書房裏計劃或理想什麼，也不能再一點一滴的從一個村，一個鄉來做試驗工作了。我們要聯合更多的人來做這件工作，我們的基本隊伍就是農民，中國革命要得到成功，非三萬六萬千萬農民起來不可！現在工人已經有了紅色的政黨——共產黨，我想農民也應該有一個綠色政黨（意思是農村到處是青枝綠葉的世界）。」

「你的意思是我們不再辦學校，用教育來救國了？」一位問。

「也不再做實驗新教育的美夢了！你是說，我們得組織農民黨來領導農民革命！」另一位問。

「我的意思，眞是這樣，教育不過是達到農民解放的一個工具，這個工具是主要的，但最重要的還是武器。」陶氏滔滔不絕的說着，他又站起來很嚴肅的說，「你們知道麼，列寧革命之所以成功，就靠他有一支勁旅，可以打敗敵人！」

這一場舌戰，總結了曉莊工作，陶氏經過一番內心的思想鬪爭，實驗主義已開始在他心裏幻滅了。

二六　亡命日本

座談後不到幾天，反動派的特務已經密佈上海，當了特務的陶氏叛徒，當他把南京的曉莊同志捉離打散之後，也跟踪來滬，時常釘我們的梢！外間也有逮捕陶氏的傳說。大約是一九三〇年的秋天，陶氏悄然離滬，東渡日本。他走後，特務俞仲箎便忽然有一天，帶了他的愛人到我的寓所來訪。那時候，緯棨，鳳韶，一冰等都住在我們附近。一忽然緯棨也來了，他和俞仲箎開玩笑，罵他不要臉的披起蔣介石給他的老虎皮（指軍裝）來。當晚，我對緯棨說，特務旣來已經光臨了，我們得趕快退避三舍，第二天清晨我就搬了家，在秋雨溟濛的夜晚，乘上了滬杭路火車到了杭州，又坐上了浙江紹興一帶的烏篷船，溯富春江而上，沿岸山水幽美，直抵閩浙贛邊境的江山縣，隱蔽在一所中等學校裏教書。

當年寒假，我又潛回上海，才得悉我走後緯棨便被特務以同乘汽車到北四川路上海大戲院看蘇聯影片爲引誘，一氣把他送到上海公安局以後轉南京，關在衛戍司令部裏，經過酷刑。一天的清晨，牢警點名喊他，拿了一枝粉筆走到監禁他的內室小洞口去，問他可有什麼話要留下來，他拿起筆來向那個壞蛋的鼻梁上擲去，他引吭高歌，唱着：「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走出牢獄，和他同時綁赴雨花台的，還有十幾個青年。反動派用人力車拉着他們，兩旁大隊的軍警警戒着，他們沿途喊口號，唱國際歌，沿街人民熱淚盈眶的目送他們去就義。緯棨的愛人郭鳳韶，爲了想設法營救他，一個月內又投入特務的陷阱，被騙到了南京，被奸污後又投入牢中，打得皮肉

開花，血流滿身，夏天穿的一身印花紗旗袍便和肉泥沾在一起撕不下來了，以後也上了雨花台。

總計曉莊同志被殺被監禁的有數十人，這不過是反動派所造成的殺人血海裏的一小滴而已！那時候，正是國民黨反動派對全國革命青年實行肉體毀滅的時期，僅南京衛戍司令部一個監獄，每天天不明就有幾十人被送上雨花台。蔣介石在十年內戰中，除在各地監禁幾十萬革命份子外，被他屠殺掉的至少有五六十萬青年男女，革命先烈流的血可以成河，白骨可以堆成山，而母親和妻兒流的淚可以造成湖！可是，反動派并沒有嚇退革命的人民，烈士的血也沒有白流，經過他們的灌溉，才有了今天！真如陶氏在鐮刀歌中寫道：

「野草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刀兒，刀兒，荷荷！」

大約是一九三一年的春天，陶氏從東瀛歸來，隱蔽在北四川路，我們仍只能夜晚約在小飯店裏會面。時隔半年，景物全非，昔日的友好和學生，死的死，逃的逃，被投在監獄裏的則在呻吟。陶氏的悽愴之感，是可以想得到的。但態度，仍很堅定，只簡短有力的說，我們要為死難者報仇！

我們問他在日本時，可有什麼感覺？他說，我曾到日本人最尊敬的明治天皇墓去瞻仰過，我

在那裏逗留良久，想看察一下日本人民對天皇的態度，那些軍人，或士紳貴族之類，一走到明治墓前就頂禮膜拜。我看到不少鄉下人和工人也去玩，但他們只立在那兒咕嚕着什麽，就走開了。因此，我認爲日本勞動人民并不崇拜天皇，日本之所以强，强在她的科學發達。

從這些話裏，我們可以了解當時陶氏的見解雖有獨到之處，但仍爲皮相之談，他對近代歷史的發展規律，實在還很模糊。

二七　第一流教科書和童話

陶氏在逃亡中欠了不少債，他就隱住起來做著作家，替商務印書館譯了不少世界名著，常常整天伏在案頭寫作。他說，我每隔一二小時要站起來在房裏散散步，否則要害痔病翹辮子了！可惜，「一二八」日本人一把火把東方圖書館焚燬了，他譯的書，一本也沒有出版。

我們那時在上海辦了兒童半月刊和師範生雜誌，我常常替雜誌寫些童話寓言之類的作品，他讀了這些作品，似乎很感興趣，見面就和我談這方面的問題，以後又寫了幾封很長的信給我，敍述他對兒童讀物的意見。後來，他打算出書信集，我又把那些信統統還他了，我們在這方面談論得很多，幾乎三五天在小飯店裏見一次面，見面時就談這些問題，不久我遷入横濱橋福星里住，他住在附近，就不時到我的住所來玩，也談論着寫作。我們之所以熱心于寫作并不是想成著作

家，而是喪失了地盤，失去了自由之後，不得不隱蔽起來採用這種工作形式來繼續爲教育事業服務，繼續進行反蔣反帝的工作，并且藉以養活自己和幫助在災難中呼援的戰友，這種靠著作過活和開展事業的生活，陶氏和我們在上海共同繼續達六年之久。

我們那時候，提出寫現實的抗爭生活，但也不放棄那引人入勝，富於誘惑人去深思的理想。我認爲理想是引人去出生入死英勇鬭爭的泉源之一。我說蘇聯在文藝理論方面雖反對浪漫主義，反對未來派，反對王爾德的藝術至上論，主張寫現實，反映現實，但在藝術作品中，并不反對理想。他很同意這種說法。我們共同研究了北歐童話作家格林弟兄，安徒生等的作品，研究了伊索寓言，又研究英國現代作家吉卜林的作品，和一位波蘭革命作家寫的童話。對已經過時了的公主王子之類的爛調，不必去提了，大部份是含有封建毒素的，一部份是怪誕無稽，想入非非的，但也有一部份表現了人民對當時權貴的憎恨諷刺和自己的願望。舊童話之生動有趣，富于想像，是很合兒童蓬勃的生長力和好奇心理的。不過當時出版界所出的兒童讀物，只迎合這一方面，竭力灌注封建，迷信，怪誕無稽的思想，却非常有害。我們根據寫現實，暴露黑暗，引向光明，爲理想而鬭爭的原則，開始寫童話，寓言，散文，詩歌等。陶氏寫了一篇童話白鴿，還寫了不少兒歌。不久，他提出：我們寫一篇東西，就要使這篇東西發生力量。因此，他認爲第一流兒童讀物，應該具備使兒童想了又想的力量，應該使兒童想了就動手幹的力量。應該使兒童想了，幹了

之他和社會都產生新的益處。

陶氏接着就去研究教科書，這是他多年沒有解決的問題：民國十六年，他在曉莊提出「教學做合一」，反對死讀教科書，說書是一種工具只可以用不可以讀，譬如我們用刀，就要拿牠去殺敵或切菜，如果我們一天到晚拿起刀來，光是唸刀啊，刀啊，有什麼益處？

可是，能够用的教科書太少了，那些書都是千篇一律的。比方甲家書館是小小猫，快快跑，小小猫，快快跑；乙家書館却是小小猫，小小猫，快快跑，快快跑，這些書都是以文字爲中心，空空洞洞，毫無實際內容。就是退一步說，做什麼事，用什麼書，有書用了，但也支離破碎，既不能完整的有系統的教給學生，也不合於學習的進度。這就逼使生活教育者不得不回過頭去研究教科書問題了。

陶氏研究的結果，認爲我們須將一個現代社會的生活或應有的力量，一樣一樣的列舉歸類組成一個整個的生活系統，編成一套生活用書或教學做指導書，接着他又列舉了七十條應該培養的生活力，組成康健生活，勞動生活，科學生活，藝術生活，社會改造生活等五大類。他說，我們做什麼總有個目的，這些指導書的目的，就是指導兒童青年過現代生活，培養現代生活中必須有的力量。他又認爲，要辨別這些書的好壞，就要：

一、看牠有沒有引導人動作的力量；

二、看牠有沒有引導人思想的力量；

三、看牠有沒有引導人產生新價值的力量。

他說：「中國教育之通病是教用腦的人不用手，教用手的人不用腦，所以一無所成。」他主張教人手腦雙用，能動手又能動腦，所以才能開闢新世界，產生新價值。他有一首小詩道：

「人生兩個寶，
雙手與大腦，
寧做魯濱遜，
單刀闢荒島。」

他的教育思想，着重在創造。他說，要把中國無能的亡國舊教育，變成新教育，只在念頭之一轉，雙手之一動；只要我們大家從此下決心，左手拿着科學，右手開着機器生產，建設，創造，必能開闢一個新天地來。後來，他把這些思想寫成一篇文章，題名「教學做合一下的教科書」，用筆名何日不發表在中華教育界上，現收在「知行教育論文選集」裏。

這時候，他剛從日本回來，受日本科學發達，因而富強的思想很深，我們雖不能說他陷入科學教育救國論的幻想，但他這時候對自然科學發生很濃烈的興趣，而對政治鬬爭感到淡薄，確是事實。陶氏，以爲要中國從古老的農業文明，渡到工業文明上去，離開科學就做不到。這是千眞

萬確的，但須等到我們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實行土改之後，才有這個條件。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存在一天，任憑你如何去提倡科學教育也不能把中國過渡到工業文明上去，創造出一個新天地來。陶氏說這些話未免過早一些，我想一二年之後，自衛戰爭徹底勝利了，全國都投入生產建設時，陶氏的話就有更大的決定意義。

不過，我們就他對教科書的認識來說，他的理論是對的：我們的一切教材，都必須從實際生活出發，向理想提高。這些教材是根據當地當時人民的需要和人民革命的需要，按照羣衆心理，學習進程編製起來，去啓發和指引他們向敵人和自然進行鬬爭，以取得勝利的。因此，牠就必須含有引導人去動作和思想的力量，牠就必須要有改變人思想的力量，牠就必須有化思想爲力量，因而使人民羣衆在鬬爭中取得勝利產生新價值的力量。這樣的教科書正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

陶氏有了這些想法之後，他就約了一批人組織了一個教科書編輯部，並找到了出版商，答應出版這部書，想把理想變成事實。他自己担任編國語。可是，這種工作很煩難，一年之後，我們沒有交出一本，陶氏自己也未繳卷，但在另外一方面，陶氏及其友人，却有了一些新收獲。

二八　科學下嫁運動

原來陶氏提出了科學下嫁運動，他說，資本家專有了科學，他們設立了科學研究室，開辦了

大學和專門學校，可是能夠享受現代自然科學成果的，只有他們和他們的子女。我們現在要做相反的工作，我們要使做工種田的人，拾垃圾的孩子，燒飯的老太婆也要能享受近代科學知識，要把科學變得和日光，空氣一樣普遍，人人都能享受。這就需要來一個科學下嫁運動。陶氏想到的事，他就要動手幹。於是，組織了自然科學園，參加這工作的人有不少從英美法回來的專家，丁柱中，高士其等人，便是其中的主角。我們這批中途出家的人，就一邊在實驗室內自學，一邊做通俗化的工作。陶氏自己也常起學生來和他的大兒子一同研究天文和化學。我們打算編一套兒童科學叢書，由陶氏主編，準備出三五百本，把近代生物，化學，物理，天文，礦物，數學，農藝，生理衛生等各方面的知識都包羅進去，用牠來代替無用的舊自然科學教科書。這一套叢書就是根據陶氏的教育理論編的，着重在指導兒童動手去做實驗，所以關於如何去找材料，如何動手做，說得非常詳細，務使學者看了書上說的就會去做。從做中引導到近代的新奇發明上去，引導到科學原理上去，引導到日常生活和環境的改造上去。特別注意就地取材，找中國材料，因為過去中國人研究自然科學都是學外國例子找外國材料，不但容易喪失自信心，而且不易找到這些材料，這就大大妨碍動手幹。至於這些書之注意通俗有趣，淺近明白，也是較嚴格的。陶氏提出「玩科學把戲」這個口號，號召大家動手來玩科學把戲，來領着兒童玩把戲，玩熟了，玩得有趣了，再把它寫下來。陶氏自己也這樣做。他和我們一起到上海工部局北區小學去玩科學把戲給兒

童看。有一次，到陳夫人辦的音樂館去參觀，他親自動手玩給那些兒童看，又教兒童玩給他看，他仔細在旁邊觀察兒童的動作，表情，和每一句話。回來，他就把它寫下來。

用這個辦法所寫成的書，是行動的指導書，是指引人開動腦子如何去改變自然，征服自然和環境的指戰書。寫這些書的人大多數是專家，或決心研究通俗科學爲大衆服務的人，他們在動筆之前，不僅須瀏覽許多科學著作，吸收和消化前人的科學成果，而且必須親自動手玩一下，爲了這個目的，我們建立了一個小小的試驗室。

爲了進一步推廣自然科學，陶氏又創辦了兒童科學通訊學校，內設天文、氣象、物理、化學、生理衛生、農業等科，加入的少年兒童有百餘人，每月按時發講義，學生根據這些講義就可以自己動手做試驗，如有不懂或其他疑難問題，可以隨時來問，隨時予以詳盡的指示。這個學校辦了三四年之久，大家都是盡義務的，後來連講義印刷費也付不出來了，只好停辦。

與此同時，我們又爲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了一套大衆科學叢書，圖文幷用，陶氏自己也編了一本天文，第一批稿子共交去五六本，但事隔十餘載，迄未見出版。

陶氏爲使不識字的人民，也能享受科學成果，他接着就辦空中學校，利用無線電台來向人民廣播科學知識，每天由他的二兒陶曉光登台廣播二十分鐘，廣播稿由各人事先擬定。

這個廣播要使大家聽得懂，才生效力。知識份子咬文嚼字，滿口名辭的腔調，替羣衆打開話匣

一聽便感到頭痛，把機鈕一扳去聽彈詞或京戲，我們便完全失敗了。那末，我們用什麼辦法來解決這個困難呢？

二九　大衆化——向老媽子學習

一九三三年至三六年之間，上海文化界正在紛紛討論着大衆化問題，知識份子們由於切身的痛苦感覺，已經感到非依靠人民大衆，非喚起人民大衆覺醒起來，才能把民族和人民從淪亡和痛苦的深淵裏挽救出來。這時候，橫在知識界眼前的唯一問題是如何把革命的知識送給羣衆，使羣衆和我們一起來行動。這就是所謂大衆化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知識份子常常在座談會上，書齋裏和咖啡座上咻咻不絕的爭論着，他們引經據典，他們也常常自詡自己的文章是如何淺近通俗。總之，他們老是在文字和理論上打圈子，他們的思路好像蒼蠅一樣，在空中飛翔着，但只劃了一個圈子又急速的停落在原來的位子上。陶氏這時不但在口頭提出到羣衆中去學習，而且他號召知識份子與工農結合，大家都到工廠、農村中去辦學校。「你要到羣衆中去打滾，忘記你是一個知識份子，然後你在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才可以和羣衆打成一片，才可以發現群衆需要什麼，歡喜什麼。這樣，你寫出來的東西，說出來的話，才能打中羣衆的心眼兒。」

「如果你很忙，」他又說，「你家裏或你的周圍總有老媽子，娘姨或其他人，你就拜他們做

老師吧。要斷定你的文章是否眞正做到大衆化，我看只有請教老媽子來批准。」

有一天的淸早，他笑容滿臉的走到我們的寫字間來說，爲了大衆化我向你們推荐兩位老師：第一位老師是你們自己的耳朶，文章寫好了，先唸給自己的耳朶聽聽看，是否有不順耳的地方，如果有就把牠修改一下。這樣唸幾遍，改幾遍。第二位老師是老媽子，你請她坐下來，唸給她聽，如果她聽不懂，就得把稿子塞進紙字簏重寫，倘使只有些地方不明白，那末就需要修改一下。你唸她聽的時候要觀察她的表情，她微笑、點頭、高興的地方，就是你的成功處，記在心裏，以後可多用。但我以爲最好的辦法，你唸了之後，反過來請老媽子講給你聽聽看，看老媽子是怎麼說，你就怎麼寫。」

他說，他已經請教過小妹，這位老師替他改了好幾篇文章，他覺得比原來的好多了。他要我們也來試試。我們就用這個辦法寫科學廣播稿。

陶氏這種實際精神和甘心情願當羣衆的學生，是他之所以出人頭地，與一般文化人知識份子最不同的地方。

三〇　不幸的科學工作者——高士其

在這個大衆化運動中，我們應該提一下不幸的同伴，高士其同志。他是在美國專門研究細菌

學的，在留學生中專門研究這一門科學的人太少了，幾乎找不出。由於培養細菌時，手上染了菌，一個不小心，細菌乘隙鑽進腦袋去了。開始佔據了他的神經中樞的運動中樞，初病時還不怎麼樣，但已不能繼續學習，他不得不放下畢業論文，離別了美國愛人，到歐洲去旅行，希望意大利或瑞士的溫泉浴能夠治愈他的病痛，但，一切計劃都成泡影，貧病逼迫他不得不回到祖國來。

他從上海踏上了祖國的土地，但四顧茫茫，去找誰呀？在國民黨外交部做官的父親討了姨太太已不認他是兒子了，母親失望之餘也不睬他，想起在美國讀書時的朋友如今已有人飛黃騰達，如胡定安等，想去找找他們，那知給他的却是閉門羹。

在求救無援的危難中，他遇到了陶氏。有一天的上午陶氏把他領到編輯部來，以後他就和我住在一間屋裏開始自然科學通俗化運動。那時，他的手脚和眼已失去控制的力量，不但行動遲緩，有時走上樓梯的半中間，突然眼珠翻上去了，就叫喚旁人去把牠抹下來，才重又恢復光明。

就是這樣，這個人仍抱着極大的勇氣和毅力，一邊同細菌鬥爭，一邊學習寫作。陶氏要他寫生理衞生，這些東西在他是很熟悉的，但他却很虛心的去研究這件工作。寫了兩三天，只寫下一二千字，他拿給我看，并說：「我的中文不行，怕不能用，這是我練習的初稿。」就這初稿已經文筆清麗。可是，他仍不自滿，一心一意的和大家研究大衆化問題，要求人替他修改，要別人把他的文章讀給老媽子聽，又用心研究別人寫的文章，總是那末虛心的學習着。如斯，他就開始向

科學小品文方面發展，在他眼前一片黑暗無底的苦海中，突然又顯出景物明媚的大陸來了，他的精神好轉，病魔也擊退下去了，由於手指不靈，行動遲緩，每天只能寫四五百字，但在孜孜不倦的辛勤筆耕之下，他寫下了大衆化科學史上最光輝的一頁，故事的現實，科學根據的謹嚴和文筆的生動有趣，他是較之法國的法布爾，英國的瓊氏，和蘇聯的伊林而無愧的。不但在通俗化這一點上，他受陶氏的影響很大，就是在整個思想情調方面，他也有了顯著的轉變：開始熱愛起人民，向人民學習，他所寫的東西都是以幫助勞苦大衆如何從黑暗無知的深淵裏走出來去和毒害他們的病菌鬪爭爲目的的，這也是高士其的所以被舊家庭舊社會所遺棄，而被人民和人民所主持的新社會所愛護歡迎的一個重要因素。一九三七年，我到一家旅館裏去找彭康同志，忽然喜出望外的碰到了他，才知道他也到了漢口。

他問我：「你走不走，」我說「我要留在這兒做些抗日」工作。我問他，「你呢？」

「到延安去，」他眼裏發着光輝，堅決的說，「只有那裏，我才可以發揮出對人民和祖國的貢獻！」

如今一別十餘裁，一想起這位被殘害的鬪士，就令人起敬和懸念不止。

三一 陶氏的治學和治事

陶氏生前，就有不少人，甚至他的學生，說他不研究學問，不是一個學者，說他淺薄。說他沒有一個書室，沒有豐富的藏書，這還像個有學問的學者麽？這些人是用什麼眼光在看他啊？無疑是用舊時老學究的眼光在看這位偉大的教育家。用陶氏的話來說，這批人是書獃子。他們日光裏的學者是那種人呢？頭大嘴尖，手細脚軟，談論起來則中外古今，或言必稱英美，三句不離杜威，孟洛，柏拉圖或孟特士鳩，盧梭，……等等，以示其學問廣博。到他的書齋裏一看，則金壁輝煌滿架滿桌，臚列了許多中外古今的洋裝書和綫裝書，惟恐人不知其知識之廣博，藏書之豐富；出外則手挾洋裝厚書，寫文則引經據典，其實是一位書蠹和文抄公而已，他擺出這一大套架子，藉以嚇虎青年學生，正如我所看到的許多大小老爺手持文明棍或携帶跟班，藉以嚇唬小百姓一樣。老實說這些人，除掉誇誇其談，發發議論，寫寫文章而外，你要他走出書室來幹實際工作，不但手軟脚 ，他那個大腦袋也恍忽依稀起來了。

陶氏生平反對這種人，他自己就做上了一個光榮的範例。他讀書，他研究學問，他都抱着一個目的，問一問，這能够幫助我解決人民和民族的危難嗎？他辦曉莊學校，他要普及鄉村教育，他把杜威的著作研究了之後，認爲搬教條不能解決中國的農民教育問題，於是他擷其精華，拋其糟粕，自己到實際工作中去探險和摸索。他研究科學大衆化運動時，他在中外古今的著作中遍尋着能够解決中國勞苦人民獲得科學知識的辦法，於是，他就特別愛好從學徒出身，後來跟英國大

化學家戴維做徒弟，發明發電機的法萊第；他愛好販報兒童愛廸生如何發奮研究科學竟成了發明大王的事蹟，他愛好工人出身的士梯芬遜如何研究蒸汽機而發明火車。一九三三年左右，美國有一位教育專家彷彿是華盧朋到中國來，和他談論了許多近代的新教育問題，他對那位專家說：我現在正在研究普及大衆教育問題，幾十年來我雖然時而提倡平民教育，時而提鄉村教育，時而又提出普及教育和大衆教育等，但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如何使中國人民大衆獲得知識去自救救人。用我們現在時行的話語來說，就是讀書研究或學習，只有一個目的，那便是爲人民服務。

陶氏在治學上的第二個特點爲貫澈實踐。他的許多理論都是從實踐中得來的。平時研究學問，也着重到實踐上去用工夫。如果在實踐中遇到了疑難問題，有書籍可看時，他總是想盡方法把它買來，看了書，立刻就拿去應用。例如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我們從事大衆科學運動，他自己買了許多關於天文方面的書，一邊看書，一邊就在西摩路的曠場上指手畫脚的注視天空的星座，用這個辦法，他認識了所有星座。有人批評他不讀書不研究學問，完全是書獃子的庸俗看法。陶氏生平常譏諷那些自命好讀書的學者道：

「讀死書，
讀死書，
讀死書。」

這些只會讀不會用的學者，實在是封建時代殘餘下來的士大夫階級，等於社會上的寄生蟲。因此陶氏說這種士大夫的讀書教育是亡國教育，他提倡用書，認爲書本只是工具之一。例如研究天文，除書本外，他一再想買架天文望遠鏡，可惜太貴了，他買不起，只借來用兩晚，便送還給商家了。我們那時，爲了研究物理化學建立了實驗室，爲了研究普及教育辦了許多工學團和工人識字班。陶氏於死前一、二月，還托人帶信給解放區的教育界朋友說，要他們自己動手辦一、二所學校，有了實踐的園地，才可以開化結果，創造出新東西來。

如果是一件新創事業，無例可援，無書籍可參考，他就親自動手去幹，在幹中一點一滴的積累經驗來改進工作，常用「摸黑路」這一句含有深意的話，鼓動大家去從事新創的開闢工作。

陶氏一生，從辦平民教育，曉莊學校，鄉村教育，普及教育，國難教育，工學團運動，育才學校，一直到社會大學等一系列的活動，標記着他一生辛勞的奮鬪，也指出他一生在學術上的成就，是從這一系列不斷的實踐或鬪爭中得出來的。陶氏的著作和那些坐在書室裏專門讀書的所謂學者比起來，實在太少了，只有幾本薄薄的小冊子。可是，他的每一句話都有力量，每一篇文章都是從事實際教育工作者的指針，無怪乎，他的學說不脛而走，到處流行，就是他的敵人也爲之嘆服。這是什麼原因呢？沒有別的，只不過他的話均爲經驗之談，都是經過實踐考驗的，和文抄公的搬教條，自有天壤之別了。

陶氏在治學上的第三個特點爲勇於創造。這是由於他具備第一和第二個特點來的。他研究學問是爲了解決中國人民大衆的文化教育問題，說句通俗話是抱了爲人民服務才去研究，不是爲了個人名譽地位或爲研究而研究，其次是研究學問是爲了解決實際問題，所以實踐是主要的研究方法。由此，陶氏才不致於被中外古今的書籍所束縛，才不致於被名家學說所駁倒，拜倒於偶像之下，把前人的學術奉爲教條。他能自由自主的去運用任何學說，辨別其眞僞，同時發揮和創造出新理論來。陶氏晚年，特別提倡創造精神，發表了創造宣言。就是他這種研究精神的進一步發揮。

陶氏的虛心學習，和一般文化人外表僞裝謙虛，而內心則老子天下第一是根本不同的，他常說，一切都是在前進的，你自己滿足了，那就完了。一九三九年，我們在霧都重慶的上淸寺一帶散步，勸他把生活教育的理論，研究出一個體系，最好由他自己抽空把它寫出來。

他一邊走着，毫不思索的答道：「當一種學說，自己以爲完成了完整的體系，那她就完結了！」

所以，他能自強不息，老而益壯。他不被前人所束縛，也不被自己的思想和學說所限止，跳出這些無形的束縛，自由飛翔於學問的天空，日新月異。

說到陶氏治事，他有美國人的實際精神，要就不幹，要幹就幹到底，幹出實際効果來。這個人的毅力是很驚人的。我在這裏，只須舉一二個大小例子。一九三三年左右，我們在研究通俗自

然科學，他提出兩大號召：第一希望大家不斷的有小創造和小發明出來；第二中國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含有不科學的地方，希望大家不誇大，不想當然，一切都要有科學根據，辦事要有科學態度，如果誰違犯了這一規約，就罰誰兩毛錢請客。他常常和我們開頑笑，大家不放鬆他，竭力想抓住他的弱點，那知他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很謹慎的遵守規約，一次也沒機會抓到。有一天，我一個人在房裏用電熨斗燙領帶，上面沒有襯一層布，就直接噴水在上面燙了，他偶而闖進來看到了，說這是不科學的，應該罰啊！過後，我發誓要和他比賽，但總究一次也沒抓到過。這個人做事是很有恒心的，他說幹就幹，而且要幹出一個結果來。那時候，經費很困難，他要辦自然科學園，他就不顧任何艱辛，日夜籌劃着。又例如一九四〇年皖南事變前後，國民黨反動派到處和他爲難，不給他辦的育才學校立案，不唯不出錢幫助他反而恐嚇捐錢給陶氏的人說，你們幫助危險份子。又派人到學校來故意找麻煩。反動派經濟上封鎖，和政治上要恐嚇的流氓手段。結果，使陶氏辦的學校，師生幾乎斷炊，那時學校內部也有些波動。有人勸他停辦，和他開玩笑說，何必背着大石頭在嘉陵江裏游泳呢？他說，我是背着愛人游泳哩！那時，他的血壓已經很高，時時有中風的危險，但他不顧一切的奔走着。他用這種驚人的毅力，堅持工作，有人送他一個綽號叫做陶獃子。其實先生的實際精神實在是一切事業成功之母，我們在大時代裏的人，更要學習他。

陶氏治事不唯有實際精神，有堅韌的毅力，而最重要的還是他抱定爲勞苦大衆服務的目的，

一切工作，一切事業的開始，他都是朝着這個目的設想，和計劃去鑽研的。因此，他在普及教育的工作中，就有小先生，傳遞先生，工學團，以及即知即傳等理論與方法的發現。由于他兢兢業業，一生堅持了這個目的，時時爲人民大衆着想，事事爲人民求幸福，所以他一生的精力和時間，沒有一點浪費過，獲得了輝煌的成績，被人尊之爲人民教育家。

陶氏治事的第三個特點是有魄力，當他了解了情況，覺得此事非辦不可時，他就拿出大無畏的精神來領着大家向前衝鋒，他從辦曉莊一直到辦社會大學，其中每一件事業，都被反動派所迫害，但他毫無畏懼，他運用一切社會力量，運用可能用的一切辦法和反動派搏鬪着，一直到死爲止。

任何天大的危險困難在他面前都變得不足道了，他常常微笑的說道：

「人生不怕碰釘子，

碰到一根化一根。」

他經常勸人要化阻力爲助力，在他的頭腦裏是沒有困難的。他像一團烈火似的向前射去，碰到任何阻碍，都把牠熔化了。這團烈火就是爲人民事業所給予他的魄力。

此外，他對于他的工作都抱着遠大的理想，計劃着如何開展，如何達到目的，因此氣派是很大的。

由于以上的關係——有目的，有氣魄，有毅力，有實際精神，因此，你和他在一道工作老覺得很樂觀。好像從他身上發射出一種特別電流來，使你充沛着希望和精力，精神上感到愉快。

至于工作時的科學調查，數字的力求精確，事情的力求原委和事實根據，從不混糊一點，他問起你一件事來，總是仔仔細細，他提倡打破沙缸問到底的精神，要弄出個究竟來，平時最反對籠統，諷刺一般中國人口頭上的也許，或者，似乎，可能，差不多為籠統國裏的籠統哥。

他治學和治事，實際上是一件事，在這件事上有一個特點，就是善於總結經驗。常常把做過的或正在做的事，打開腦筋去想，然後用簡短明確的語句，把他的概念總結成一句話或一個口號，這就是他的工作結晶也就是他的學說或理論，如「在勞力勞心」，「行是知之始」，「小先生」，「傳遞先生」等等。

平時，對人的和愛，民主，誠懇和樸素是社會上一般人所熟知的。他在治事上的缺點，當然也不在少，但我以為較嚴重的是組織性不够，這是知識份子自由主義者的通病，陶氏竟也不能免，因此，在他的事業上也不免暴露出自由散漫的空氣，晚年較好一些。

三二　我有了新發現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一九三二年左右，陶氏在上海發動自然科學大衆化運動，他和我們一起

當小學生，在實驗室裏玩科學把戲。有一天，我拿了許多乾電池和濕電池試驗電磁感應，這是發電機原理的發明家法萊第所早已玩過的。他看了很有趣，便一個人立在那裏玩了半天。第二天一早，他推進我們辦公室的門大呼道：「我有了新發現，我有了新發現！」

大家都驚喜的望着他，以爲他在自然科學上有什麼新原理發現了。

他不慌不忙，一邊說，一邊用手做着手勢道：「我昨天玩電池，把銅絲從陰極上接到陽極上去，然後電子流從陰極射出，通過銅絲，流到陽極上去了。」

大家心裏想，這很平常，有什麼新發現呢？

「嗨嗨！」他接着說，「這沒有什麼，可是，我要告訴你們，存在我心裏多年的問題，這一下被我想通了。

從前不是有人問過我麼，教學做合一的過程，究竟和克伯屈根據杜威學說所搞出的設計教學法有什麼不同呢？當時，我只能說它們相近似，不過設計教學法不是真做，而是教師坐在書桌旁，口啣香煙，眼盯天花板，空想出來的，現在，我完全想通了。設計教學法的過程是：

一、引起動機

二、決定目的

三、擬定計劃

四、着手試驗

五、屢試屢驗之後，得出斷語。

我們過去批評設計教學法，一開始只是引起動機，而教學做合一首先就是行動，行動生疑難，疑難生假設，假設生試驗，試驗之後生斷語，這個過程雖基本和設計教學法不同，比它前進了一步，但它仍有缺點。這個缺點是沒有把行動和斷語連接起來，就猶如沒有用銅絲把電池上的陰電極和陽電極接連起來，因此，發不出電流，也就發不出光和熱了。此刻，我把教學做合一的全部過程貫涌起來了：

一、行動生困難；

二、困難生疑問；

三、疑問生假設；

四、假設生試驗；

五、試驗生斷語；

六、斷語又生行動。

如斯，便把前後兩個行動連接起來，像陰陽二電極用銅絲接起來一樣，就會通上電流，發出光和熱來了。我把這個過程叫做「反省的行動或行動的反省。」

「Reactive」他又用英語加重說一句。

這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發現，原來他在試驗電流時竟聯想到人類思想的過程，最後，把人類認識外界事物過程的秘密找出來了！

這個思想的過程或概念乃至理論形成的過程，實際上是我們人認識外在事物的過程，也是我們學習的過程，遠在百年前馬恩在唯物辯證法認識論中，就天才的發現這一眞理了。他們都一再提出當人類實踐時，即人類和外在事物接觸，才能由現象認識到事物的本質，而這種認識是逐漸的，人類可以由現象認識到本質，由第一本質認識到更深一層的第二本質。可是，把牠的過程全部列出來，而且有效的運用到學習上去，可以說陶氏還是第一個人。自此以後，陶氏發明的教學做合一，才有了較豐富的具體內容，才有路可循的去執行這一著名學習方法。陶氏初期對教學做合一的解釋，以及他提出來的兩大原則：「在必有事焉上下工夫」和「在勞力上勞心」，雖建立了這一學說的基礎，但空泛的原則，使人無法實行。

可是，就是有了這一過程，仍舊有些糢糊，所謂斷語究竟根據什麼下呢？行動又起些什麼作用呢？陶氏沒有做過明確答覆。爲使讀者明瞭起見，現在把我過去解答「什麼叫教學做合一」一文，節錄如下：

行動究竟起些什麼作用呢？爲什麼陶氏特別着重做呢？「如果人沒有感覺，沒有眼，耳，

口，鼻，皮膚等，他就不能求得知識。一個又聾又啞，又瞎眼的人，他只能靠皮膚的感覺來認識外界，求得知識。如果連皮膚感覺也沒有，他就什麼也不知，什麼也不覺，這種人叫做死人。

「可是光靠感覺也不够，感覺僅僅祇能把我與外界初步連系起來，等于是一座橋樑，使我們能够接觸事物。同時，感覺往往是不可靠的。要認識外界事物的實質，還需要經過抽象的思惟過程：即分析，比較，研究，綜合的過程，然後才能進一步認識事物的本質，這是一個創造過程就像蜜蜂在花叢中搜集種種花粉與汁，把牠造成蜜一樣。所以馬克思說：「觀念只不過是被放置于人類頭腦中，並在人類頭腦中改過的物質而已。」人類反映外界事物並不像照相機，要經過頭腦的改造作用。所以他又說：「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種種發展形態，並探研這種形態的內部關係。」搜集材料主要靠感覺，分析和探究材料的形態與內部關係，因而得到認識事物的本質（斷語），就要靠抽象的思惟了。在這裏，搜集或活的觀察或做或行動是根本的東西，所以陶氏說它是老子。有了這個，才能進行抽象的思惟，才能認識事物，得到知識。有了知識，再去行動，再去思惟，如此前進不息，才有新的創造，所以說它是孫子。

「有些人反問我道：教學做，一切學問都要從做中去親自得來，那太麻煩了，你們都是爬行的經驗主義者。這些人，還沒有學會走，就想跑。他弄錯了，這裏所說的做，是指必須求得感性知識做基礎，或借經驗舊知識做基礎，才能吸收他人或消化他人的知識，變成自己的知識。接

知如接木，沒有感性知識或舊經驗做基礎，是吸收不了別人的知識的。譬如，我們研究無線電，要理解牠，必須有摩擦生電的感性知識，必須見過放電現象，了解赫芝波。然後，便能進一步了解無線電是什麼了，並不是什麼都要親自去做。又例如，我們從分光鏡中，分析某種物質發出一定的線景，然後對着天空某一星座分析其光景，也有同一線景，我們便知道某星球上也有某種物質，並不需要跑到星空去把星摘下來做標本，加以分析才知道。

「從實際出發去學習前人的經驗或理論，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毫無工作和生活經驗，或對該事物毫無所知的人，應任做上教與學，就是使得有感性知識做基礎，才能大徹大悟，把別人的知識化成自己的知識。另一種辦法是有工作和生活經驗，或對該事物已有初步認識或經驗的人，我們可以和別人的經驗（知識或理論）對照起來反省自己的行為，而達到消化和吸收他人知識的目的。」陶氏把前一種方法所獲得的知識叫做親知，而把後一種叫做聞知。

看了上面這一大節說明，我們便可以完全明瞭行動是人獲得知識的基礎。我們靠行動去觸覺外界事物，而分析，研究和綜合這一系列抽象的思惟活動，是我們接觸事物之後下斷語的方法。十年來，解放區的工作人員，運用這一方法發動羣衆抗日和愛國自衛戰爭，推翻和正在推翻封建勢力，建立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今天，誰都知道當一個新的革命任務到來時，就要到羣衆中去鼓動宣傳，使羣衆行動起來，

在行動中進行進一步搜集材料，調查研究，不斷總結經驗，推動行動。在不斷的行動，不斷的總結，總結又指導行動的連鎖式進行中，不僅把任務或運動從低潮到達高潮，完成了艱巨的偉大革命任務，我們對中國社會知識，對中國現時的革命運動以及工作知能也在經驗或理論上更提高一步了。就是說，我們同時獲得了豐富的理論知識，把我們自己也改造了，更前進一步了。這是一切中國革命工作者的工作方式，是我們不斷完成革命任務，把勝利推向勝利的法寶，也是我們研究或學習的重要方法。

陶氏沒有到過解放區，解放區的人也沒有聽到過他的發現，但二者的基本精神不謀而合，這是由於二者都着重實踐的結果。但解放區所創造的獨特工作方法或學習方法比陶氏更豐富，更多樣化，更大規模的史無前例的，更前進了一步。陶氏還沒有完全拋掉杜威的思惟方法。如果，我們今天把解放區的工作方法或學習方法排列起來，是很複雜的，根據不同情況不同形勢與任務而隨時變化的，如果誰要依照老公式辦事，就會有人在你前面大喝一聲：「你落伍了！」。不過，我們可以列出一個基本精神來：

一、根據客觀發展形勢，提出當前革命任務；

二、發動群眾自覺起來行動；

三、在行動中不斷調研和總結，推進行動：

四、累積許多小經驗，滙成理論，進一步推動革命。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工作方法，也是我們不斷提高自己和創造新世界新知識，逐步深入客觀事物本質的方法。這個方法基本上和陶氏的方法——從行動到行動，從低級行動到高級行動，從不知或不完全的知到知，從困難到勝利，從小勝利到大勝利，從一個勝利到另一個勝利的法寶。這個過程是實踐的過程，也是人類認識世界的過程。過去，光喊實踐，實踐，行動，行動，或喊做呀，幹呀！如何實踐法，行動法，幹法呢？現在，我們有一個明確的道路了。不過，我們和陶氏之間還是有區別的。

我們有更明確的奮鬪目標，方向，路綫，立場等等；而我們最大的特點是羣衆路綫，依靠羣衆的自覺，依靠羣衆的力量，不是任何個人英雄，才子偉人的獨特的行動，這就是說我們依靠羣衆的集體力量去掌握世界，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個人在集體行動中起一定的作用和力量，個人也在這個集體行動中獲得了知識，改造了自己。如果我們把這個精神貫澈到教學方面去，那我們對兒童和青年學生或群衆的一切教育實施，都要發動學生自覺的，自主的起來幹，依靠他們集體的力量去追求眞理，改造自己。

三三　在低氣壓下奮鬪

陶氏在上海潛心研究學問，和從事普及自然科學運動，是在半秘密狀態之下進行的。開始，深住簡出，只有很少數知心朋友才曉得他已潛回上海，也只有在夜晚，才出來走動。那時候，正在國民黨反動派十年圍剿的時期，上海文化界的左翼作家如胡也頻，柔石，馮鏗……早在一九三○年就被反動派捉到他們專門鎮壓和屠殺人民的淞滬警備司令部，在上海郊外的龍華活埋掉了。許多優秀作家和文化人被投入上海郊外的漕河涇大監獄，有的被送到蘇州監牢，有的被送往杭州監牢，有的被反動派提往反動政府所在地的南京，他們在城裏所設的大小監牢容不下去了，又在和平門外曉莊附近，建築了一所規模宏大足容幾千人的大監牢，所有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大小監牢也都關滿了所謂政治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結成一氣在鎮壓中國革命人民。上海的文化界非常消沉了，全國的文化界也蒙上了一層灰暗，只有無恥的文人才做反動派的幫兇，幫他們寫文章出雜誌宣傳反動派的理論。可是，反動派出的書報雜誌，沒有人要看。而左翼文壇的主帥以及許多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并沒有爲反動派殘暴的屠殺和監禁所嚇倒，他們善於運用了各種隱蔽的方式和敵人作不妥協不休止的鬪爭。魯迅先生以鋒利的短劍似的小品文，在各種灰色報章上發出戰鬪的信號，申報附刊自由談是他經常發表作品的地方，爲了逃避檢查官的狗眼，他幾乎每篇都署了不同的筆名，其中曾以何家幹這個筆名，發表了好幾篇文章，羣衆一看到他攻擊反動派的辛辣文章，就感到痛快，紛紛予以討論，陶氏也正以「不除庭草齋夫」這一筆名在自由談

上發表感想，幽默的譏刺反動派，對前進的人民予以鼓勵。後來，他又連續發表了古廟敲鐘錄，直接提出他的教育主張向廣大人民宣傳。但是，國民黨反動派仍舊偵騎四出的在偵察和逮捕稍存進步之心的每一個文化人，每一個革命之士，白色恐怖依然更嚴重的籠罩着上海。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霹靂一聲，日本帝國主義藉口萬寶山事件，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一天之內佔領了瀋陽，長春，吉林，營口，撫順，數天內便佔領了全東北，張學良的軍隊奉命「不許衝突」士兵含淚痛哭撤退，造成歷史上的奇恥大辱，我們住在北四川路，那裡日本人很多，他們開慶祝會狂喜得手舞足蹈。而我們天天看到報上大字連載的退卻消息，把頭都氣昏了，陶氏氣得咬牙切齒痛罵反動派，並積極提倡抗日運動。我們一同走過北四川路郵政總局門外，看到上海學生所書寫的「同胞們起來洗雪亡國大恥！」的驚心觸目的大標語時，憤恨得捏緊拳頭。上海的人民大衆覺醒起來了，街頭巷尾，酒館茶店，工廠學校都在沸騰着。有些人痛罵張學良，但大多數人都知道這是反動頭子蔣介石下密令，不許東北軍抵抗的。他嚴令當時在北平的張學良把軍隊調到關內來剿紅軍，他無恥的秘密對軍隊士官說，「東北丟掉了，不要緊；不是我們革命的責任，我們的責任是剿共。」反動頭子蔣介石受了人民的唾罵不去抵抗外來的侵略主義者，反向人民積極進攻，又公開無恥的說什麼「攘外必先安內」的亡國言論。日本帝國主義之所以敢於侵略中國，完全是國民黨反動派剿共，把祖國元氣殺戮盡了，才引進來的。蔣介石專心一致打

自己的親姊妹 只好哀求國聯出來干涉日本 但帝國主義是一鼻孔出氣的，國聯派李頓率領調查團來調查一下就完了。之後蔣介石，便索性投到日本帝國主義懷裏去了！做了中國第一號賣國賊。

但中國人民是不甘當亡國奴，不願被賣國賊出賣的。九一八事變後的第四天，即九月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即發出宣言，號召組織群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組織東北游擊隊，直接去抗日。

在反動派恐怖鎭壓下的上海群衆，終於衝破了低氣壓行動起來了：首先是最敏感的青年學生，二十四日上海數萬大、中、小學生罷課抗議國民黨反動派的不抵抗主義。三萬多工人也舉行罷工抗日，接着上海市民十餘萬人舉行反日大示威，許多工人都紛紛離開日本工廠。九一八事變的第十天，京滬學生萬餘人聚集國民黨中央政府門前示威請願，痛斥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不抵抗，簽定賣國協定，出賣祖國。當晚，反動派便用軍警把七千多學生押回上海了。後來，又第二次赴南京請願。這時候，北大的學生也率領北平和濟南的學生到南京來請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實行抗日。但國民黨反動派却把一部份學生拘禁起來，南京和上海學生便總罷課起來援助，北大學生示威團率領十多萬學生齊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黨中央政府請願，要求一致抗日。賣國的反動派，竟喪心病狂在四週密佈軍警流氓特務等，一聲呼嘯，蜂湧而出，拿着刀棍鐵棒向學生衝擊，國民黨政府心又不足，復命令士兵開槍射擊，用刺刀亂戳，頓時死傷學生多人。無恥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竟發佈文告說：「學生行動越軌，軍警乃自衛手段，正當處理。」可謂無恥之尤！

這批壞蛋也當面說謊，要流氓腔道：「學生自行落水身死」云云，魯迅先生看到這種情形痛心極了，曾爲文大罵反動派。

國民黨已投降日本帝國主義，誰要抗日，誰要提一提抗日，刀槍就向着誰頭上砍去。於是，低氣壓又窒息着人們透不過氣來，但鬥爭依然進行着。

三四　上海軍民爆發了抗日

在上面所說的一連串人民抗日鬥爭中，陶氏熱情的鼓舞着大家，上海的排日空氣像赤道的熱浪似的佈滿了整個市容，從學生、知識份子、工人、小市民一直到中小資本家，滿腔熱血，像火山樣的要爆發了。人民不管國民黨反動派如何壓迫謀害，冒着殺頭坐牢的危險，依然組織了人民抗日委員會及名目衆多的抗日團體，從事宣傳鼓動排日和募款救助東北抗日義勇軍。我們的敵人日本法西斯匪徒早已陰謀在上海發動屠殺。我們住在虹口一帶，天天看着日軍耀武揚威的在馬路上操練，日艦不斷的把陸戰隊和陸軍以及軍火物資輸送到上海來。他們一面却還要求上海國民黨政府取締人民排日運動，那些賣國走狗國民黨老爺們得了命令，便解散抗日團體，嚴厲鎮壓抗日運動。但局勢依然非常緊張，敵人已經架上大砲和機槍作出攻擊的準備，十九路軍和上海三百萬市民并不像國民黨老爺那樣屈膝求和，而是更莊嚴的準備抵抗。陶氏從虹口回來，他說：在某某

路口上敵我兩方的小鋼炮，口對口的瞄準着，兩方士兵都虎眼眈眈，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

「可是，」他接着又嘆口氣說，「老蔣反動得很，他一心投降日帝，不許任何人抗日。國民黨的上海市長吳鐵城，已經恭順的向日帝道歉，答應嚴格取締抗日團體，以後不再發生排日事件。據我看，他們越向敵人奴顏婢膝出賣國家，敵人就越會向我們侵略！」

果然敵人進一步提出無理要求來了，他們竟限令十九路軍撤出上海！大家聽了都氣忿塡膺，同時感到已經忍無可忍，戰爭殆已不可避免。

晚上，消息靈通的陶氏來了，他很激動的說：「十九路軍全體官兵打了電報給老蔣，告訴他日帝向上海進攻蓄意已久，戰爭已經不可避免，一致要求抗日。老蔣除了大發雷霆，罵了一通之外，竟答應日帝的要求，電令他們三日內，從上海撤退完畢！」

那時，我們住在天通庵路，離天通庵車站很近，這是從日帝大本營的虹口進入閘北的第一道門戶，因此，這一帶雙方都佈了鐵絲網，築了工事，一到下午，行人絕跡，氣勢森嚴。第二天的半夜，陶氏突然匆匆忙忙跑到我們住所來說：「你們快點起來搬家呀，戰爭就要在我們這個附近爆發了。老蔣雖已完全答應了日帝的要求，但日軍已決定進攻上海，據十分可靠的消息，戰事就會在這一兩天內發生。」

我們便立刻忙亂起來，把小小的試驗室、木工場、圖書室以及傢俱等等，叫了好幾輛大卡

車直忙到第二天上午才搬完，時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半夜後，炮火隆隆的從閘北傳來，驚醒了全上海人民，天一亮，時報上便登出「閘北開火，我軍勝利。」血紅的大字新聞。個個人面上都光彩煥發，揚眉吐氣的互相談論着戰事，連在永安公司一帶賣報的老槍，也提高嗓子，一邊跑一邊喊：「阿要看時報，老申報，十九路軍打勝仗，東洋人大吃癟！」市空騰起一片歡呼聲和閘北的炮槍聲交響着，溶成了一片。

第二天，上海日商工廠的工人首先齊心罷了工，組織了義勇隊，和十九路軍并肩作戰，保衛祖國。成隊的學生和市民組織了慰勞隊、救護隊，沒晝沒夜的在前後方奔走着。大小商家捐獻了各種各樣的慰勞品，一卡車一卡車接連不停的運到前線去，運下來的是一車車傷兵，市民們給他很好的營養和治療，許多青年女學生和大家閨秀，都參加了看護隊。

從一月底打到三月初，三十多天了，敵人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死傷了萬多人，撤換了四次主將，但所得到的港口和地上極狹小，在幾次有名的戰鬪中如蘊浜之役，把登陸敵人殺得滿浜血紅，退下海去。又一次在虹口楊樹浦路一帶，一個進攻，就把敵人紛紛打得落下黃浦江而逃。敵人和三百萬市民作戰，那能戰勝！所以儘管敵人由一，二萬人增至十多萬，而十九路軍仍不過三萬多人，勝利仍不斷在我們這方面出現。

國民黨反動派在這次偉大的抗日戰爭中，不惟置身事外，袖手旁觀，而且還暗中破壞，開火

後一二天，陶氏對我們說：「十九路軍軍長蔣光鼐在日軍打響槍之後，曾打急電給南京的老蔣，要他派兵援助，老蔣氣冲冲的暴罵一頓，把電話一掛，即置之不理了。」

後來，他派第五路軍到上海來監視十九路軍撤退，不許抗日。但五路軍士兵激於愛國熱情，一到北火車站看到軍民如此英勇抵抗敵人，便自動參加作戰。

日軍不斷的增加，軍艦不斷的開來，他們用全國的力量來向上海一隅進攻了。十九路軍連五路軍一共不過四五萬人，天天傷亡很大，向南京國民黨政府一再函電請求派援兵又不理，連向停泊在上海南市高昌廟的海軍艦隊要求協助抵抗敵軍，也是一個不睬。原來賣國賊老蔣，已指令海軍不許抗日，所以海軍部長下了一道密令給各艦隊：「……准日海軍司令來函：「此次行動，並非交戰，如中國海軍不攻擊日艦，日艦亦不攻擊中國軍艦，以維持友誼」等情，凡我艦隊應守鎮靜」云云。後來日艦炮擊南京獅子山，艦隊司令竟公然下令各艦道：「日海軍炮擊獅子山炮台及京市，與我海軍無關，不得還擊。」十九路軍向海軍部借大炮和鋼板，也遭到了拒絕。

最駭人聽聞的，是在閘北軍民正在展開血戰，保衛每一寸國土，每一幢市房時，國民黨反動派竟秘密派海軍部次長李世甲到上海來和敵軍司令鹽澤，勾勾搭搭講和，他又陪同日軍司令野村乘汽車到各戰壕去參觀。無恥的賣國行爲，竟肆無忌憚，一至於此！

還批毫無心肝的國民黨反動派，眼看敵人節節失利，困守沿江一隅，無法取勝，便效張松獻

地圖的賣國奸計，向敵人告密說，十九路軍的後方，防務空虛，如能從揚子江口的瀏河實行登陸，如斯便可以抄十九路軍之後，一舉而擊潰她了！

果然，賣國賊的這一計策被日本法西斯採納了。三月二日未黎明以前，我們天天睡在床上就心着的槍炮聲，聽不見了，連稀疏的一二聲也聽不到，大地寂靜得一片清亮，好像什麼事變也沒有發生過似的。這個異樣的感覺，頓時使人由懷疑而悲憤起來了！

日軍在瀏河登陸，十九路軍後路被切斷，他們不得不丟下一月多來用血肉保持住的陣地，不得不丟下祖國的人民，含着淚，默默的在黑夜中退到崑山第二道防線去了！人民一覺醒來，敵人已經殺到面前，走進室來！人民已經被國民黨賣國賊出賣，上海三百多萬軍民用血肉之軀所爭取來的光榮，一夜之內被反動派又蒙上了一層恥辱！大約在三月初國民黨賣國賊和日本法西斯簽定了一個喪權辱國的淞滬協定，上海四郊直抵崑山爲止都不許駐中國軍隊了，還要根絕排日運動。這樣一來，國民黨反動派在公然「敦睦邦交」和日本妥協乞和的賣國政策之下，便進一步壓迫屠殺人民的抗日運動，人民不惟沒有言論、出版、集會等之自由，連愛國自由也被取消！

三五　陶氏大轉變

國民黨反動派和日本法西斯在中國人民面前不斷的屠殺、刼掠和壓迫，特別是反動派對外來

侵略者可恥的卑躬屈膝，奴顏事敵，出賣祖國，而對人民的正義愛國行動則顯出了兇暴的武力鎮壓，把全國人民都教訓得覺悟起來了，大家心裏都一致的堅信，要救祖國於危亡，救人民於水火，只有靠人民自己起來幹！這在知識份子層是特別敏感到的。陶氏親與其事，而且一直受反動派的迫害，感覺自然是分外親切的。

大約是一九三二年，陶氏在「中華教育界」月刊上發表了一篇救國論文，大意是教人節育，他說本來是一個富有之家，因爲多生孩子，土地便逐漸分散和減少而爲貧苦之家了。照他的說法，中國農村之所以貧弱，之所以有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工之分，完全是由於多生孩子，土地一分再分的結果。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馬爾薩斯人口過剩的陳腐理論，是地主資產階級用來欺騙人的謊話，陶氏顯然錯誤了。他那時候提倡五生主義，（即少生、好生、貴生、厚生、共生的世界。）到處勸人節制生育，研究節制生育的辦法。不久，在北方天津出版的大公報副刊上有位署名子鉥的發表論文批評陶氏觀點的錯誤，他說、中國農村之所以貧窮，完全由於封建地主統治階級勾結帝國主義剝削壓迫的結果。

眞理是在子鉥先生這一方面，彷彿是那年的夏季，子鉥先生到了上海，才知道他是陶氏的入室弟子尚仲衣教授。陶氏爲了弄清這個問題，特爲召集留滬文化教育界朋友開了一次座談會，會上熱烈爭辯着中國目前社會性質和我們革命的任務，一致認淸了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

家，中國之所以弄到窮困衰弱，完全是由於外有帝國主義侵略，內有封建地主及買辦階級勾結帝國主義剝削壓迫老百姓的結果。因此，我們文化教育界要和人民站在一起，宣傳鼓動他們和我們一起動手來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中華民族和人民才有出路，我們本身也才可以有光明燦爛的前途。

這次座談會在陶氏一生，起了極大的作用，陶氏的許多糢糊觀念，錯誤想法以及種種幻想，都從頭腦的宮殿裏淸洗出去了。他認眞的閱讀這方面的書，又把著名的托派高語罕（後化名王靈皋）找來和大家論戰。結果，托派說中國已完全資本主義化只帶一點封建尾巴的錯誤理論，失敗了。陶氏刺笑他們只見到滴點的大城市，把廣大的封建農村置之不顧，的確是胡說。

一場筆戰和舌戰之後，陶氏對中國革命認識明朗化了，他和尙教授的友誼也進了一步，從此尙也參加陶氏主持的生活教育社，結成親切戰友，共同奮鬪。可惜，這一位優秀的教育工作者，我們可敬的戰友，後來在抗日時期改任廣州中大教授，一次乘汽車赴香港，中途翻車，不幸逝世了。

我們還是來談陶氏吧，從那時起，他就有了大轉變，開始認淸要驅逐日本法西斯，拯救中國於危亡；要把站在生存邊際（陶氏常說的語句，意思那站在邊沿上的窮苦大衆，稍稍一動即有落下去跌死的危險）的勞苦大衆解放出來；就要打倒帝國主義，就要推翻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反

動派的統治，但這樣一個偉大事業，不是靠什麼偉人學者呼來一陣神風就可以把這些吃人的惡魔吹掉，必須依靠人民大衆，才有這種偉大的力量。

因此，陶氏日夜思慮着如何發動人民，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來解放自己。

彷彿是一個昏暗的秋天，飛着毛毛雨，陶氏穿着一件舊雨衣，一走進我們的編輯室，喜氣洋洋的說：「我又想通一個問題了。我打算辦工學團。」

什麼叫工學團啊？這眞是一個古怪名辭，大家都覺得陶氏好翻新花樣，忽然又從辦自然科學園，普及大衆自然科學運動，一跳又跳到工學團上去了。但沒有等得及大家發問，陶氏自己來解釋了。

「什麼叫做工學團呢？工就是做工。工以養生，就是教人民大衆生，勞動來養活自己，不游蕩閑散，依賴別人。學就是科學。學以明生，就是教導人民大衆研究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一則明瞭自己爲什麼會受苦受難，被人欺負壓迫，如何才能求得出路；一則用自然科學來增加生產和破除迷信。團就是團結，就是團體。團以保生，這個意思就是教人民大衆團結起來，結成堅固的團體來保衛自己的生存權利，如果有什麼混賬王八蛋來欺負壓迫老百姓，咱們老百姓就起來和他幹——啊！」

陶氏加重語音把後面兩個字拖得特別長。「此刻，我想到人民大衆需要五種教育：科學教

育、勞動教育、文化教育、藝術教育而外，還必須加一門武裝自衛教育。有了它，人民才可以抵禦一切侵犯者。因此，我們堅持人民應該自動武裝起來保衛國土和家鄉的主張！」

三六　山海工學團

過了幾天，他走來對我們說，「我已覓定滬太路（從上海通到太倉的公路）旁的孟家木橋做校址，經費也籌到一些了，還捐到一架風琴和留聲機，現在就想送去，你們去看看麼。」我們跨上了汽車，從中山路疾飛而過，一會兒便停在公路旁一座小木橋前面。

「到了，」陶氏打開車門走下來說，「這就是孟家木橋！」

我們拿下東西，步行到校，只見是一家民房，由老百姓協議，自動讓出來的。屋前有一片廣場。兩位木匠師傅正在忙忙碌碌，鋸木料，打用具，弄得滿頭大汗；室內又有一位工人在編蘆席，他們看到陶氏和我們走進來，都微笑點頭和陶打招呼。接着工學團第一任團長馬侶賢和許多外來的青年男女及兒童也圍上來了。

「這個工學團，」陶氏對大家說，「既是工廠，又是學校，也是社會。大家都要跟木匠師傅或其他師傅學習做工，依靠我們自己的勞力來創造這個學校不行麼？」

大家說，行啊，我們已經改造了好幾座民房，做成衛生室，替老百姓和我們醫病，開了三個

教室，一間厨房，一個圖書室，一個小工場。可惜此地村子小，同志們住得很分散呢！

我們跟着陶氏，時而穿過一座竹園，時而鑽進一座樹林，有時跨過小浜，在稀朗的小農莊裏穿來穿去。陶氏觀察了一遍山海工學團的校舍之後，回到了團長辦公處。他說：「我們應該趕快替老百姓做些有益的事，他們對我們的捐助太熱情了。只有親密依靠老百姓，得到他們的幫助，工學團才可以辦起來。」

「小學校一二天後，就可以開學了，附近來報名的娃兒已經有廿多名。侶朋和張健兩位小朋友和他們玩得極投機，教他們唱歌、遊戲、講故事，比大先生還好。」侶賢同志報告着。

「那末，就要他們擔任教師吧，只要你們多教教他們就行。農民的青年工學團，可能辦得起來麼？」陶氏用徵詢的口氣問着團長。

「可以，只要再過些時。」團長似乎很有把握，但接着又低聲說，「比較困難一些，因爲他們要幹活呢！」

陶氏把眼鏡脫下來，拭了一下，然後又慢慢的戴上去，在他遇到困難或要和人激辯時，時常有這樣的舉動，他咳了一聲，然後說，讓我們大家來試試。

陶氏對這個問題，常常縈迴腦際的思考着。怎樣把鄉村中各種不同生活，不同職業，不同年齡的人組織起來，進行工學團教育呢？這眞是個問題。靠他那個聰明的大腦袋搜斷枯腸去思索，

固然必要，但最重要的還是去實地幹。陶氏因此就經常到孟家木橋去，親自和農民談話，總是找那些老實頭的泥腿，娓娓不倦的談着。他從他們嘴中發現那一帶種棉花、養魚、種菜園、到上海拉糞、以及做工的人很多。他根據這些情形，立刻提出來說，我們根據他們的職業性質來辦工學團，不就解決困難了麽？比如我們可以把專門種棉花的農民組織成棉花工學團，一邊可以研究棉花種植法，提高產量，一邊合作進行推銷棉花，或集股辦紡織合作社，一邊組成一個棉花農人的團體，進行學習和自衛。我們還可以組織養魚工學團、菜園工學團、拉糞工人工學團、瓦木匠工學團、紡織工人工學團、兒童工學團、婦女工學團。」

陶氏的理想，立刻就在大場孟家木橋實現出來了。以後這個工學團辦得很有成績，從兒童、中學，各種職業的農民工學團，一直辦到師範，名震全國，各地前往參觀者，絡繹不絕，從遠方跑來學習的青年男女也多起來了。陶氏的工學團主張，實在是教育上的新發現，是生活教育理論更具體化，更切合人民需要的一種形式與內容，因此，它能在短期內得到了成功。今後，我們在普及工農教育方面，仍需要參考和運用他所發現的理論，必須化工廠和農場爲學校，進行勞動生產、科學、民主團結、階級友愛等教育。

三七　小先生運動

陶氏在很早以前，即看到兒童的力量。曉莊啓封之後，老蔣只答應發還一小片荒山，另加一所村民辦的小學，其餘仍被國民黨中央黨部的蒙藏政治學校霸佔着。陶氏爲了滿足那些農民們的要求，急於想先恢復曉莊小學，但當時竟派不出適當的人去。他想了一想，就委曉莊小學的學生胡同炳任校長，提拔幾個較大的，識字較多的孩子爲教師，他把這所小學題爲佘兒崗兒童自動學校。過了幾天，有一位同志參觀了那所自動學校回來說，精神很好，兒童們做事比大人還頂真，當地老百姓都歡喜呢。陶氏聽了，嘻嘻大笑。第二天，他寫了一首詩來給大家看，那首詩道：

「有個學校眞奇怪，
小孩自動教小孩，
七十二行皆先生，
先生不在學如在。」

另外一件事，尤其感動了陶氏，那便是汪達之同志在蘇北淮安縣河下鎮辦了一所新安學校。這所學校的兒童七人，爲了實現陶氏「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的主張，便組織新安旅行團，到上海來旅行修學。這七位孩子自動跑到上海找到陶氏，他高興極了，介紹他們到各工廠、學校、機關去參觀。到處開會歡迎這批孩子，他們也到處演講。有一次在滬江大學演講他們的教育主張，博得該校全體師生的稱道。事後有一位教授對陶氏說，這些孩子眞行，幾乎把我這位教育

系教授的飯碗打破了。陶氏在送給這七位孩子的詩中，寫道：

「一羣小光棍，
數數是七根，
小的十二歲，
大的未結婚，
沒有父母帶，
先生也不在，
誰說小孩小，
劃分新時代。」

另外就是當時山海工學團有幾位特出的兒童如侶朋，張健等，直接在該校擔任教小孩。陶氏把這些孩子統稱之為小先生。他把這個發現，又和中國知識份子之少，文盲之多，要迅速普及人民大衆的教育，非運用各種識字的人來即知即傳不可連系起來。這就更增進了他提倡這一小先生運動的信心。他把國民黨反動派天天虛偽的空喊推廣民衆教育的欺騙宣傳和腐敗的計劃，加以研究之後，諷刺的說道：「根據杭州國民黨老爺們擬定的消滅文盲計劃，需要一百二十年，該市才能肅清文盲，而且前面割草，後面又長；如此，他們便可以坐在辦公室裏向市民收教育捐，無盡

期，辦下去。但運用即知即傳的辦法，總動員來幹，就比他們快多了。」

陶氏又把這一發現和當時推行鄉村婦女教育不易，連系起來。他發現要婦女進夜校讀書，須過很多關，如怕鬼、怕丈夫不願、怕婆婆罵、怕小孩無人照顧。……如果運用小先生，把教育送上門去，不就解決這些矛盾了麼？總之，他把小先生制發現之後，認爲是解決帝國主義宰割下農業國家的普及教育的最好辦法。在他後來所發表的「普及現代教育之路」一文內，說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要普及現代教育，有許多困難或矛盾，他把這些叫做先生關、娘子關、買賣關、衰老關、飯碗關、孤鴉關、瓜分關、課本關，……等，要克服這些困難或矛盾，用陶氏的話來說，要攻破這些難關，只要我們拋棄老一套的辦法，和傳統的學校觀念，重用小先生就可以。

陶氏有了這個信念，便着手在山海工學團實行起來，他把在校的小學生做小先生，譬之爲電子核，要他們回到家裏教父母姊妹或鄰住小孩和大人，這些圍繞在小先生周圍的叫電子。不經常來校而是來問字或突擊的譬做游離電子。小先生教了別的小孩，這個小孩又找了幾個人去教，這就有了二代，如果第二代小孩又去教另外幾個小孩，這就有了三代。陶氏鼓勵那些教的代數多的小孩，在他身上掛紅綠布條，有一代加一條。

大約是一九三四年的四月四兒童節日，他在山海工學團舉行小先生總動員大會，到會的兒童有好幾百人，一隊一隊拿着他發給的紅綠旗子。他號召每一個兒童都要教人，把每一個字，每一

句話，都要像刺一樣向敵人刺去。那天，寶山縣的教育局長馮國華先生也來出席，他非常佩服陶氏的主張，立即在他的縣裏大規模推行起來。後來，這位局長因此得罪了國民黨反動派，被撤職了。抗日戰爭發生後，國民黨老爺和軍隊都嚇跑了，這位被撤職的局長因被人民愛戴，在上海近郊領導人民組織游擊隊抗日，不幸殉國。

陶氏提倡小先生運動之後，不過年把，全國各地都響應了，但國民黨的CC特務頭子陳立夫有意汚衊陶氏說，陶行知沒出息，提倡小先生運動，上海長三堂子裏把不接客的小姑娘稱做小先生呢！

但教育界不乏明哲之士，大家仍舊運用陶氏的小先生辦法，反動派沒辦法，只好改稱導生了。

陶氏聽到陳立夫的汚衊之後，微微笑笑說：「照陳立夫這樣說法，那末大先生不成了妓女了麼？」

三八　從報販工學團談起

當你，一從靜安寺電車站下來，如果發現一大堆骯髒的賣報小孩，團團圍住一個人，而那個人一手拿報，一手在袋裏摸錢，嘴邊笑嘻嘻的。定眼一看，不是別人，正是陶氏。他和滬西一帶

的報童，親暱的像父子家人。他讀報給他們聽，問他們可認得報上的字，知道報上講些什麽？很快，他就把這一批被遺忘在街頭的流浪兒童組織起來，給牠題個名號叫做賣報兒童工學團。他除在報童中尋出一二個稍識字的兒童爲小先生外，又要他們自選一個團長，負責領導。他派方友竹去幫助這群小孩。有一天，他很鄭重的問友竹，賣報兒童工學團裏需要一間房子進行集體學習，可找到沒有，應趕快設法。大約過了好幾天，友竹才在一位報童家裏找到一間房子，他對陶氏說，房子找到了，是一個賣報兒童的家，木板釘成的板屋，很窄小，他一家大小睡覺、煮飯、吃飯、工作都在那里，房裏堆滿了破破零零的雜東西，但孩子的媽媽很好，她說，窮人子弟一輩子也沒指望讀書，連個數字也不識，你們能來教，好極了，我願意收拾出地方給你們用。她說着就和我們一起動手，打掃整理乾淨了。

陶氏聽說，哈哈大笑，高興起來。他說，陽光照不到的貧民窟裏，正是我們所應去辦教育的地方。這時候，他除掉在大場、江灣、梵王渡、漕河涇、北新涇等上海郊外的鄉村辦了許多工學團爲農民服務外，逐漸向上海市內發展。他替滬西勞動生路的紗廠女工們辦了一個托兒所，來援助那些貧苦無助的婦女。他提倡知識份子應該和勞動工人結婚，來互相改造。在他號召下，銘勳同志等和女工結了婚，共同在工人中進行教育工作。

這時候，他建立了一個明確的認識，使他在思想上更前進一步了：他從事實上認識到中國革

命要得到成功，只有工農聯合起來革命，打破了過去以爲中國革命只要單靠農民，所謂綠色政黨的思想。因此，他把一九二七年寫的鋤頭歌加以修改，添上一段道：

「光靠鋤頭不中用呀，
聯合機器來革命呀。
荷雅嗨，
雅荷嗨。
聯合機器來革命呀，
荷雅嗨
雅荷嗨。」

三九　國民黨賣國賊的血腥鎮壓

一二八以後，國民黨賣國賊蔣介石汪精衛等，高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實質上早向日本法西斯投降，躲在敵人的褲襠下無恥的叫出敦睦邦交，中日經濟提携等。國內軍民，眼看國民黨反動派如此下流無恥，敵人得寸進尺，兇燄高漲，人人切齒痛恨。因此又爆發了長城抗戰，士兵前仆後繼，英勇衛國，喜峯口一役，又把敵人打得進退不得。後來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等又在

張家口一帶組織人民抗日自衛同盟軍，直接和日寇作戰，屢創敵人。但所有這些抗日戰爭都被國民黨反動派出賣了，他們除向敵人告密而外，又派他們的所謂中央軍和敵人配合夾擊抗日民。抗日將領吉鴻昌被圍之後，好容易突圍到天津，但國民黨反動派却派特務暗殺，幸而遇刺未死，反動派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公然去逮捕他，說他叛變，把他槍斃了。叛變民族和人民的，正是國民黨反動派自己。以後，他們就派臭名遠揚的漢奸何應欽跑到天津和日本法西斯代表梅津，簽定了一個賣國協定叫做何梅協定。從此，華北五省便賣給日本了。日本著名的法西斯陰謀家土肥原公然進入華北來策動什麼華北五省自治，日本的法西斯外相廣田定出有名的廣田三原則，即共同防共、經濟提携、中日親善等亡華毒計，國民黨反動派像孝子孝孫一樣唯唯聽令，便大大的在國內壓迫人民的一切抗日運動，禁止人民募款接濟東北義勇軍，逮捕和暗殺抗日志士。

就是稍微有一點違犯反動派賣國賊意志的人，也要把他置之死地而甘心。我可以舉兩個盡人皆知的事例。首先是楊銓，楊是國民黨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長，當時在上海亞爾培路該院附近被人暗殺了。原來，楊和蔡元培等不滿賣國漢奸的血腥行爲，在滬與宋慶齡、魯迅、陶氏等人本組有人權保障大同盟，殺楊就是用以恐嚇蔡、宋、魯、陶等人的流氓手段。

第二件事是上海申報館主人史量才在杭州被暗殺，當時報紙上連篇大字登載，輿論一致要求國民黨政府緝兇法辦。國民黨政府就假惺惺的公佈了一條命令，責成浙江省主席魯滌平赴日破

案。然而十多年了，至今冤屈未伸。其實殺史者正是國民黨老爺，他們從南京電令魯滌平殺史，然後又電令他緝兇破案。事情的內幕是由于國民黨反動派想收買和掠奪申報館。遠在一九三一年當時申報副刊「自由談」請黎烈文主編，常登載革命文人魯迅和陶氏等人的文章，反動派大爲不滿，要求派他們的章衣萍去，史不許。便恐嚇他不許登革命文人的文章，後來又要求加入股份爲股東，其實是變相掠奪；史仍不許，索性就玩上海流氓綁票匪的手段，匿名恐嚇，要殺他。當時，陶氏住在史宅附近，有時住在他家裏，知之甚詳。結果，史就被暗殺掉了。

在賣國賊血腥鎮壓下，全國一片黑暗，人民又沉入黑暗統治時期。陶氏在滬的新教育活動并不因此而減弱。

四〇　普及人民需要的教育

反動派當時在教育方面提出推行民衆教育，提倡生產教育，其實是進一步麻醉欺騙人民，和藉此轉移文化教育界的視線。正在那時候，全國有名的鄉村教育團體和從事鄉村改革運動的人，在無錫舉行了一次鄉村工作會議，討論今後工作方針，出席的團體有晏陽初主持的定縣平民教育促進會，有梁漱溟主持的山東鄒平鄉村建設研究院，有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有無錫民衆教育學院，有中華職業教育社徐公橋實驗區，還有其他許多團體。生活教育社也有人參加。

會上梁漱溟先生根據他的理論，竭力主張中國農民不怕窮，窮在沒有守秩序和好好生產；帝國主義也不可怕，怕在我們自己推翻了舊制度舊秩序，而又沒有新的。他以爲教農民們守封建秩序，從帝國主義侵略到的城市，退到鄉村來，用中國舊時分散的家庭式的經營生產，旣可以抵禦帝國主義資本侵略，又不致於發生階級鬪爭。他所用的辦法，是重用鄉村裏的地主士紳來組織學董會，辦鄉學，校長即鄉長，政教合一。有人批評梁氏這一套是企圖恢復封建制度，建立地主王朝，是一種復古運動。可是，他主持會議時，在會上有劇烈的爭論。

至於晏陽初辦的平民教育促進會，則完全抄襲西洋，他們以爲中國之所以貧弱，由于人民貧弱愚私四大根源，所以他們提倡生計教育以救貧，衛生教育以救弱，文藝教育以救愚，公民教育以救私，可以說是一種維新運動。他們倒果爲因，不了解貧弱愚私是由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對人民剝削壓迫的結果。

民衆教育學院，追隨梁晏之後，主張和辦法大都和他們大同小異，但有識見的師生已感覺到此路不通。所有中國這些鄉村教育運動或民衆教育運動，都不是站在人民大衆的立場上，實質上只不過爲地主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培養奴隸與順民而已！

當薛暮橋同志返滬，把會上情形詳細敘說了之後，我們很想陶氏發表一些意見。因爲他在國內首先和晏陽初等創辦平民教育促進會，親自參與和推動過這一個運動。後來，他辦曉莊鄉村師

範，數年間，全國都辦起鄉村師範來，又開闢了鄉村教育運動。近代中國教育史上的幾次大運動，幾乎和他分不開。因此，他的意見，一定含有沉痛的經驗。

過了好些時候，他發表了很簡單的意見。他說，反動派在那里提倡生產教育，我們今天最迫切要做的事是使生產的勞苦大衆受教育，不是生產教育而是生產者受教育。

受什麽教育呢？受工學團教育，受人民所需要的教育。人民需要的是反抗帝國主義的教育，是反對剝削壓迫的教育，是起來做主人的教育，而不是其他。其他都是次要的。我們要在上海來着手普及這種教育。

因此，他邀了一些朋友，於一九三三年組織了一個中國普及教育助成會，一邊計劃，一邊進行籌款，會址設在威海衛路中社。工作進行得雖不順利，但不久，除上海四鄉的工學團而外，又發展到無錫和南京等個別農村。不過，最重要的是在滬西、虹口、楊樹浦和浦東一帶的工廠區域，逐漸建立了工人夜校和識字 等。

四一 國難教育運動

陶氏主持的事業在人民擁護下，日益發展，爲了把工作進行得更順利，我們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參加者陶氏外，有宋慶齡、勁夫、洞若等同志和我，當時大家分了工，我擔任了編輯工作，生

活教育半月刊改由我負責，並交生活書店發行。我們又組織了編輯部，為了避開特務的耳目，編輯部是不公開的，大家按時去辦公，陶氏經常坐在寫字台上，不是看各地來的信件，便是寫回信或寫文章。那時，生活教育半月刊上有行知行談一欄，是他個人發表教育論文的園地，常署名銜這個他自己創造的新字來一面代表他的名字，一面代表他行而後知的教育思想。

從那時候起，生活教育雜誌的內容大大不同了，著重推動國難教育，痛斥國民黨反動派的賣國行為，鼓吹抗日運動。但反動派禁止人民抗日，不許發表抗日和仇日的言論。老爺們設立了一個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來專門做這一件事。每逢有抗日字樣時要以××來代替，要公開號召抗日，公然反對蔣介石的賣國行為當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須用曲曲折折，隱隱約約的遮眼法來逃避檢查官的眼睛。就是老爺們一時疏忽幸而漏網了，如果再被發現，就有坐牢、拷打，或禁止發行的危險。陶氏在這方面特別謹慎，幾乎每一篇重要文章，都仔細閱讀過，他是雜誌的實際負責人。很快的，這個雜誌便成了抗日教育的宣傳者，得到各地教師們的熱烈擁護。

後來，上海各雜誌編輯人又組織了座談會，進一步分工與集中力量鼓吹抗日和反對賣國政府的罪惡行為。

每年暑冬兩假期，散在全國各省，北至哈爾濱，西至蘭州，南至廣東、廣西甚至南洋羣島辦學校的曉莊同志，都要到上海來聚聚。陶氏便運用了這個機會辦假期講習會，一面互相交換經

驗，一面請上海文化界人士做有關時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告的報，鼓動抗日，推進抗日教育。後來，許多上海的中小學教師也參加了。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運動發生了，北平學生衝破了反動派的水龍、皮鞭、大刀和槍刺，舉行示威遊行，反對國民黨秘密賣國，反對國民黨承認日寇導演的華北五省自治和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僞組織，示威學生萬餘人，一致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停止內戰，槍口一致對外」。反動派竟以宋哲元的軍隊，拿大刀砍殺學生，致有多人死傷，但人民的愛國熱血在反動派高壓下更沸騰了，十六日又有五六萬學生和市民舉行示威遊行。

自從這個愛國運動爆發後，全國人心大振，立刻各地的學生都起來響應。上海大中學生八千餘人在軍警嚴重戒備下，也終於爆發了大示威，包圍了國民黨上海市政府，要吳鐵城回答爲什麼捕殺抗日人民，要他擔保以後不許逮捕和禁止人民的抗日行動。我和純采同志回到住所，把這些情形告訴他，他高興極了。他說，北平學生南下代表快到了，我們準備迎接他們，和他們建立關係，以便建立一個南北統一的抗日大聯合。

那時候，我們在上海提倡國難教育，北平學生也提出非常時期教育方案，反對反動派的平時教育。但這個運動是抗日運動的一部份，反動派不允許人民辦。

陶氏在寒假教師講習會上，首先提出組織國難教育社。他說，我們要團結起來，用大衆的力

量來爭取。接着，他擬定了國難教育方案：規定國難教育的目標爲推進大衆文化，爭取中華民族之自由平等，保衛中華民國領土與主權之完整。規定教育對象爲大衆聯合起來解決國難，要知識份子將民族危機向大衆廣播；規定一切前進的大衆、小孩、學生、教師、技術人員都可以任教師；規定國難時期的非常課程應集中在解決國難所需要的知識上；規定教育方法爲在行動上取得解決國難的眞知識……使牠在解決國難上發生力量。他認爲只有民族解放的實際行動才是救國教育。最後，他指出只有用武力抗日，只有大衆起來抵抗，才能起死回生。他又指出，「中國不但可以抵抗，並且可以久戰，獲得最後勝利。」

在這個方案中，顯然的，陶氏的教育思想又大踏步前進一步，他完全脫出了舊教育的圈子，用大衆的力量自動組織起來自動進行自己所需要的教育，而且有了明確的奮鬥目標，有了進一步依靠羣衆的思想。他提出大衆的國難教育必須對流，要消除領導者與被領導者，或教者與學者之間的隔板，就要上下對流，接受羣衆的領導，否則便會脫離羣衆的要求，把國難教育變成一個麻木不仁的東西。

四二　磨擦發生火花

在終年不息的參加羣衆性鬪爭中，陶氏更前進了。他對過去生活教育和教學做合一的教育主

張，有了改進和新的發展。過去，他對生活教育的解釋，非常空洞，只說出一般的原理，說是生活即是教育，是好生活即是好教育，是壞生活即是壞教育。而且空泛的規定生活教育爲生活所原有，所自營，所必需，並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大約是三五年前後，滿力濤同志首先質問他說，照你那樣解釋，生活既是教育，自古以來，有生活即有教育，又何必我們去辦教育呢？據滿力濤同志的意見，教與學對立，生活與教育對立，所以才發生火花，產生教育的作用。

這個質問，立刻引起陶氏的極大注意，他研究了之後，便把他原先的解說加以補充，指出生活教育的特質：第一是生活的，只有生活與生活的磨擦，才能發生火花，起教育作用。第二是行動的，所謂生活與生活磨擦，便包涵了行動的主導作用，行動產生理論，發展理論；第三是大衆的，生活鬬爭是大衆惟一的教育；大衆自己辦的教育，大衆爲生活解放而辦的教育。第四是前進的，前進的生活可以引導落後的生活；第五是世界的，衝出傳統學校鳥籠。馬路、弄堂、工廠、店舖、監牢、戰場，凡是生活場所，都是我們教育自己的場所；第六是有歷史連系的，前人的經驗也要有選擇的接受，不能跌入經驗主義的泥溝。

陶氏明白的說明生活教育是大衆在生活鬬爭中求自己解放的一種行動。這就把教育明朗的規定爲大衆求解放的工具，這就把教育與羣衆結合起來，與羣衆需要結合起來，與羣衆的鬬爭，也就是與羣衆的實際革命鬬爭結合起來，這就是結合實際，結合羣衆，結合革命的一種新教育。

陶氏明白的指出，生活中發生矛盾，引起行動或者磨擦，才能發生火花引起教育作用，他指明實際生活是矛盾的根源。可惜，他說得較含胡。現在，我們才十分明確的知道，所謂生活上的矛盾，不外是階級社會中這一階級或統治剝削階級與另一階級或被統治剝削階級的矛盾，此外就是人與自然的矛盾。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自然鬥爭和社會鬥爭，人類一切知識都是從這兩種鬥爭中產生的。這就是目前我們新教育的重要內容與根據，離開這個根本的東西去談教育，都不免空洞無物，變成死讀書的士大夫教育。如果，主張生活與教育矛盾，才起作用，那就是二元論者。不錯，教育者與學者，或某種新思想新事物與舊思想舊事物是矛盾對立的，例如土地改革中的封建思想，這就須經過嚴重的鬥爭，但這不僅是思想鬥爭，我們不要忘記了這是一個社會鬥爭或社會革命，也就是人民大衆的實際鬥爭生活。先進份子在羣衆中的鼓動教育作用，只是實際社會已存在的東西，只是羣衆需要迫 解決的矛盾。因此，在這裏教育者與學者不是對立，而是統一，統一在共同利益上和共同奮鬥目標上。也就是說，教育與生活是統一的一致體。否則，就是脫離實際，脫離羣衆。如果教者與學者有矛盾，或教育與實際生活有矛盾的話，前者不是學者受舊社會舊思想毒太深，一時不易啼悟，需要啟發他，經過長期的思想鬥爭；就是出身階級成份不同，需要說服他放棄本身自私自利的一時小利，而爲人民大衆的長遠利益着想。後者，則完全是教育脫離實際，脫離羣衆利益的結果。

我們明白了這一點，就可以瞭然，剝削統治階級爲什麼實行欺騙麻醉教育，爲什麼實施高壓强迫訓導，爲什麼要思想統治。這就是由於剝削階級的教育是違犯羣衆利益的，是違犯眞理的。也就不難明白，人民大衆的新民主主義教育的基本學習方法是啓發其自覺，這是由於新教育是代表大衆利益的，是他們解決矛盾所迫切需要的，從師生關係或教育與生活的關係來說，牠是統一的。

陶氏在這方面雖說得模糊，但較之一九二七年明確得多了。他已指明教育不過是人民大衆謀解放的一種工具。就是要在兩大鬪爭中取得勝利的工具。這兩大鬪爭表現在人民大衆實際生活上，幷不是並列的，牠雖同時進行，人有生活就脫離不了這兩種鬪爭，但也是有前後緩急之分的，例如以目前中國人民大衆的鬪爭來說，社會鬪爭是主要的，其次才是自然鬪爭。到了戰爭勝利結束，和平時期到來，則生產建設的自然鬪爭，所謂工業化或機械化電氣化的鬪爭就要佔主要地位。就以社會鬪爭來說，各個時期也是不同的：在抗日時期，民族矛盾第一，因此我們有抗日教育；而到日本投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向人民大衆進攻的時候，則國內賣國獨裁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與人民大衆的矛盾佔主要地位，因此，陶氏在國民黨地區大聲疾呼民主教育，而在解放區則普遍進行時事階級教育。如果不認清這些重點，也就會犯錯誤。

如此，我們又可以得到另一個結論，實際鬪爭生活即是教育，但不等於自由主義者說，凡是

一切生活都是教育。我們的教育，必須有計劃，有步驟，有進程向前邁進。這個所謂計劃、步驟、進程，不是一些資產階級的教育家侈喊兒童本位主義，兒童祇是一個次要的條件，主要依據是整個民族人民解放鬪爭的目標，各個不同情況下的具體任務與人民大衆的生活。根據這一些，我們才能擬定合於客觀情況需要即人民需要的計劃，步驟、內容、進程等等。如此，才可以集中力量，有効的進行鬪爭和獲得知識。一盤散沙，無政府狀態的讓學生或教師自流，那不是生活教育或新教育，而是放棄領導的無政府教育。另一種便是傳統教育，他不是抄襲外洋主觀主義憑空規定出來，就是根據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需要定出來的計劃、內容、進程等，這些我們就需要來牠一個肅清。現時，我們在教育上大談結合實際、結合羣衆就是要肅清這些殘餘。

由此，我以爲陶氏在教學做合一中所規定的過程，應該加以補充，生活生矛盾，死人沒有生活所以沒有矛盾，活人除自然環境自然壓迫痛苦外，還有階級壓迫剝削與痛苦，所以又加上一個階級矛盾。因此我們可以說生活生矛盾，矛盾生行動。這就是我在三二節所說的根據客觀發展形勢，提出當前行動任務。如斯，陶氏所說的行動才有根據。否則，我們無緣無故行動，豈不成了狂人；如果無目的的亂七八糟行動，不又成了妄動。

四三　救國會的誕生及其活動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是陶氏在教育理論上達到最高成就的年份。也是陶氏積極參加人民大衆求解放鬥爭的年份。一二九發生不久，他立刻組織了國難教育社，高舉抗日教育的大旗走向工農羣衆。在他號召之下，許多青年男女和教育界人士都站到他的旗幟之下來奮鬥了。

有一天下午，他叫人帶了一個字條給我，說下午三時上海各界在寧波同鄉會開各界救國聯合會，要我趕去參加。到時已擠滿一堂，只見花白長鬚的沈鈞儒老先生，已在致開會詞。從那天起，驚動世界，曾在抗日和民主和平運動中起過積極作用的救國會便產生了，陶氏被選爲理事。

自此以後，上海人民和文化界又活動起來了，抗日的正義呼聲掩蓋了反動派無恥賣國的爛調；千百萬人民氣壯山河的行動，壓住了反動派的兇燄。出版界也頓時活躍起來，報導抗日行動和號召抗日，駁斥反動派亡國言論的書報雜誌，也似雨後春筍般的怒長起來，多年以來，無聊文人林語堂和後來投日漢奸文人陶亢德所提倡的幽默文學，明清語錄體文，以及他們所出版的「論語」、「中庸」之類，被抗日雜誌和大衆化文字所洗刷了。

在救國會統一領導下，上海的羣衆運動，特別是遊行示威加多了。幾乎一切不常的紀念日都成了遊行示威日，連影星阮玲玉出殯也成了羣衆的抗日遊行示威。有一次在新聞路，示威羣衆數萬人秩序井然的遊行着，不斷的喊着抗日口號，途爲之塞，所有的汽車，不得不停下來，領導遊行的沈衡老，陶氏等立刻站上汽車頂，向羣衆發表抗日號召。一九三五年的一二八上海抗

戰紀念日，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領導各公團到抗日將士墓前去公祭，在國民黨反動派大批軍警和帝國主義大隊巡捕彈壓下，首先由沈衡老等救國會領袖四人一排，手臂挽着手臂，擎着大旗在前開道，上海市民數萬人尾隨，在烈士墓前大聲疾呼國人起來抗日救國。國民黨派特務在羣衆中破壞，當場被羣衆檢舉公審，并飽以老拳。

陶氏對工人教育幹得更有情緒了，他領導國難教育社同志在滬東、滬西和浦東，大量開展工人夜校，識字班和訓練班等。工人成了救國會裏的主力軍，每次示威，都有大批工人參加，他們并積極和日廠老闆進行鬭爭，有一位工人梅君在鬭爭中被日寇打死了，上海各界一致聲援，陶氏爲他出特刊，并寫了一首輓歌，悲壯的呼號工人繼續行動起來復仇。

他有一次對我們說，工人力量偉大，你只要坐一路公共汽車從楊樹浦走過，當工廠放工的時候，馬路上的工人羣衆像人海似的從各個工廠裏吐出來，那數萬人的隊伍多末雄壯偉大，你要是和他們在一道，就會感到很大的勇氣和力量。他勸每個知識份子都要常到那些地方去，和工人在一塊，對他們進行教育。

四四　出國與二次被通緝

一九三六年的夏天，世界新教育會議在倫敦舉行，他被邀出席，但國民黨反動派不發出國護

照給他。那時，反動派懷恨抗日份子刺骨，老爺們把抗日的人民稱做人民陣線，這些人主張抗日和反動派的降日主張背道而馳，老爺們認爲這些都是搗亂份子，不穩份子，危險份子，而結果就加一個罪名說是暴徒。反動派曾在暗中追踪救國會派領袖和積極份子的行動，幷千方百計的尋找口實或罪狀逮捕他們。老爺們又怕陶氏出國後，會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反動派種種無恥賣國的罪行，當然更不願意放他出去了。

他不得已，只好一面把上海方面的工作交給我們大家，一面到香港去設法。臨出國前和沈衡山、鄒韜奮、章乃器四人署名發表「呼籲團結禦侮」的宣言。他先到英、法、比、德等國，以國民外交使節的資格，宣傳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國的種種暴行和中國人民的正義抵抗及呼聲。

幾乎每星期左右，他都有信給我們，報導他在國外的行動，他也要我們把國內的行動不斷的告訴他，以便國內外的行動一致。來信總是殷殷勉勵我們，長篇大論的寫來，涉及的事情太多，現在已記不清楚。在我腦海中只有幾件事，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說，他在德國鄉下和老百姓談話，開始德國老百姓以爲他是日本人，當說出自己是中國人的時候，那德國人很高興，詛咒日本法西斯和希特勒一鼻孔出氣，奴役和掠奪全世界人民連德日本國人民也在內。他很高興的告訴我們，德國人民反對希特勒魔王。就是在法西斯國家裏面，也有我們的戰友

在新教育會議上，他做了關於生活教育，教學做合一及小先生等報告。事後，他寫信告訴我

們，在他的報告中，最令人注意的是小先生。印度和坎拿大代表尤感興趣，代表們并打算回去也照樣試試。印度代表還堅決要求陶氏到印度去宣講他的教育主張。他在信尾帶總結似的語氣說，小先生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剝削壓迫民族普及大衆教育的好辦法。

不久，新教育會議結束，他便到了美國，聯合當地華僑組織救國運動。他又向美國人民作種種宣傳，呼籲美國人民同情中國人民的抗日運動，起來要求該國大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政府停止發售軍火和廢鐵給日本來屠殺中國人民。顯然的，他在美國工人中得到了很大的成効，美國太平洋岸的碼頭工人拒絕裝運廢鐵到日本去，因此廢鐵堆積得像連綿的山岳似的躺在那里了，他拍了好些照片，把美國的眞實情形，向中國人民報導。

他有一次在信中很愉快的說，我發明了一個宣傳辦法，在華僑開設的洗衣局裏，他和老板商定，在每一件衣服口袋裏，都塞進一張傳單，勸美國人民幫助中國人民抗日。

他又聯合杜威，羅素等英美名流，對美國知識份子和上層人士進行宣傳工作。在美國演講是可以賣錢的，陶氏每次演講的入場劵只能賣上美金五角。他又賣唱，但他的歌唱實在不高明，他在信上說，我在此地搜集到一張新安旅行團團歌留聲片，一邊開放留聲機，一邊學唱，居然學會了，在一次的華僑集會上，他唱得很成功呢。他把在美國的捐款和他賣講所得的錢，全部寄回國內作爲救國經費。

陶氏出國後，國內人民抗日鬭爭更蓬勃了，國民黨的鎮壓運動也就更瘋狂和無恥起來，可是，人民站在反動派和日本法西斯雙重屠殺壓迫前面并未畏縮，相反的，更英勇更慷慨激昂起來。上海每一次的抗日示威遊行都有數萬或十幾萬人，曾在南市徒手和反動派的軍警對抗過；也曾在老耙子路及南京路和帝國主義的巡捕作過流血鬭爭，前仆後繼，英勇奮鬭，誰也不願退縮。有一次，上海數萬市民遊行到了北火車站，一致要求赴京請願抗日，市民們意志堅決，人人臥在軌道上，要求乘火車，反動派不許，派了大批軍警來鎮壓，雙方相持一天。有一次，上海學生數千人佔據了北火車站，自動開火車赴京請願，開到無錫，便遭反動派的軍隊武裝押回來了。

反動派已在上海大批捕捉抗日份子，特務滿佈了上海市街，我們的編輯部已被特務暗中光顧了，許多人都失去行動自由，暗中被特務釘哨、恐嚇等等。不少救國會的中層骨幹份子失蹤了。大批大批的抗日志士被屠殺、被監禁、被上電刑、灌辣椒水、沖涼水、上老虎櫈等殘酷慘無人道的酷刑。

忽然，有一個清早，張宗林同志來說，沈衡山、鄒韜奮、李公樸、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等被捕，解到南京去了！陶氏也在被通緝內，幸而已出國。這就是世人所說的救國會七君子之獄。

四五 陶氏的私人生活

陶氏幾乎沒有一般人所說的私人生活，他終日爲人民大衆事業，忙碌的奔波着，他對於自己的妻子兒女和對待一般同志沒有什麼差別，他也不常在家裏，大家都覺得他對子女太不關心了。我很少看到過這樣爲人民而忘我的人過，他這種偉大的精神，深深的感動了人。提起他的家庭是很悽涼的，他妹妹文渼先生逝世後，所有家務和四個小孩的教養，全由他六七十歲的老母親負担。老太太勤儉持家，燒飯掃地，全自己動手，家裏一直不用老媽子。後來，移住上海，年老多病，才僱了一位娘姨幫忙。他母親早幾天還在我們家裏玩，勸我們節省過日子，青年人苦些不要緊，但不久就突然患腦溢血，送醫院不治而死。他和他的大兒陶宏，親視老太太溘然長逝，便對陶宏說，我們睡吧，祖母身體不好，想不到她會活這樣長。說吧，他就呼呼大睡，而陶宏則無論如何睡不着。可見陶氏理智很强，很灑脫得開。陶氏一貧如洗，靠了一些朋友的幫助，才把母親安葬到南京曉莊去。

他的妻子則患不治之症多年，在他出國不久，也去世了。他的家早已離散，大兒得朋友幫助去中國科學社學習，三兒跟親戚去南京，二兒和他最喜歡的四兒蜜桃，則留在上海和我們住在一起。陶氏不溺愛他的子女，也不像庸俗的父母把子女當私有品過分照顧他們。但他對母親的愛和

對子女的感情和關心他們的教育，則並不弱於人。因爲窮，不能送子女一個個進資產階級的大中學校，他從小就幫助兒女發展他們的愛好，等到高中程度他就送他們進專門機關跟教授學者做學徒，如此，幾個兒子都有了專門的造就。

他平時，不喝酒、不吸煙，無任何嗜好，他喜歡一點糖菓、花生米之類，大概因爲忙碌，沒有吃飯的緣故吧，他拿出一把來和你一邊吃，一邊談笑着。如果有什麼好電影、好話劇，他就招呼你一起去看。他到處都有親密的青年朋友，他似乎唯一的愛好就是青年和羣衆。他常說，人要不落伍，不老氣橫秋，就要和青年在一起。

任何受苦受難的青年人，只要找到他，他總是親熱的伸出雙手來援助。他設法找人送錢或送書給在獄中受難的青年。當他十分窮困的時候，如果袋中有一毛錢他也會給你。

這個倔强的鬭士，受國民黨反動派政治和經濟上雙層壓迫，但他從不消沉。他那幽默和瀟灑的作風，常使人感到可親又可愛。

有一次，他光脚到國泰大戲院去看戲，那所劇場比較濶氣，觀客差不多都是些中上層社會的中外人士，司閽看他身穿舊學生裝，光着脚，不准他進去，怪他沒有穿襪子。他一聲不響的候在那里。一忽兒，有個摩登女郎，光腿露臂而來。他看她進去了，連忙對司閽人說，她不也光脚麼，你爲什麼許她不許我進去？司閽人理屈，很客氣的請他進去了。

他在上海這一段生活，仍和在鄉下一樣艱苦樸素。平時靠賣字、賣稿、賣講所得維持學校和家庭生活。出國前，他通知二兒曉光到他的住處去取回他的東西。拿回一隻網籃，兩隻破箱，打開一看，除幾件破襯衫外，盡是些書信、書籍、雜誌和一堆破襪子而已。

三　寫他在抗日和民主鬪爭時期

四六　抗戰爆發了

一九三六年的冬天，正當反動派一面進兵西北加緊內戰，一面在全國各地殘暴的鎮壓抗日運動的時候。突然，爆發了雙十二事件，第二天一早，上海各報都用大紅字標題揭載出來。頓時，全市沸騰，議論紛紛，人心為之大快，認為禍害根蔣總災，這一次可完蛋了，許多人都主張殺死這個壞蛋，許多人都以為這一次落在共產黨手裏，老蔣的狗命嗚呼了！這是怎麼一會事呢？原來，蔣介石命令東北軍不放一彈讓出東北大好山河，從此流亡關內，華北事變事，東北軍又被日寇驅出華北。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辭別了我的爹娘，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關內流浪……」

東北軍在沉悶的恐怖空氣中，哀婉的唱出這流亡曲子，他們被蔣介石鞭策得驅上內戰火線。共產黨紅軍，要求蔣介石和中國一切軍隊，特別是東北軍，停止內戰，槍口一致對外，一起打回老家去。但萬惡的蔣介石却嚴厲的責罰他們，要他們去包圍陝北紅軍，不許紅軍北上抗日。東北軍內的血性愛國將士，再也忍耐不住了。張學良、楊虎城一再勸老蔣停止內戰，一致團結抗日，被老蔣訓斥一頓，而且限令他們剿共，否則，以軍法論處。那時，西安的學生和群衆士兵等，也一致要求團結抗日。在這情形之下，張楊便實行兵諫，把老蔣扣押起來。起初老蔣的態度橫蠻不講理，士兵們要求如果不答應我們抗日，就槍斃他。共產黨不計十年來的深海大仇，爲了顧全整個民族生存，勸東北軍釋放蔣介石，并對老蔣曉以民族大義，忠告他團結抗日則生，剿共則必亡。老蔣才簽字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張學良送老蔣回南京，不料反被老蔣扣押十多年，至今未放。

自此以後，共產黨發表宣言，取消蘇維埃運動，把紅軍改編爲八路軍，國民黨也宣佈了中共合法，實行國共合作了。

蔣介石被釋不久，日本匪徒便向平津進軍，日軍以操演爲名，佔據了許多軍事要地。他們在中國軍隊的刺刀上擦火抽烟，百般欺辱中國軍民，士兵再也忍受不住了，七月七日便爆發了蘆溝橋抗戰，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的槍聲一響，人心大奮，我記得全上海市鞭炮徹夜不絕的放了一整

夜，人民額手稱慶，揚眉吐氣的時代，終於又爭取來了！

那年夏天，我們正在北蘇州路附近辦暑期講習會，忽然聽到閘北方面槍炮聲不絕，知道上海的敵人也向我們進攻了，這便是八一三。大批難民扶老携幼從戰區逃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來。我們立刻結束講習會辦難民收容所。接着，上海文化界辦了許多戰時知識研究班，救護訓練班等等。一二八時代的活躍時期又來到了，人民忍受着家室流亡和冒着炸彈的危險，到處奔走，支援前線。

救國會的沈衡山、鄒韜奮等七君子也出獄了，我們借清華同學會開了一次歡迎會，歡迎他們出獄繼續抗日，會中討論了今後行動方針和具體工作。

全國氣象改變了，表現了萬衆一心，抵禦敵人的新景象。不久，沈衡山老先生便進京，參加國防會議。

我們把國內的巨大變化，立即詳細函告陶氏，把我們的工作也作了新的部署以迎接抗日。把大批幹部分配到難民收容所和工人中間去辦訓練班和從事救濟工作，同時出版了「戰時讀本」，「戰時教育」和「戰時兒童」，以加强對戰時人民大衆的宣傳教育。

不久，大批被國民黨反動派監禁多年的政治犯被釋放出來，劉季平同志一出獄便使生活教育社的工作大大增强起來。以後，我和他一同到了武漢，在那裏發動大中小學校的教師，組織了抗

戰教育研究會。那時，北方的文教界人士也大批到達了武漢，全國文化界都滙合起來了，我們聯合陝北、廣東、廣西、湖南等各省救國教育團體，成立了全國戰時教育協會，在選擧時主張實行抗日教育的生活教育社大受歡迎，而顢頇的國民黨老爺們，一再堅持換湯不換藥的非常時期教育，自被羣衆拋棄，他們便把茶房統統邀來冒充代表選擧他們。

CC特務頭子陳立夫做了教育部長，他在一次文化界的座談會上，報告他的戰時教育方案，是所謂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教育，他背誦四書五經，昏昏沉沉一直講到天黑，他特別强調禮樂，他嘴裏的禮樂就是要老百姓規規矩矩替他們去抗戰，服從老爺們的頭指氣示。總而言之是代表大地主的復古教育。但現在要抗日，人民也要求受抗日的新教育，他實在幹不了，不免恍忽起來。在陳立夫的一次招待會上，他要求我們去替他辦兩所新中學試試，第二次我和洞若一起去商談具體的辦法，陳立夫派秘書長陳某和我們接洽；我們那時候只提出，減少不必要的功課，增加抗日課程如民族統一戰綫、持久戰、醫藥常識、軍事常識等等，幷以抗日政治教育爲全部課程的中心。這祇是一些改良的辦法。爲了培養極感缺乏的技術人材，我們曾提出把工廠變成學校來加速度培養。但陳某說，你們是曉莊派，過去你們這些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們連忙告訴他會事一筆鈎消，現在我們是精誠團結抗日啊！

這個談話就此結束了一切，這還是抗日初期全國人民爭取來的進步表現。以後，國民黨反動

派便逐漸反動起來。

原來，國民黨反動派對抗日始終動搖不定，八一三以後老蔣在南京召集何應欽，白崇禧等討論軍事，大家愁眉苦臉，認為抗戰三月必亡國，那時德國大使陶德曼也在南京暗中策動投降日本，老蔣只認為日本人提的條件太高，他要求恢復七七事變前的狀態，日本人都不答應。這批動搖妥協的反動份子，抗日沒決心，內部的大小漢奸如汪精衛、何應欽、黃濟之類也極多。沿蘇嘉路所築的砲壘防綫，有的根本沒動土，有的雖建築了水泥的炮台，但無大炮，有的炮壘的鐵門緊鎖着，士兵無法進去，有的大炮上零件沒有了，士兵們憤恨的咀咒着國民黨老爺們，像潮水似的退入南京。

這時候國民黨的副總裁汪精衛在武漢組織低調俱樂部，公然從事破壞抗戰的投降活動。全國的反動黑暗惡潮又來攻擊人民了，許多抗日團體被解散了，不少青年又被捕了。我們那時除一面在學生和教師中進行動員組織和辦訓練班研究會等提高他們的認識外，并廣泛在工人和市民中進行抗日教育，辦講演站，識字班等。不久，也遭到反動派的禁止，限制我們只許作學理研究。

在這時間，陶氏和我們函信頻繁，他要我們多寄一些生動具體的材料給他在國外宣傳。我們除把國內這些變化告訴他外，要求他立刻回國來主持工作。

一九三七年秋，他便離美赴加，由加到歐洲，沿途作國民外交。在英倫時，他曾與吳玉章同

志去馬克思墓前憑弔，並草墓表，對這位長臥地下的偉人，表示了極大的尊敬。他到希臘時，又曾去囚禁蘇格拉底的獄前憑弔，並寫了一首詩道：

「這位老夫子，
為何坐了牢？
只因說真話，
得罪大闊佬。」

四七　回國之後

一九三八年的夏天，他回到香港，發表談話，願意在抗戰中從事三件工作，一是創辦曉莊研究所培養高級人材，二是辦難童學校，收容教養在戰爭中流離失所的苦難兒童，三是辦店員職業補習學校，動員華僑抗日。回到武漢時，有人請他到安徽去任教育廳長，他辭而不就。後去廣西桂林，在桂正式成立生活教育社，他在會上號召生活教育社同志須擔任四種任務，一是力求自己長進，把自己的團體變成抗戰建國的真正力量；二是影響整個教育界共同進步；三是普及抗戰建國的生活教育運動；四是普及反侵略的生活教育運動。并號召大家隨時隨地，凡是有群眾的地方如傷兵醫院、難民收容所、防空洞都是進行教育的地方。他說，生活教育理論在戰時，更顯出他

的優點來了

冬季，他回到多霧的重慶，出席國民黨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他和我們談起想辦曉莊大學，國民黨不允許，只許他辦農學院，但到重慶和國民黨老爺一談，他們連農學院也不許他辦了，特務頭子陳立夫恐嚇他說，你的學生和朋友中，很多是共產黨。陶氏回他道：他們是否共產黨，額角頭上未刻字，我不知道。但就是共產黨，他辦事認眞，又有能力，一心抗戰爲國家人民服務，又有什麽不可呢？

陶氏說完，哈哈大笑，他覺得民族國家危亡如此，這批傢伙太自私了。大學辦不成，研究所因限於經費也渺茫得很，只有香港店員補習學校，有吳涵眞等先生主持，已辦了起來。至於難童學校，在香港時已成立董事會，由張一麐老先生任董事長，許世英已答應從賑濟款項裏撥一些款幫助他。如何進行法呢？他正在考慮。

我們曾一同去參觀了反動派家屬辦的兒童保育院。從武漢遷到四川去的八，九所保育院，開始幾乎完全是我們幫他們辦起來的，替他們組織，替他們規定辦法，替他們擬教育方針、課程，後來又爲他們編了一套教材， 那時成立了一個設計委員會來處理這些問題，陶氏和我都被邀參加。但由於主持人都是些官僚太太居多數，裏面腐敗的事情，也就不堪設想。有幾件事情，最使陶氏傷心：

在歌樂山一所保育院裏，一個八九歲的女孩子因患瘧疾，未醫治，病得快要死時，被遺棄在一間房裏，無人過問，以致被老鼠吃掉半個頰面，猶張眼流淚。在另一所臨時的天后宮保育院裏，吃飯時，小孩擠在一起爭奪，大孩吃飽了，小孩亂哭亂叫，一口也沒吃到，就一直挨餓。在一間陰森森的暗房裏，一片呻吟聲，定神一看，潮濕的地上，躺了一批生病的可憐難童，有一二個不知什麼時候已死去，還躺在那裏，未被注意。天天都有些老爺太太到保育院去，他們把那些生得漂亮伶俐的兒童，都一個個領去做兒女或義子去了。瀘縣保育院，竟不斷有人去把稍具姿色的十四五歲女兒童領去給軍官做老婆或什麽的了，這是以後，大約一九四〇年的事。

陶氏氣憤極了，他說，我要選一些天才兒童來爲國家培養專門人材。不管缺嘴或麻子，只要有可培養的天才，我都要。這樣，他就下決心到難童中去選擇學生。

四八　育才學校

經費有了頭緒，學生也有了着落，他就到處尋找校址。他對我們說，最好在北碚的北溫泉附近，找個風景幽美的地方，如斯我們便可以請到一批優秀的文化人，乘空到鄉下來透透氣，順帶教教小孩。他自己到處爬山越嶺的尋覓，終於在合江草街子鎮鳳凰山頂上找到一座廟宇叫古聖寺，走上石級一看，兩邊山嶺環抱，前面一片廣濶，遠望巍峩的南山，在八九十里以外，氣宇寬

大，風景壯美幽靜，廟宇共有四進，有幾百間房屋，空氣流通，陽光充足，地上乾爽。

校址勘定後，他請我們去北碚玩，并把我們的輯編部同志陸維特、魏東明和孫銘勳等同志都調去了，以後只留我一人在重慶一邊編輯「戰時教育」，一邊和各方取得連系。他計劃中的難童學校，雖然是個兒童學校，但規模和氣魄都很大，而且在中國還史無前例。

這個學校像普通大學，共分四組（系），即文學組、音樂組、繪畫組、社會科學組和自然科學組。每一個組都是一個活動單位。他到處聘請教授，所有各系主任，都爲一時有名作家和專家，如艾青任文學組主任，章泯任戲劇組主任，賀綠汀任音樂組主任等。

主任和教授聘定之後，他就着手到各保育院挑選天才兒童，怎麽選法，有什麽標準呢？這是一個難題。

陶氏的回答極簡單。他說，我辦這所學校的目的，就是把一批有某一方面發展前途的天才兒童挑選出來，所謂天才和中國普通叫做才子的意思不同，不過在某一方面例如音樂或文學方面具有特殊的可以發展的幼苗。平常學校把這些天才幼苗被殺掉了，我們要從小就把這幼苗培養起來，使他可以得到開花結果。

怎樣去選擇這些幼苗呢？他要專家們來計劃，例如音樂組須聲帶和發音器官好，聽覺特別靈敏等，而兒童平時在這方面的愛好與表現，也是重要條件之一。他派了各組的工作人員到各保育

院去測驗，不過一二月工夫，學生都絡繹到校。古聖寺內來了一批活菩薩，立刻活躍起來：山崗、林下、池邊、田間，到處有歌聲，到處是吱吱喳喳，跳跳蹦蹦的孩子。

陶氏爲這批孩子，煞費苦心，他一壁募款，聘好教師，一壁還在日夜設計如何教育這批兒童，倘若同志在教育計劃方面給了他很大的幫助。首先規定自由研究學術的校風，師生是朋友也是戰友，大家可以互相爭論，但彼此都須服從眞理。除共同活動如早操，社會活動，週會和生產等等外，各組都有自己的生活日程表，規定各個普修和特修的課程。一般說，開始特修科很少，以後逐漸加多。因此，他雖是一個專門學校，但讓兒童在各種知識和科學方面都有一個普遍發展，便於對專門科學的深造。在計劃中，也就特別關心兒童德智體的平均發展，和情操與知識同時并重的教育。

在設施方面，這個學校和陶氏歷來所辦的學校一樣，注重實踐，他爲音樂組費盡心力買了兩架鋼琴和其他一些樂器，他爲自然科學組買了許多儀器，戲劇組除買了不少書籍和道具外還自製了一些。這個學校也特別着重和群衆打成一片，四周的鄉民都是學校的朋友。那時候，只有一個問題在實踐上沒有解決，曾有人問陶氏學國語和數學如何實行教學做合一呢？他回答得糢糊，只說，這比如磨刀，刀磨快了，就可以去用。現在，我們才知道寫話和編牆報就是最好的國語教學做，而平時記伙食帳和日用帳也成了最好的算術教學做。

陶氏這樣，在鳳凰山頂豎起了天才兒童教育的旗幟，和他在南京上海辦的學校一樣，吸引了全國人士的注意，也就遭到反動派的忌尅。

四九　三寸金頭

武漢失守，國民黨反動派避入天險之都的四川，對抗日更動搖了，一部份漢奸如汪精衛等公開投敵，到南京組織偽政府，一部份則留在重慶陰謀策動投降，對抗日運動積極份子，採取了打擊。對進步青年的鎮壓尤為殘酷，激于愛國熱情湧到部隊去工作的純潔青年，整批整批的被關進集中營，有的則被屠殺，國民黨桂永清部隊一次就用機槍把工作隊青年掃射光了。後方各大中學校的學生失踪、被捕、被暗殺的不知其數，被投入集中營的則更多。據說，當時國民黨教育部所在地的川東師範臨時集中營就經常關着幾百人，一次敵人空襲，老爺們把門反鎖而去，被炸死者就有一二百人。國民黨反動派頭子蔣介石一面効法秦始皇焚書坑儒，把抗戰書報查禁後加以焚燬，對進步知識份子加以暗殺外，他又做法西斯頭子希特勒的徒孫，在上饒、天水、鄷都……等全國設立容納幾千幾萬人的巨大集中營，放出大批特務，到處捕捉，投入營中，抗戰後期被鋼禁集中營受磨折的有為青年，至少在五六十萬人以上。

同時，他又公佈了許多法規，高呼統一思想，實行最反動的思想統制，防止人民說他的怪

話。所有這一切舉動，反動派都是爲投降作準備的。

在反動派統制思想，企圖窒息人們自由思想的時候，有一天，北碚附近的復旦大學不知舉行了什麼紀念會，國民黨一些老爺們都出席了，陶氏也被邀出席。老爺們訓話後，接着就請陶氏演說，他站起來詼諧有趣的說道：現在有人主張思想統制，在各校很時髦的流行起來。我們中國人過去最時髦的是裹小脚，脚裹得越小越好，大家稱之爲三寸金蓮，認爲美極了，這是士大夫階級在玩弄女人。現在總算進步了，已經發展到頭上，提出所謂思想統制，這就是要把大家的思想縮小到官定範圍內，越小越標準。這就是等於用塊裹頭布來裹頭了，頭裹得越小越好，成了三寸金頭，就可以到處鑽營私利。

陶氏說出沉痛的幽默，師生不斷的鼓掌，把在座的國民黨老爺們羞愧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

陶氏眼看反動派如此倒行逆施，憎恨透頂了。

五〇　碉堡生活

陶氏入川後，即住北碚，身外無長物，既居不起高樓大廈，連普通房子也租不起。他在鄉下小山崗上找到了一所舊碉堡，略加修葺以後，即搬了進去。不久，國民黨老爺們在附近砌了樓房，他那所碉堡和他們成了極諷刺的對照。

碉堡主人現在是一對新夫婦，陶氏此時已和吳樹琴女士結婚，結婚儀式很簡單，沒有任何鋪張。當他們情意已濃，雙方同意結婚時，就在育才學校舉行了婚禮，師生爲他們慶賀，熱鬧了一番，我們先一天接到他來信邀請去參加，便立刻買一塊紅布，寫了一首陶派詩賀他，詩道：

「紅燭照喜堂，
情人今成雙。
祖父變新郎，
祖母成新娘。
合家樂陶陶，
全校喜洋洋。」

陶氏那時已有孫女，乘此和他開開玩笑，他自己就是好開玩笑的人。婚後，他們住在碉堡裏，生活非常儉樸，他那時候號召大家進行寸土運動，便以身作則動手把屋子周圍的空地都種上了蔬菜。

他住在碉堡裏將近二年之久，在這裏籌劃過育才經費，擬定過曉莊研究所發展計劃，接見過育才師生共商建校辦法，討論過文藝、音樂、自然及戲劇等發展前途和教育方針，他又幫助他的夫人研究製藥，發明金雞納霜代用品，因當時川中瘧疾流行，藥物被敵人封鎖，人民痛苦萬分。

陶氏無償的送藥給貧民治療。他又幫助一位李君研究土法改良煉鋼，得到成功，將詳細經過呈報國民黨經濟部，以便大規模試辦，充實抗戰力量，但昏庸腐敗的國民黨老爺，却置之不理。後來，陶氏又四出張羅經費，俾李君一面繼續研究煉鋼，一面試驗江中小魚雷艇，以便襲擊長江中的敵艦，李君在歐洲學習造軍器多年，陶氏想盡一切辦法，把僅有的一點錢，毫不吝嗇的供給他，幷和他計劃研究方案，以冀對抗日有所助益，表現了高度愛國熱忱和抗日决心。

走進這座碉堡來的，都是些進步文化人，青年和藝術家，這就引起國民黨老爺們的嫌疑，使得當地區政府不得不去對陶氏說明他們的苦衷。

五一　愛滿天下

有一次，我到北碚去找他，突然害起嚴重的痢疾來，一個人住在育才招待所裏。深夜，他從二里多路外，打着燈籠，提了一壺開水來，問我病情怎樣。第二天一清早，他又陪我到一位德國醫生那裡去治療。病魔一直糾纏着我，臥床達四月之久，當時醫藥困難，他想盡種種辦法，終于買到了特效藥以米定和藥特靈，細雨溟濛的冬天，他親自送來。後來，我也逐漸痊愈了，他又幫助我休養。這一段誠摯的感情，永遠銘刻在我的心頭。

我說出這一節事實，不過說明陶氏平時對災難中的戰友，青年和兒童，是和愛護自己一樣愛

護的。對于一切被反動派打入痛苦深淵的人民，他都會用極大的同情來愛護他們，但是這些人的慈父和眞正的保護人。凡是接近過陶氏的靑年、兒童和羣衆，都會有這個感覺。他痛恨人民所痛恨的人，而又能愛人民和愛人民所愛的人。他常以愛滿天下自勵。但這種博愛精神和基督教無原則無階級的愛，大大不同了。他教導大家愛勞苦大衆愛被剝削壓迫的人，同時又教導大家痛惡鄙視和打擊那些無恥的剝削壓迫人民的壞蛋。

陶氏最厭惡自己內部鬧意見，不團結，勸大家「和爲貴」。有一次，育才同人間有些誤會，而且誤會到他自己，有人表示不幹了，校內空氣異常緊張。他說，當敵人向我們進攻時，我擋頭陣，打衝鋒，如果內部互相爭奪鬧意見，我就首先離開吧。我第一次看到他那樣憤激。但他第二天就又找大家來談了，他向人解釋，并要大家對他提意見。他對自己人從不記仇恨，你有什麼不對，他很誠懇的和你直說。如果你對他有什麼誤會，他除解釋外，常說，讓時間來洗刷這一段誤會吧。

五二　爲難童請命

陶氏後來爲了更好照顧育才學校，便離開碉堡遷到鳳凰山來，我們一起住在合作社裏，茅屋四周古松參天，夜晚山風吹括松林，松濤如海水奔騰，幽雅甜美，但四十壁立，薄薄的草屋抵擋

不怕冬寒，他和我們設計翻窗製大花板。那時，政治逆流，日趨黑暗，戰時教育雜誌已經被反動派暗中查禁得無法出版。生活書店被搜查，各地分店被封閉，店員被逮捕，韜奮同志一再親自質問國民黨政府爲何如此非法逮捕職員，封閉書店和暗禁抗日書籍，老爺們概不置答。後來，他又去找老蔣，才知道政府原先想入股收買他的書店，不許，便用卑鄙、齷齪的手段絞死這壯唯一的進步書店，以達到獨霸出版界，宣傳他們的法西斯獨裁賣國言論。同時，妥協投降，反共反人民的恐怖空氣，已瀰漫着霧都和全國，使人人惴惴不安。

戰時教育停刊後，陶氏對我說，反動派不允許我們講話，我們偏要到處講，隨時隨地講。奈，我們就在會客室出個大壁報。他立刻揮毫題刊爲「鳳凰山大壁報」，他是投稿最積極的人，但由于工作繁忙，只能寫些短評、短文和一些書信，他和他夫人共同翻譯了好幾篇馬恩的著作，如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致辭等。

二百多個孩子的教養，給他壓得透不過氣來，他日夜忙碌着，無暇寫文章。那時，反動派除在政治上壓迫他，時常造謠污衊他辦的學校，同時在經濟上也對他實行封鎖，不給他任何幫助，還恐嚇那些捐款給他的人；想用餓死難童這個全無心肝的手段來扼死這所學校。陶氏毫無畏懼之色，他說，讓我們來做個新武訓吧，我討飯也要把這個學校辦下去，決不使兒童餓死。

凡是可以捐到錢的地方，不論多少，他都去奔走求援。他說，我是在爲難童請命啊！大家少

吃一口，對難童就是很大的幫助了。

他自己節衣縮食，把捐到的涓涓滴滴都拿去哺養兒童。常穿着敝衣奔走于富貴大人和太太之門。他從美國回來時曾買了一件晴雨夾大衣，穿久了，又髒又破，他便把牠翻過來穿，一次去找一位闊大人，衛兵不許他進去，好容易到了第二道門，那個通報室的人，向他上下打量一番，看到他那件翻穿的又破又髒的大衣說，「先　！對不起，我們老爺向來不接待這樣裝束的人，請你回去吧。」

陶氏不慌不忙，掏出一張名片來遞給他，那人只好恭順的送進去了。

政治上黑暗，抗日動搖，人心慌慌，加上國民黨老爺們的囤積居奇，日用必需品如糧食、燃料等，天天飛漲，陶氏的經濟也就越加困難。最後，他喊出，我逼得不得不和米價賽跑啊！有人勸他放下背上這塊累贅的大石頭，意思要他自動宣告育才關門，他說，我背着愛人呢！現在要背，將來還要背下去。

五三　步步下降

在極端困難和不斷遭到壓迫危害的嚴重情況下，陶氏表現了更大的英勇，堅持進步，堅持眞理，痛恨倒退，他像一頭獅子猛吼着，只要一有機會他就用幽默的口吻譏刺國民黨反動派。有一

回，他和我們一起去重慶對岸的南山參觀一所學校，國民黨的老爺們和官府機關，爲了避免空襲，在那一帶風景秀麗的山嵐上，建築了許多輝煌的別墅和官舍。戰時佔極重要地位的國民黨全國經濟資源委員會也在那裡，恰巧那一晚該會舉行所謂精神總動員大會，夜晚在廣場上搭起樓台，燈光輝耀，機關裏的大小職員到了幾千人，老爺們也在軍樂抑揚聲中，紛紛上場。

照例在官員夢囈似的訓話一通之後，就請來賓演講。陶氏被邀上台。他很幽默的說道：

「我們要堅決抗戰，一直抗到底，不能抗到一半就睡覺，凡是中國人民，無論男女老幼，都要把自己最好的一份力量拿出來打敵人。尤其不能自己打自己人。中國的一個中字，立起來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字，如果自己相打起來，右手打左手，結果兩隻手都打斷了，倒下來，便成了日本的「日」字，這不是很可痛心嗎？」

他接下去又對許多職員說道：不要灰心，事不論大小，人不論地位，只要我們堅決幹下去，我們是會成功的。最近就有人說我陶行知是步步下降，我回國時辦大學，後來辦中學，現在降級使用當小學校長，教小娃娃了。有人看到我的許多同學、同事和我的學生，因爲善于趨勢附炎，個個飛黃騰達，步步高陞，不是面團團而爲官爲大亨，就是官至委員、部長、廳長，趾高氣揚，別人也羨慕得很。說我沒出息，才步步下降。但我是堅持爲國家，爲老百姓服務的精神，在任何情形下，就是只讓我當一名小學校長，我也要貢獻出一切力量來服務。而且很愉快，我相信我們

一定會勝利。」

他這場話，說得職員們連連鼓掌不止。這種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堅持進步，堅持眞理，堅決爲人民服務，而痛恨國賊、貪官，和一般庸俗的自私自利者的偉大精神，感召了大衆。使被壓迫者揚眉吐氣，而使聲勢煊赫的惡徒們在大衆面前，不得不低下頭來。

五四　鳳凰山夜話

一九四〇年的冬初，因爲反動派到處禁止抗日活動，國家前途越來越險惡，反動派到處向人民的抗日軍隊進攻，南北都發生了爲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磨擦。我打算投奔八路軍，到敵後去直接抗日。

在我們住所的一間小房裏，點着一盞搖晃着的豆油燈，陶氏很懇切的問我是否願意擔任育才副校長，以便他可以無後顧之憂，專心在外邊募集款項，我把上面的打算告訴他。

他考慮了很久，才說：對，到敵後游擊區去，才可以最大限度的發揮我們的力量。生活教育者應該到羣衆最多的地方去，站到鬬爭的前線去。何況，光明是在那裡，我們要把希望放到那裡去。

「就是艱苦一點，也不要緊，青年人爬山越嶺是不怕的。」他似乎有無限感觸似的談着，聲

音有些瘖啞。我們兩人默默的對着暗淡的燈光，他的夫人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回到他們的房間去了。

良久，他又繼續說道，我是時常想念着那個地方的，國民黨反動派不容我們，就讓我們都到敵後游擊區從事羣衆抗日教育吧。那裡雖有千山萬　，雖有敵人的封鎖清剿，但比獃在這兒總痛快些。

「我這個身體，」陶氏低沉的說，「不能讓我自由啊！游擊區的軍民雖然會給我一匹馬代步，也許會有一個人照料我，但我對革命又有什麼大貢獻，能接受得起這樣的優待！」因陶氏患血壓高病症多年，不能爬山和奔跑，而且隨時有爆發腦溢血的危險。

「就只怕反動派不許你去啊！」我對他這樣說。

「是呀，國民參政會中代表汪派的廿一位教授，會不斷發出污衊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謠言，許多國民黨反動派也無賴的詆毀共產黨，明明是他們在華北聯合敵人進攻八路軍，他們卻含血噴人說八路軍製造磨擦。又假造了許多文件，印刷了許多宣傳小册子，暗地裡又頒發了限共滅共的幾十條辦法。

「這是製造分裂，準備投降！」陶氏瞪大眼睛，語氣很嚴肅的說着。「我們相信共產黨提出的堅持抗日，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的方針，是目前救國家民族的唯一方針。他們也是實際上堅決

執行這一方針的人，許多中間派人士聽到反動派在參政會上無恥的造謠和叫囂，都不相信。他們提出，讓我們真正無黨無派的中間人士，親自去調查真相吧。立刻就點破了造謠者的真相，他們自然不允許通過這個提議。後來，中間人士又提出讓我們到延安去看看他們是否真正抗日。反動派造謠的醜陋面目，又一次被揭穿，又是一個不許可。

「我那時想，如果這個議案通過了，我便可以有機會到延安和抗日民主根據地去。現在，只有一個辦法，再出國一次，先到英法或美國，然後繞道國外去抗日民主根據地。」

那晚，我們談到深夜，他是娓娓不絕的談論着，我們在這方面談得很多，他曾提到，他為人民解放和民族獨立，奮鬥了幾十年，一直到現在還是無黨無派，如果我想入黨的話，可以毫不思索的請求加入共產黨，而且毫無保留的聽從一切決議，我親眼看到這個黨自成立一直到現在，始終不變的艱苦奮鬥為老百姓和民族求解放。

五五　在成都時的新發現

在這期間，陶氏為了籌款，曾去成都一次。回來，他對我們說，這一次在成都躲飛機，我有了新發現。大家連忙問他什麼發現？

「有一天，我在成都街上，突然遇到空襲警報，成都我們不熟，只好跟着羣眾跑，成都的防

空洞和墳既少又不好，市民們慌慌張張的亂跑着。我開始跟羣衆跑到少城公園，看看已擠滿了人，便又跟着羣衆跑到城外。

「一忽兒，飛機就飛上頭頂，嗡嗡的聲音，攝人神魂，負責的爆炸聲，如大雷灌耳。把那些老太太嚇慌了，一個個跪在地下唸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而炸彈就在她們附近爆炸着，有些人被打倒了。另有一些羣衆，一大堆一大堆的聚集在一起，看見飛機從東來就向西跑，從西來就向東跑，頭上又都裹着一塊白布（四川人民的習慣如此），目標顯明，危險極了。如果你也像羣衆一樣，東跑西逃，也就有吃炸彈的危險。

「這時候，我隱蔽在一個土堆後面，一壁喊大家睡下來不要動，一壁想道，我們可以跟群衆去，而且必須跟羣衆去，才可以發現問題，但不能做羣衆的尾巴。跟羣衆去了之後，了解羣衆的情況和要求之後，必須集中起來，要羣衆跟我們來，走向眞理，走向勝利。

「這就是我對羣衆教育的新發現！」陶氏很高興的結束了他的話。

這位隨時隨地爲人民着想的鬪士，他時時，事事，無時無地不在研究問題，因此，他的發現常是合於實際需要的實實眞理。這個發現，和現時我們做羣衆工作的一條原則，「來自羣衆回到羣衆」是非常接近的。

當場，有人問他，羣衆的思想，有些地方是很落後的，例如迷信和惡習之類，有人蹈在羣衆

太久了，就會同化了。怎麼辦呢？

他回道：「你要在迷信的大海裡游泳，不被淹死，就穿上潛水衣！」

陶氏在這裡所說的潛水衣就是眞理，他要大家不斷求進步，不斷用理論或眞理武裝自己，才不至于迷失方向。

五六　城中生活

反動派的投降陰謀，越來越顯明，他們的反共高潮也就達到了最高峯，一九四一年一月，正當皖南新四軍軍部奉命北移，準備渡過長江。反動派突然派了十餘萬人之衆，把新四軍團團圍住，進行襲擊，圍殲了軍部，軍長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被打死，殺死軍幹萬餘人，造成了千古奇寃。并宣佈新四軍爲叛軍，取消了新四軍的番號。

在後方，國民黨則大量捕捉和暗殺抗日份子，僅重慶市一地被列上黑名單的文化界和其他方面的人士，就有四百名。許多救國領袖如鄒韜奮等，都名列黑籍。反動派已開始按圖索驥的捕捉名單上的人物，他們除用秘密逮捕和夜晚圍抄等辦法外，又用一些流氓手腕，派三個兩個特務尾隨你，他們一有機會就拳足交加的打你一頓，說你欠他的錢，或吐痰在馬路上違犯新生活規則，一下扭進警察局，以後就再也不要想走出來了。

陶氏派人通知我們，趕快離開鳳凰山，防遭特務下毒手。陶氏自己的行動，也受到了限制。他進城後，兩手空空，無法租到房子，就借住在閻寶航先生的家裏三樓上，房子很少，只有一張小鐵床，一桌一椅罷了。我們進城後，沒有地方住，也擠在他屋裏。那一晚，我們公推他睡床，他堅決要讓我們去睡，後來大家就都并排睡在地板上。

起初，大家還有幾個錢可以進小飯店吃燒餅和陽春麵，後來，一天天化光了。陶氏在萬分困難下，改由自己做飯，用一個小炭爐，慢慢的燒着，頓頓都是他上街去購買；有時手托一包切麵，如果有人遇到他，他就會把手中的麵條向你面前一送，「喂，請吃麵！」就裂開嘴巴笑了。

這段生活是很艱苦的，他一面担心着育才師友的安全，一面又担心二百多難童的生活，至於他自己的千辛萬苦則安之如素。

在國民黨的暴政之下，再也活不下去，許多名流學者和進步文化人，紛紛化裝，衝破了反動派的重重監視，有的逃到了解放區，有的逃到香港。我和丁華，維特兩同志，在一個寒冬的夜晚，向他去告辭。

他送我們出門，叮嚀一路留心。最後，他依依不捨的說，「你們到了光明區，加緊努力；我只要有一絲留在重慶的機會，我都要在這裡奮鬥，我願我們能夠再相見！」黯然！濃烈的感情使他難受起來，他說了一聲祝你們一路平安，我們就急速的消失在黑暗中了。

過了川江，我們回頭看看燈光輝煌的山城，回想起過去在這座戰時首都的城內，和大家所幹的種種抗日活動，更想起慈祥的老師和戰友的陶氏，不知他如何渡過這一段艱難的日子，不禁爲之泫然流淚。

五七　噩耗

大約有六年之久，彼此音信隔絕。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達之同志第一個接到他從重慶發出的簡短信件，說育才照舊堅持下來了，現在又辦了社會大學。並附來了幾期民主教育。

那時，政治協商會議正在重慶召開，國民黨第一次發動的內戰被解放軍打下去了，國內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浪潮，也高漲起來，共產黨提出的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得到全國和全世界人民的擁護。反動派不得不暫時低下頭來，答應人民的要求，才有協商會議的召集，但反動派心裏是不樂意接受的，他們千方百計的來破壞這個會議。陶氏在重慶組織了政治協商會議促進會，用人民的力量來監督反動派，力爭會議的完滿成功，使中國人民能從戰爭的痛苦深淵裏爬出來，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

會議結束不久，國民黨老爺就把自己的莊重諾言撕毀了。反動派在美帝國主義幫助和慫恿下，一邊積極運兵準備進攻解放區，一邊則對國內民主勢力逐漸加以壓迫。他們又故意放煙幕

彈，喊出「教育第一」的口號。陶氏到了南京，看到這種情形，立刻喊：「什麼第一，民主最急！」的呼聲。

我們把解放區的種種建設和文化教育發展的情形，寫了很詳細的信告訴他，并要他來解放區玩玩。不久，他就托一位外國朋友帶來了回信。

信中充滿着歡悅，大意是說：「我在上海碰到美國記者維爾波先生，他告訴我許多解放區新鮮活躍的事情，你們那裡的一切都是新生的，是民主中國的先進地區，不僅美國朋友津津樂道，我尤其高興。

「他還告訴我，親眼看到成羣的鄉下人進城演戲，登台演說，成羣的鄉下姑娘和大嫂在大街上跳舞唱歌，這位外國友人驚奇極了。

「他又告訴我說，他曾去參觀過新安學校，在被敵人徹底破壞的廢墟上，如今又高聳起樓房；附近的兒童和羣衆又照舊擁進學校來。新安旅行團在民主政府培養下更壯大了，他們的活動，吸引了外人的極大注意。

「儁生先生帶來了你們的信，和更多的消息。我們提倡多年的生活教育和小先生，在解放區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而且前進了一步，這使我極高興！此刻，我的心是向着你們那裡。」

信中的大意，略如上所述。在後來的幾封信中，都很簡短，曾說起，他正在計劃大規模的普

及民主教育，幷幫助上海朋友辦社會大學。關於來解放區參觀的事，他只托朋友帶口信說，國民黨封鎖得厲害，他在等候其他方面人士組織團體來解放區時，一齊來。

五八　社會大學與民主教育

陶氏死後不久，育才和社會大學都被反動派封閉掉了。因爲前者培養出來的學生，大都成了爲人民服務的革命份子，而後者也一樣，這便成了反動派的眼中釘，必欲置之死地而後甘。育才我還了解一些，社大則知道得太少。陶氏在來信中只略略提及。不過，早在十多年前，他在上海時，有一位王大令先生辦企中大學時，他就有辦社會大學的思想，爲一般職員、失學貧苦青年和想求上進的人們，得到入大學深造的機會。這和資產階級辦的大學，要家裏有錢，有高中畢業資格，還要有三五年的時間，以及皇宮般的建築，是迥然不同的。那種大學只有地主資產階級的子弟，才進得去，不要說窮人，連富農，中農和一般小資產階級，也很難進去。陶氏舉辦這所大學正是爲這些被統治階級屏棄于大學門外的青年人設想的。他說，祇要有學生，有教授，還要有一個辦大學之道，不問有無基金，也不問設備和校舍陋不陋，大學就可以辦起來。

陶氏辦大學之道和反動統治階級辦大學之道，恰恰針鋒相對：他說，「大學之道，在明民德，在親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這就是培養爲人民服務的新知識份子。而統治階級所培養的只

是爲少數地主資產階級服役的工具。

陶氏要知識青年去親近人民羣衆，要他們和人民在一起，使人民自覺的聯合起來求解放，如此使人民得到福、祿、壽、喜的幸福，即人人有飯吃，有工做，有書讀，能享受健康和結婚的快樂生活。這裏，不僅說明了陶氏的民主教育目的，也表明了他培養新知識份子的方法，那就是親民，向羣衆學習，和羣衆打成一片。我們解放區的大中學校，都應該向這個方向走。

日寇投降後，反動派與人民爲敵，陶氏便大聲疾呼民主教育，要全國青年和教育界總動員起來，向反動派要民主，和他作鬬爭，以求達到前面所說的人民幸福。

他又號召教師和青年學生用自我教育來加緊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識，建立「人民第一」，「天下爲公」，民主精神和平等自由的新思想。總而言之，說句解放區流行的話，就是建立甘心爲人民做勤務員或長工的人生觀。他說：「這些都是我們以前所沒有學過的，不但要再學習，而且要將所學貢獻給人民，爲人民大衆而服務。」

在這裏，陶氏除指明培養新知識份子的方針辦法外，又指出改造舊知識份子的方針和辦法——方針是建立爲人民服務的人生觀，辦法是自我再學習。

五九　陶氏與新民主主義教育

現在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教育，是毛澤東同志根據整個中國革命情勢和需要，手定出來的。他英明的指出新民主主義教育發展的方向和具體內容爲民族的，大衆的和科學的。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又號召文化工作者爲工農兵服務。至此更明顯的指出教育者須爲人民大衆中擔任戰爭前綫和生產前綫的工農兵服務，把我們的教育對象從少數地主、富農、資產階級身上轉移到廣大的勞苦人民大衆身上去，他們才是眞正解放民族和他們自己的人，他們也眞正是建立未來幸福世界的主力軍。在一九四四年陝甘寧邊區的宣教大會上，他又爲我們指出實施新教育的一條主要原則：「羣衆需要與自願」。因爲當時各地辦冬學的經驗，認爲一度轟起來之後，不久就會冷冷淸淸的走上垮台，很難持久。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這是由于教育工作者犯主觀主義和敎條主義毛病的結果，要把羣衆教育辦好，就要根據羣衆自己的需要，而不是根據我們主觀主義的理想去規定方針和內容教材等；在辦法上，也不是老一套，更不能强迫命令，必須出于羣衆的自願。

根據毛澤東同志這些英明的指示，十多年來，中國解放區的文化教育，不管戰鬥如何劇烈，環境如何動盪，以及物質如何艱難，但在南北各區，都如火如荼的猛烈發展着，人民政治文化之迅速增高，像奇蹟似的出現了。雖然我們還有很多很多缺點，不過方向正確了，新民主主義教育的理論基礎與具體實施方法，也有了規模。

陶氏雖看到了解放區文化教育，像雨後春筍般的蓬勃發展，表示了無限的敬慕之意，也聽到過關于新民主主義教育的理論，由于身在國民黨反動派地區，不能自由的發展意見，我從沒聽到他談過這一名辭。一九四六年我曾在信上提到這些問題，沒有得到回答。

這幾年來，有許多文化教育工作者，常問起我生活教育的理論，或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主張與理論，究竟和我們的新民主主義教育有什麼區別呢？有些地方的教育工作者對陶氏表示了輕蔑的態度，公開在雜誌上諷刺他是爬行的經驗主義者，說他是教育救國論者。於是，引起另一部份人的不平，要我出來講幾句話。四五年冬，我曾抽空寫了一篇「論新民主主義教育與生活教育」，從發展的觀點給生活教育做了一個分析，指出牠們之間的大同小異，先不同而後越走越相同的精神，可惜這篇稿子一直躺在手提包裡，沒發表機會，被遺失了。本想候與陶氏見面時，給他看，和他討論，但這個機會也永遠不會有了。

現在，就讓我們來研究一下，牠們之間的關係吧。要弄清這個關係，先要把兩種教育的特點找出來，然後比較一下就不難明瞭：

先來分析新民主主義教育。我認爲牠和中國任何時代的傳統教育，或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教育，最大的不同點，也就是牠的最顯著的特點，不外以下幾點：

一，爲大多數勞苦人民服務。把教育權從地主資本家手裏奪過來，由人民掌握，爲人民服

務，不再爲少數人的專有品。這也就是說，把教育這把武器送給羣衆，使他們今天可以用來求解放，明天用來建設近代化科學化的幸福世界，以達到實現新民主主義社會。

二，從實際出發的實際主義精神。新民主主義教育從方針原則計劃實施等方面來說，反對主觀主義；從教育內容來說，反對教條主義；從訓練來說反對形式主義。牠和封建士大夫的讀書教育不同，牠和資本家欺騙大衆的虛僞和麻醉教育不同，牠和光動手幹不思考研究的徒弟式教育，也不同。牠既不抄襲走向死亡的英美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教育；也不超越時代的去做做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教育。牠是要我們老老實實依據中國的具體環境，脚踏實地去幹，所以新教育的實施方針中第一個原則，就是從實際出發去改變社會和征服自然，不尙空談，不咬文嚼字，不言必稱英美蘇聯，而對于自已現實的鬭爭環境則一無所知。

這種實際精神，就是教導人民在創造世界和改變世界中去獲得知識幷創造自已。這就是說，爲用而學，學了就要有用，因此又有一條原則，叫做學用一致。

這種實際精神，就是要我們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出發，教導人民反帝反封建，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然後根據新社會的政治經濟及人民物質和精神生活的發展情況，再提高一步，走向社會主義教育，再由此走上共產主義社會教育。這可說明了爲什麼現在解放區的教育，老是談結合實際，結合戰爭，結合土改，結合生產以及結合其他任務的唯一原由。

三，着重實踐。新教育在方法上，有兩個基本原則，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則是實踐，這是新教育方法上的靈魂，一切離開這一原則的教學方法，都不是好方法。關于這一原則，我在談教學做合一中已比較詳細的談過，玆不贅。

四，着重自覺。這是新教育方法上第二個重大原則，這在反中國傳統的封建式教育和反獨裁的法西斯教育上，尤爲重要。一切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社會統治階級對人民大衆所進行的教育方法，不是採取欺騙麻醉，就是强迫訓練，因爲他們是違犯人民利益，違犯眞理的，他們恐懼人民覺悟。而我們，則剛剛與之相反，我們要人民覺悟起來翻身做主人，我們是站在人民和眞理方面，只有我們才可以採用啓發人民自覺的方法來教育人民。現在是如此，將來更須如此。一切違反這一教育方法的人，都應該作自我檢討。

關于新民主主義教育的特質，談到這裡，我想主要的已分析出。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陶氏的生活教育主張吧。最好，讓我們從他近二十多年來的整個教育活動以及他所發生的効果上去分析他和考察他，不要只看他的著作，更不要斷章取義。如此，我們就可以分析出如下的特點：

一，爲勞苦大衆服務。陶氏從辦平民教育和鄉村教育起，我們就可以說他是爲人民辦教育。但陶氏無明確的政治主張，無顯明的奮鬬目標，就是有也是非常模糊不清而且帶有嚴重的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幻想主義的；而在方法上，他也犯教育救國論的幻想。不過，國民黨反動派和帝國主

義不斷的把陶氏教育得一天比一天進步了。九一八以後，他就開始在思想上轉變，不久他就很快站穩勞苦人民大衆的立場，堅決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他說，教育是人民大衆求解放的工具，他相信人民有足够的智慧可以辦教育，可以教育自己覺悟起來，可以用他們自己的力量來解放自己。因此，他到處辦工學團，到處辦工人夜校。這種爲人民大衆服務的人民大衆反帝反封建的教育，你說牠和新民主主義教育，有什麽大區別麽？

二，陶氏從野人生活出發，向極樂世界探險的實際主義精神，和我們的從實際出發，是一句話的兩種說法。陶氏提出的生活教育學說，實在也就是從這種實際精神產生出來的必然產物，不過，我們比他更走前一步了，今天我們在共產黨對整個中國革命方針的正確領導下，可以從現實出發，一步一步推向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因此，我們已找到一定的方針、目標、步驟，幾乎連各個時期的具體任務，也爲我們指出，我們現在只須談結合。陶氏是沒有這種便利的，特別是在他初期。當有人懷疑陶氏的生活教育，只能在光明的解放區如陝甘寧邊區才能實現，而在黑暗的國民黨區域則不能實現，因爲他說過，「是好生活即好教育，是壞生活即壞教育」的話。在重慶千厮門碼頭上他對崔載陽先生和我談起這件事，并從口袋裡把那人給他的責難信和他的回信給我們看，要我把他的回信在戰時教育上發表出來。他很愉快的說，在進步的解放區過的是光明的好生活，當然是好教育；但我們在大後方（指國民黨統治區）黑暗倒退的地方，過的是被壓

迫被剝削的黑暗生活，我們所受的教育也就是反壓迫反剝削的教育，在這種反黑暗的教育裏我們才可以求得光明，因此，也是最好的教育。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陶氏的教育主張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脫離實際的。

三，教學做合一這個教育方法，開始是脫胎于實驗主義，所以招來了經驗主義的非難。但經過陶氏本人的努力，他把這個學說加以修正和補充，特別是他擬定了教學做合一過程之後，我們可以說牠已和我們今天所說的實踐法極相似。

一般工農分子的經驗主義，狃于一己狹小的老經驗，固步自封，不求長進，不看書，不接受古今中外人的經驗知識，而陶氏則反斯，他提倡「用書」來吸收他人的經驗。

一般資產階級的實驗主義者，含有拜金主義的臭味，認爲一旦實驗有効，發生發財致富的價值，就以爲是眞理了。陶氏初期的思想，在這方面是很含糊的，但當九一八以後，他走到人民大衆反帝反封建的隊伍裡來時，情況就大大不同，因而，也很快就糾正這個毛病。

四，集體自覺是一九三八年陶氏回國後提出來的。當時，我們提出兩項教育意見來和他商議：一是在抗日中爲了趕上時代需要，須普遍進行集體自我教育。一是在方法上應採取自動自覺，反對反動派對青年兒童的強迫壓制。

後來，他又看到反動派教育部長陳立夫提出管教養衛合一的教育主張和所謂政教合一，民兒

教育合一的保國民學校（即每保辦一學校）之後。有一天，我和他一同從北碚乘汽車到重慶去，他在車上一邊把ＣＣ特務頭子的文章指給我看，一邊說，這種壓迫統制人民的教育，人民一定反對，所以老爺們要用行政力量來强迫接受。我們要提出和他們相反的方法，那就是教人民集體自覺。

儘管陶氏的生活教育內容和方法上，還有很多和新民主主義教育不相同的地方，儘管牠存在着許多弱點，但從上面這些基本精神看來，牠們是大同小異。因此，我們可以說，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想是毛澤東同志和陶氏共同創造起來的。這說明陶氏的教育學說爲什麼在解放區到處受到人民歡迎的眞正理由。

陶氏成就之所以如此偉大，之所以能在學說上達到如此的成功，主要在他依靠人民大衆的思想，主要在他和人民大衆並肩作戰，以求民族和人民的自由解放。陶氏開始是完全以一個美國派的自由主義教育家出現的，但當他碰到了大釘子，逐漸認淸現實之後，他就英勇的走到人民大衆反帝反封建的陣營裡來，而不顧一切的和共產黨成了親密的戰友。陶行知先生是一個前進的教育家，但不要忘掉，他在國難時期和八年抗日時期他是一個徹底的愛國主義者；同時，他又是一個新民主主義者，這在愛國自衛戰爭中尤爲顯明。因此，我們可以說他是一位前進的政治家或人民的政治家。要做一個教育工作者，不問政治或對政治漠不關心，實在是一件莫大的錯誤，因爲你將不知道把你的羣衆和青年兒童帶向何處去？你也就有被人民唾棄的危險。陶氏在這方面的成

就，是我們很好的模樣。

六〇 永別

一九四六年七月的雨季中，一連數天，反動派的飛機都在頭頂上轟隆隆的叫着，他們不斷的用機槍掃射，殺害人民。西方和南方的邊際，在不很遙遠的那綠色田野的盡頭，發出隆隆的大砲聲，在多雨的夏天，像陣雷似的傳來。反動派的軍隊正在向人民解放區大舉進攻。

忽然，天空密佈了烏雲，閃閃的金光，在雲端飛躍着，一陣猛烈的暴風雨來了，立刻雷電交加，蓋住了所有的大砲聲。傍晚，雨止，夕陽從雲邊射出輝煌的光芒，我躺在病榻上，突然有一位同志來對我說，「陶行知先生死了！」我頓時如遭雷擊。正在痛恨和懷念李公樸，聞一多二先生慘遭國民黨反動派屠殺之際，我彷彿又墮入夢境，認為陶氏不會死得這樣突然，也許是謠傳吧。可是，一忽兒報紙來了，日報上用黑邊框在顯著的地位登載了他患腦溢血逝世的消息。但寥寥數十字的電報，不知其詳。三天後，我接到他一封從上海發出的短信，說他在滬賣字興學，益增悲思。過了很久，我看到上海出版的文滙報和許多雜誌上的紀念文章，以後又接到紀念陶先生委員會出版的紀念冊，對于他的死，才知道得清楚。

原來，國民黨反動派在上海了一張黑名單，凡是名列黑榜者，反動派準備一個個予以暗

殺。陶氏名列第一。在昆明黑名單中的一、二兩名，李聞二先生已遭毒手，上海當然也將立即執行，陶氏視死如歸，他一連幾天幾夜書寫對聯，賣字籌劃育才經費，又于一夜內，整理了十萬字的詩稿，準備以不怕死的精神來對付反動派。那知，竟因此引起腦疾爆發，突患腦溢血死了！正如加拿大的文幼章先生所說，陶氏的死，是反動派殺害的。

陶氏死後，一群群的青年學生、工人、農民、傷兵、店員、教師，以及文化教育界的許多知名人士，不絕的去哀悼他，個個人都放聲大哭！每一個人都抱着悲憤的情緒：「烈氣不斷，前仆後繼！」這副輓聯，喊出了一切人的悲壯呼號。

為了紀念這位舉世聞名的人民教育家和民主戰士，讓我們實踐他的言論：

「我提議為民主死了一個，就要加緊號召一萬個來頂補！……」

跋

兩年多以前，我得到陶先生逝世的消息，就想寫關于他的回憶錄，把他所走的道路，把他近二十年來的言行寫出來，供大家研究和參考。這是由于陶氏一生中艱苦奮鬥，幾經挫折，在黑暗中摸索前進，終于摸到了一條光明之路。陶氏所走的道路是正確的，是我們每一個文化教育工作者，甚至每一個知識份子所應走的路。我們應該向這位人民教育家，人民詩人和民主鬥士學習，他是我們的先驅者，他是我們的模範。因此，把他一生的奮鬥歷史寫出來，實在很需要。

對于教育界的同志來說，尤爲必要，因爲陶氏是新民主主義教育理論與實際的創始者之一，研究他的教育學說以及所行所爲，對于我們開展解放區的新教育工作是有很大幫助的。

可惜，我對陶氏雖追隨將近十五年之久，但對他知道的還不够多，只能從一九二七年敘述起至一九四六年止，四一年以後因爲我到敵後工作分了手，音信又隔絕很久，知道的就更少。雖然一共不過二十年，但這二十年活動是陶氏的革命時代，他的許多重要活動和著名學說，都成就于這一時期。我以爲這二十年歷史的敘說，可以大致概括了他的一生。

我以爲要認識一個人或一個人的學說，必須從他一生的歷史發展中去觀察，必須從整個歷史

環境及其演進中考察，而且還必須從他的實踐中和實踐的効果上去考察。因此，關于陶氏的生活、思想、事業以及學說等，我都是根據中國社會近二十年來的劇變，也就是以人民大衆在這二十年中的解放鬪爭史爲主，來寫陶氏在這偉大時代中的變化，和每一次鬪爭所給予他的影響，以及生產什麽新的思想，新的行動，新的學說。因此，讀這一本書，就像讀近二十年的中國歷史，尤其像二十年來的文化鬪爭史。看了這些歷史，我們也就看清楚了陶氏的思想變化史，這是中國許多文化人思想轉變的寫照。

同時，對陶氏的教育學說，也就可以追本求源去研究他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使我們可以把他的學說更推進一步。

不過，我要再聲明一次，我還知道的不多，而且手中參考資料一點也沒有，全是憑腦筋記憶所及，寫出來的。陶氏的許多大衆詩，許多事實以及他說的許多話，因爲年代久了，都很模糊了。錯誤一定很多。加之，是從我一個人的角度發出來的，不免帶了很重的個人情感，尤其希望陶氏生前友好，不吝予以糾正。

一九四七年十月

勘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一三	一一		前後辦起萬壽學院	前後辦起了萬壽宮學院
一六	一		他堅決反對少爺小姐	他反對人做少爺小姐
二六	一二	一	之	制
二九	一一	四	個	流
三〇	三—五		論起他們兩個人……………………	論起他們兩人的造詣，胡適其實不過抄襲腐爛的美國資產階級的實驗主義哲學，用來對前人的思想加以任意的打擊和解說。陶則不然，他常對人說，你們要從親民和親物出發，
三〇	九		有過功勞。	這是好的，
三一	二		胡適完全是投倒	胡適之完全投倒
三一	三		下的俘虜	下常走狗
三二	二	一	進步	完整
三三	一一		meansan	meansan
三六	五	一四	師	帥
三七	四	三七	的	迭
四三	一二	二三	剿殺	圍剿
四八	四	九字下	勾結「反動……	「勾結反動……
五一	一三	一〇	、	和
五三	五	二四	有	石

五五	五		給蔣介石但他的……	但蔣介石給他的……
五七	一一	四字下	×××	蔣介石
五九	三		非三萬六萬千萬農	非三萬萬四千萬農民……
六〇	四	二八	然	兒
六一	一	一二	紗	布
六四	一	一	之	使
七二	一〇		做些抗日」工作	做些抗日工作」
七三	一二	二二	危	災
七四	一四		讀死皆	死讀書
七四	一五		讀死書	讀書死
八二	一〇	二四	馬	馬
八四	四	二一	景	譜
九五	三	三一	親與	身歷
一三二	八	二六字下	等先生	先生等
一三三	二	二〇	頗面	面頰
一五九	九		……實驗主義者，含有拜金主義……認為	……實驗主義者，是以粗淺的形式邏輯為基礎，而且含有拜金主義的市儈味，認為……
一五九	九		發生發財致富的……	……發生有用（發財致富）的
一五九	一〇	二三字下	但當九、八以後，	九一八以後
一五九	一一	下一〇字	來時，情況就大大不同，因而，也很快就……	來，很快就……
一六四	四	二	生產	產生